

非洲史(十三)

孙颖 主编

目 录

非洲现代史（续）	1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独立国家（续）	1
非洲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	24
六七十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24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28
刚果事件分析	35
非洲统一组织	44
葡属殖民地反殖武装斗争	50
南罗得西亚独立斗争	63
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殖斗争	72
非洲各国为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	83
非洲独立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	127

非洲现代史（续）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独立国家（续）

六、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全非人民大会的召开及其影响

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非洲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及把非洲大陆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的必要性。从 1958 年以来，非洲各国为解决他们存在的共同问题，先后召开过两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其中除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是在 1961 年召开的以外，其他会议都是在 1958—1960 年之间召开的。

1958 年 4 月 15—22 日，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非洲国家举行会议讨论自己关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独立国家加纳、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还有尚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多哥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会议由加纳总理恩克鲁玛主持。全非洲人民对于这次会议寄予热切的期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对这次会议表示关心。

亚非会议以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深入发展，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和几内亚相继独立。非洲八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面积 70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的

28.5%；其人口总和为 7,700 多万人，占非洲大陆总人口的 39.6%。其他未独立的地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群众运动，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黑暗大陆”的漫漫长夜已经破晓，独立自由的曙光已经出现。然而，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亚洲的殖民地之后，企图把非洲变成其殖民体系的最后堡垒。因此，帝国主义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加紧镇压非洲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对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破坏，妄图重新控制和奴役这些国家。这就促使非洲已经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就是首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的原因和背景。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反映了非洲人民要求争取独立自由和保卫独立自由的强烈愿望。“不许干涉非洲，非洲必须自由”是这次会议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

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多项决议。宣言指出，非洲独立国家决心“保障我们得来不易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承认非洲人有独立和自决的权利以及采取适当步骤来实现它的权利”，并表示“决心建立与会八国之间的更密切的友谊、兄弟关系、合作和团结”。会议通过了支持联合国宪章、恪守以万隆会议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决议；通过了谴责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主张明确规定日期使未独立地区取得独立的决议；通过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正义斗争的决议，要求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和自主权，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它的全部军队，立即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举行和平谈判，并要求法国的友邦和盟国不要直接和间接地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会议谴责法国殖民主义者对喀麦隆人

民的武力镇压，通过了要求法国让多哥和喀麦隆实现民族自决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决议严厉地斥责“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作法是罪恶和不人道的”，谴责世界各地特别是南非联邦、中非联邦、肯尼亚和非洲其他地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行径，并建议“所有与会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根除他们自己国内可能出现的种族歧视的痕迹”。

殖民主义者对于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的召开又怕又恨。早在 1957 年春天，当准备召开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的消息刚刚传出，美国和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就对许多非洲独立国家施加压力，企图制止会议的召开。摩洛哥独立党主席阿拉尔·法席曾揭露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对加纳总理恩克鲁玛施加压力，要他取消这次会议，并进一步指出，这“完全是遵循着美国的政策”。西方国家报刊则恶毒散布种种挑拨性的言论，企图使会议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来进行，为帝国主义的政策服务。如 1957 年 4 月 4 日合众社发表的一条评论就曾经这样说：“非洲会议是西方的好消息，非洲会议同两年前的万隆会议不同，发起国所关心的是和西方作朋友，而不是宣布脱离西方而独立。”这就说明，为什么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几度延期，从 1957 年 5 月延至 10 月，又延至 1958 年 1 月，最后才在 1958 年 4 月 15 日召开，这显然同帝国主义的阻挠不无联系。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非洲各国之间的进一步团结，也加强了各国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力量，对当时仍处在殖民压迫和奴役之下的一亿多非洲人民的斗争也是

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了纪念这次会议，4月15日被定为“非洲自由日”。

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开过不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几内亚获得独立。这样，非洲独立国家的面积之和占到全非总面积的1/3以上，人口也接近全非总人口的一半。到1960年，尼日利亚、喀麦隆、多哥和意属索马里等殖民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正在走向独立。在非洲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非洲各国人民有必要坐到一起，共同讨论有关非洲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

1958年12月5—13日，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在阿克拉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8个国家的62个组织的300名代表。这是第一次在非洲举行如此盛大规模的民间性集会。“非洲必须自由”和“非洲必须统一”是这次大会的两大主题，也是这次大会中响亮的呼声。

全非人民大会反映了非洲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与会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丑恶面目。喀麦隆代表乌安迪说：“不独立勿宁死！”坦噶尼喀代表博克·穆纳克高呼：“我们并不是在乞求自由，自由是我们天生的权利。如果不给我们自由，我们将用武力来取得它。”当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法农发言时，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经久不息地向他欢呼喝采，表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斗争的钦佩和支持。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五项决议。名为《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言，愤怒谴责在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中罪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并指出这种制度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中非、肯尼亚、南非、

葡属安哥拉、莫桑比克、普林西比和圣多美特别表现了极度残酷的形式。

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就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同仇敌忾以及争取自由、独立的决心。属于这一类的有：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的决议；关于要求殖民国家从其所占领的领土上撤走的决议，它谴责帝国主义把非洲人军事化和利用非洲领土作为进行侵略战争之用，要求帝国主义立即停止对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它指出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非洲殖民地的结果，严厉谴责种族隔离、保留制度以及种族歧视和肤色隔离的其他一切形式，特别谴责中非和南非等地区以种族隔离的社会原则作为少数统治多数的基础的政治政策。另一类是表示在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的意愿。属于这一类的有：关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它要求各个国家和政府，特别是非洲独立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呼吁非洲各国支援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并要求非洲独立国家以一切可能的办法，对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附属国人民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从而使他们迅速获得解放，并参加非洲自由、独立国家的大家庭；关于实现非洲统一的决议，它号召非洲各个独立国家，在地理接近、经济相互依赖、语言和文化相似的基础上，联合为若干区域性联邦或集团，以便实现泛非主义的最终目标，建立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关于建立常设机构的决议，它宣布在阿克拉建立常设秘书处，以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团结，以及在非洲各国人民中培养一种大家庭的情感，以便于将来建立非洲合众国。

大会曾就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应当采取何种斗争手段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恩克鲁玛和其他一些代表主张采取各种形式的非暴力行动，以实现非洲的合法权利和愿望；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不应当排除暴力手段，非洲各族人民能够使用武力来收回属于他们的东西。经过热烈讨论，大会最后通过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指出：“大会支持所有采用非暴力和不合作等和平手段的人们，也支持在那些必须进行报复的地方的所有为了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不得不对暴力进行报复的人们。”

美国著名黑人领袖、泛非运动创始人杜波依斯给全非人民大会发来了贺信。他在信中特别强调：“今天西方表示让步，但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必须小心。”“它要使你们的一些比较时髦而比较不谨慎的领袖，变成和白色剥削者同伙的资本家”，因此，“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它作斗争。”

帝国主义对于全非人民大会的号召既惊慌又恼怒，他们采取威吓和诱骗兼施的办法企图对大会加以破坏。特别是美国的活动异常频繁。在全非人民大会开幕前夕，美国助理国务卿萨特斯威特专程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表示美国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次会议的召开。美国还派遣了大批观察员出席大会，他们在暗中进行贿赂、恐吓、造谣、刺探情报，企图对大会施加影响。美国的非洲美洲协会主办的《非洲专讯》杂志的记者罗伯特·基思，为了偷听非洲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闭幕会议前一天举行的秘密会议的情况，竟躲藏在大会讲坛下面，被人们不客气地抓了出来，交给警察处理。但是，会议的圆满结束使帝国主义的破坏计划落空了。

全非人民大会是继万隆会议、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以后非洲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发展，它有力地推动非洲人民的斗争走向新的胜利。

1960年1月25日—31日，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召开。参加这一届大会的有非洲30个国家的50个政党和群众团体的140多名代表。他们聚集一堂，就非洲人民独立和团结的伟大事业交换意见。

“独立和团结”是这一届大会的口号。

自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举行以来，非洲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年多以前，赤道以南的广大黑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方兴未艾，到此时已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除了法国已被迫承认喀麦隆于1960年11月1日独立以外，在同年4月、7月和10月，法属多哥、意属索马里和英国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尼日利亚也先后宣告独立。比属刚果人民在有效地抵制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所制造的虚伪选举和拒绝了所谓“分阶段独立”的骗局之后，已迫使比利时政府作出让步，同意刚果在1960年6月30日独立。尼亚萨兰、乌干达、肯尼亚和其他非洲殖民地的人民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也正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展开进一步的斗争。然而，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每一寸阵地，他们从无耻的挑拨、欺骗到血腥的屠杀、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力图继续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某些国家中继续保持政治和军事特权。美国则大耍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帮助西欧殖民国家迫害和屠杀非洲人民，特别是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并且支持法国在撒哈拉试验核武器；另一方面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通过所谓“援助”、“投资”等途径，从军事、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大举扩张，逐步夺取西欧国家在非洲的地盘，推行新殖民主义。为了挫败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很需要召开一次全非人民大会，分析形势，号召和动员非洲人民提高警惕，争取真正的独立，并总结自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以来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成就，进一步促进非洲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这就是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争取非洲独立的总政策、关于非洲经济发展问题、关于非洲统一问题、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有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喀麦隆、南非、葡属非洲、肯尼亚、坦噶尼喀、象牙海岸、桑给巴尔以及“法兰西共同体”等问题的一系列决议。

关于总政策的决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非洲国家之间团结的重要性，以期挫败帝国主义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决议指出：“为了更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和迅速地把所有附属国的人民从外国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绝对必须联合和团结全体非洲人民的力量，因此建议非洲各国为了全体非洲人民的利益重视互相合作”。二是强调真正独立的重要性，以粉碎帝国主义在某些国家中继续保持其政治和军事特权。决议指出：“非洲各国人民立即无条件地采取行动，要求驻扎在非洲旨在进行侵略和压迫的外国军队全部撤走。”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决议表示了与会代表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极大的尊敬和支持，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号召建立非洲志愿军来支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并要求美国放弃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的有害政策。

大会要求法国立即从喀麦隆撤退军队，恢复和尊重喀麦隆人民的民主自由；要求英国政府让肯尼亚人民立即独立；要求实现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的完全独立；支持比属刚果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关于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以及宣布独立的要求，并形成和通过了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体现了非洲人民坚决反对殖民国家的各种破坏阴谋、要求实现非洲各国真正独立的坚定立场。

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日益感觉到美国新殖民主义对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严重威胁。因此，这届全非人民大会特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会发了电报，揭露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援助法国，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战争。电文要求美国政府放弃这种有害的政策，并且强调：“美国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支持，给非洲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充分体现并进一步促进了非洲人民要求加强团结的热烈愿望和相互支持的坚强意志。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致大会的贺电中再一次向非洲人民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他说：“中国人民坚决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大力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1960 的 6 月 14 日—24 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二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有 20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主持了会议。

进入 1960 年代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非常令人兴奋，一个又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在非洲诞生。英属索马里的独立，在整个英属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所谓“法兰西共同体”也正在经历着解体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形

势之下，老殖民主义者采取了新的殖民主义手法，执行非殖民化政策，即制造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殖民控制。英、法、比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被迫同意他们的非洲殖民地独立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策划这一诡计，力图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保持其军队和军事基础，并且继续维护其殖民利益，尤其是经济上的控制。而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则成为非洲人民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在这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的前夕，美国国务卿赫脱假惺惺地来电致贺，说什么美国是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的，美国要帮助非洲各国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美国新闻处则竭力鼓吹美国的无私援助，以引诱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上钩。然而，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却露了马脚，它 1960 年 6 月 19 日发表的社论在评论独立国家会议时以威胁的口气说：反对殖民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就为赫脱等人侈谈非洲和平与繁荣而讳言反殖民主义的贺电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因此，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就成为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个必须十分重视并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同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上曾引起非洲各国代表的注意。时隔半年，非洲独立国家再次聚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1) 非洲各族人民摆脱殖民主义而取得完全解放的问题；(2) 从非洲领土上拆除外国军事基地的问题；(3) 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和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问题；(4) 南非种族歧视和抵制南非货物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与会各国代表特别

强调，应该揭露和粉碎殖民主义在某种伪装下卷土重来的任何可能性。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说：“美国今天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财主”，美国供给法国殖民主义者金钱和武器，并派遣技术人员到阿尔及利亚去就地保养美国供给法国的飞机。乌干达国民大会主席基瓦努卡说：“非洲人民必须提防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诡称友好，但却企图在经济上奴役非洲人民。”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表示忠于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和万隆宣言，并且呼吁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阴谋。

关于第二个问题，与会代表引用了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加紧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的活动。甚至就在本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召开期间，美、英两国政府还达成秘密协议，以建立科学研究探测站的名义在桑给巴尔建立导弹基地。这激起桑给巴尔人民的愤怒，举行了反对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的5万人大示威。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迪亚洛在本届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企图在新独立的国家保留军事基地，用来对付非洲民族主义。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在非洲继续保持和建立军事基地，不仅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而且是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威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在非洲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决议还号召非洲各国采取措施，阻止法国在撒哈拉或其他非洲领土上试验原子武器。

关于第三个问题，会议表示，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是全非人民斗争的生动象征，对待这一斗争的态度是检验是否真正忠实

于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试金石。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在物质和外交方面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事业，并且派遣代表团到世界各国首都寻求对阿尔及利亚事业的支持。

会议关于第四个问题的决议，谴责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要求与会各国全面抵制南非，断绝同它的外交关系，抵制一切南非的商品，不让属于南非公司的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等。

会议最后还决定建立特别基金，用来援助非洲各地为自由斗争的战士。这笔基金由各非洲独立国家提供。

第二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同以前召开的几次全非性会议一样，对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团结、促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新老殖民主义和苏联对蓬勃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对策

英国是在非洲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面对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惊涛骇浪，英国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1959年1月下旬，英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匆忙召集英属东非的四个总督到伦敦开会，商讨对策。与此同时，英国皇家非洲协会举行集会讨论非洲形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数百家在非洲进行投资的英国大公司的代表和许多殖民地官员，规模之大为该会成立以来所仅见。会上，主要发言人之一哈利·格林费尔回顾了非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形势以后，无可奈何地承认：“自殖民地撤退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英国的财力、物力都不足以应付这么多地区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国统治集团又明白表示，英国绝不退出非洲。会议的另一主要发言人奥立弗·伍兹公开叫嚣：

“我们必须继续留在非洲。除非我们留在非洲，否则我们将得不到工业所必须的原料和非洲的市场。”在非洲进行了几十年殖民活动的资本家布朗·麦克唐纳也说：“要注意，英联邦将来能否继续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主要取决于我们在非洲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

为了继续保持对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加强武力镇压是英国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法。在英属东非总督会议期间，经常反映官方意见的刊物《东非洲和罗得西亚》的评论就透露了殖民者的凶险计划。它写道：“不可否认，近几年来，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政府是过于迁就非洲民族主义过激分子了”，英国殖民当局应当“显示一下驯服他们的意志”。在英属东非总督会议前后，英国更加疯狂地对东非和中非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尼亚萨兰和罗得西亚的人民成批地遭到枪杀和逮捕。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成百的工作人员被投入监狱。在肯尼亚，三人以上的集会都是非法的。在坦噶尼喀，殖民当局利用殖民警察巡逻车遭到袭击的事件，进行疯狂的报复，逮捕了1500多名非洲居民。

然而，仅仅依靠武力镇压已经无济于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承认：“用武力拖住非洲的民族主义将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于是，英国又通过推行虚假的宪法改革，在殖民地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扩大非洲人的某些选举权、建立联邦等手段来软化非洲人民的斗争，对幅员广阔的尼日利亚则采取挑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手法。

1960年初，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打破历史惯例，第一

次访问非洲。他大谈其所谓非洲的正确道路，要英属非洲人民终止对宗主国的敌对运动，而走合作与和平发展的道路。他还大谈其在非洲建立由英国提供资金和技术、由非洲提供资源和劳力的所谓“种族合伙”关系。麦克米伦在中非威胁尼亚萨兰人民必须同他所指派的蒙克顿委员会进行合作。英国在肯尼亚同样提出了一个《麦克劳德计划》，要进行宪法改革，但规定选举将按“坦噶尼喀方式”进行。《东非旗帜报》指出：“坦噶尼喀方式意味着：选民必须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和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年龄在40岁以上，拥有某个职位，或者每年收入为75英镑”。这种选举的价值可想而知。至于建立联邦的计划，则遭到非洲人民的激烈反对：英国计划在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地区组织东非联邦，但各地纷纷要求独立。英国制造了中非联邦，但是不论在罗得西亚或者尼亚萨兰，人民都强烈地反对这个联邦，各自要求独立。英国企图把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专纳兰三个地区并入南非联邦，也遭到当地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抗议。

正是在镇压和欺骗这两种政策均告失败的情况下，英国被迫让英属非洲殖民地先后取得了独立。

法国也是在非洲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万隆会议之后，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宣告独立，法国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他们一方面对殖民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方面进行宪政改革。法国调集了几十万军队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还派遣大军野蛮屠杀喀麦隆反法起义的人民，甚至卑鄙地谋杀了喀麦隆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穆米埃。法国加强了对索马里的军事镇压，解除了反对新宪法的索马里总理穆罕默德·哈迪的职务。在尼日尔，法国在加强军事镇压的同

时，还逼迫反对宪法的尼日尔总理巴卡里及其政府人员辞职。在法属苏丹，法国依仗军事压力，把投反对票的前法属苏丹劳工部长迪阿洛·阿卜杜拉赶出了国境。但是，法属非洲各领地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宪政改革的斗争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动摇，相反，斗争越来越广泛而激烈。

于是，法国被迫作进一步的改革。1956年6月，它颁布了《海外领地根本法》，允许各领地设领地议会和领地政府，建立所谓半自治共和国。领地政府的总督仍由法国政府任命，部长可由总督提名非洲人担任。但是各领地的人民斗争仍然蓬勃发展，迫使1958年6月上台的戴高乐不得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再作调整。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废除了法兰西联邦，代之以法兰西共同体；海外领地从半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各自治共和国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设立一院制的议会和以总理为首的代议制政府，总理兼任国家元首，但外交、国防和财经大权仍由法国控制。戴高乐还决定1958年9月在各个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尽管戴高乐政府施加各种压力，投赞成票的也只占登记投票人数的52%，反对和弃权的占48%。结果除几内亚（于当年10月宣布独立）外，其他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11个国家以微弱多数赞成加入共同体，成为自治共和国。但是，非洲人民并未因此而停止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喀麦隆、多哥相继宣布独立。于是法国国民议会被迫于1960年5月再度修改宪法，规定共同体成员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成为独立国家，独立后仍可留在共同体内。此后的共同体改称革新共同体。于是，参加共同体的所有非洲国家

都相继宣布独立，迫使共同体的参议院宣布解散，共同体瓦解。然而，法国并不甘心轻易丢失自己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享有的特权和利益。它利用这些刚独立的年轻国家存在的困难，迫使他们同法国签订了各种合作协定。法国通过这些合作协定，从外交、军事、经济和文教等方面把这些国家严格地控制起来。

比利时对比属刚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首先进行残酷的镇压；镇压无效，才被迫表示愿意重新考虑刚果问题。1959年1月8日，比利时议会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刚果问题，并派遣议会代表团赴刚果调查。该团由四名天主教社会党人、两名自由党人、三名社会党人组成。1月13日，比利时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刚果前途的声明，表示打算使比属刚果成为一个能够行使主权和决定自己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既未提出独立的日期，也未提及独立的步骤，只提到让刚果所有的人都有投票权，各省的新议会在1960年3月以前组成。

比利时政府的声明实质上并未对刚果人民作出任何让步。由于刚果人民坚持正义的斗争，国际公正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利时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使用欺骗和分化的手法。它一方面培养和利用一批刚果的民族叛徒，如卡萨武布、冲伯等，建立一些御用的党派，如阿巴科等来控制议会，并在刚果内部制造混乱，挑起部族冲突；另一方面采用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法，以打击和分裂刚果人民。比利时国王1959年1月13日在广播中说，他打算在刚果“把行政权大大分散，……并按照他们的地理、文化和种族特点以及他们的经济发展使其多样化”，即包含了分而治之的意思。此外，比利时还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1959年10月16日，比利时政府提出了一个

让刚果分阶段独立的计划。据此，先举行地方选举，成立省议会；然后成立参议院和众议院。按该计划进行需五年的时间，即到 1964 年才能让刚果取得名义上的独立。该计划遭到刚果人民的拒绝后，1960 年 1—2 月，比利时又策划在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刚果圆桌会议，企图延宕刚果的独立时间。经过会上的激烈斗争，终于决定以 1960 年 6 月 30 日为刚果独立的日子。比利时统治集团并不甘心于此，想方设法要在政治、经济上对刚果继续加以控制。同年 4 月，它又策划了一个经济圆桌会议，企图诱迫刚果接受经济协定和技术援助协定，把奴役性的条款强加给独立后的刚果，使刚果的独立有名无实。这一计划被刚果领导人坚决拒绝。以后，比利时又策划让比利时国王继续担任独立后刚果的国家元首，也未得逞。刚果终于在 6 月 30 日宣告独立。

美国面对非洲争取独立的形势，采取积极干预的立场。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潘菲尔德 1959 年在美国国务院公报上说：“无论从战略的观点或商业的观点来看，非洲对美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可袖手旁观，坐视这一幅员辽阔的大陆误入混乱、纠纷或共产主义的歧途”。而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萨特斯威特则更露骨地对美国各主要大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美国很快就能挽回我们的政策在亚洲和中东遭到的相当大的失败。非洲可以使我们捞回一切。”美国就是这样把阻挠非洲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在非洲建立美国霸权作为自己在非洲的任务。

自加纳、几内亚独立后，美国一改其原来的“非洲国家过早独立是有害”的观点，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否准备好，非洲人民总是要按自己的时间表取得独立的。

从这时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议员，接连不断地前往非洲访问和旅行。为了加强美国在非洲的政治活动，美国国务院在 1958 年增设了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非洲事务司，并在它认为情况了解得最少的非洲地区增设了六个新的使领馆。这些外交机构在整个非洲推行美国的扩张和渗透政策。

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之下，美国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招牌，对非洲各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表示同情和谅解；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老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人民进行镇压。美国用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并在联合国中支持法国反对阿尔及利亚。美国让比利时殖民军队利用美国在刚果的军事基地，对刚果人民进行血腥的杀戮。1959 年 8 月艾森豪威尔访问伦敦，公开称赞英国在非洲的做法“表达了一个出色的想法，不但是你们（英）帝国的想法，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1959 年 9 月，艾森豪威尔到达巴黎，又对戴高乐的法兰西共同体大加吹捧。

美国在非洲到处设立军事基地，也明白地表露了美国的野心。这些基地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军事基地网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可以用来镇压非洲和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据点，也是取代老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地位的跳板。在北非，美国在摩洛哥有五个巨大的空军基地、一个海军基地；美国同利比亚订有军事协定，在它境内建有军事基地。在西非，它迫使利比里亚在战时让蒙罗维亚港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东非，美国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军事协定，由美国训练埃塞俄比亚军队，让美国在厄

立特里亚设立军事基地。在非洲南部，美国同南非联邦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在中部的比属刚果，美国也建立了军事基地。

经济扩张是美国在非洲贪婪追求的目标。从北非撒哈拉的油田到南非的金矿、铀矿，从西非利比里亚的铁矿和橡胶种植园到东非坦噶尼喀的矿区，以及比属刚果的铀矿、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到处都有美国垄断资本在活动。据透露，约有 200 家美国公司在非洲拥有利益。美国资本有的控制了某些矿区，有的竭力夺取英、法、比等老牌殖民国家在非洲的地盘。

美国的经济扩张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和政府援助来实现的。美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 1945 年仅 1.5 亿美元，到 1957 年已增加到 20 亿美元以上。这个数字虽比英、法略低，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和活动范围扩大的速度都是值得注意的。增长特别迅速的是美国对非洲的所谓援助，此类拨款在 1958 年已比 1952 年增加了 17 倍。美国的援助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集中于两类国家：一类是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如摩洛哥、利比亚等；一类是出产重要战略原料的国家，如南非联邦、利比里亚等。美国以援助方式输出剩余物资，还借口监督援助执行情况而派出大批专家、顾问和代表团驻在这些国家，干涉他们的内政。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大举侵入非洲，对于正在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非洲人民形成了最大的威胁。

苏联是从 1950 年代中期起开始大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并在这一旗号之下开始对非洲进行渗透扩张的。美国 and 英国拒绝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为苏联

打入非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抨击不结盟原则，以及 1956 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战争的失败，客观上帮助苏联争取到某些非洲国家的友谊。

对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苏联原先的看法是：凡是进行武装斗争并因此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就是真革命、真独立；凡是通过和平道路取得独立的国家，就是假革命、假独立。但是，从 1950 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加纳、几内亚独立后，苏联一改过去这种看法，不再把埃及、加纳这样一些国家当作帝国主义的傀儡，而把他们看作是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再把纳赛尔、恩克鲁玛这样一些民族主义领袖当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把他们看作是和平过渡的领头人，积极加以争取和拉拢。苏联宣称自己是埃及、加纳、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等国的天然盟友，宣布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斗争。

苏联对非洲国家的渗透扩张，以政治、思想渗透和经济援助为主，而以军事援助为辅。它曾对几内亚提供经济贷款，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苏联认为，只要对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就可以使这些国家的国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苏联还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供政治、思想方面的指导，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力求使这些领导人逐步改变信仰，从而使这些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苏联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扩张的目的，更主要反映在政治方面，即扩大苏联在西方前殖民地的影响，排挤老殖民主义，遏制美国势力的扩张，并进而突破美国在

这一地区对苏联的包围。对于一些不顺从它的非洲国家，苏联则拒绝在外交上予以承认，还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扣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帽子。

苏联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号下对非洲某些国家进行渗透扩张，由此揭开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争霸的序幕。

八、辉煌胜利的“非洲年”

1960年是非洲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非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并且胜利在望。喀麦隆、塞内加尔、多哥、马达加斯加、比属刚果、索马里、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乌班吉、沙里、法属刚果、加蓬、法属苏丹、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经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这17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面积总共为1090万平方公里，占全非大陆总面积的1/3强；其总人口达8600万之多，占全非人口的1/3强。加上1960年以前独立的国家，非洲独立国家的面积已占非洲总面积的2/3，人口占全非洲人口的3/4。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已面临着全面的瓦解。

1960年不仅是非洲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非洲人民走上民族解放斗争更高阶段的一年。这一年里，非洲的民族独立斗争出现了四个特点。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空前激烈和尖锐。“帝国主义滚出非洲去”是非洲人民这个阶段的战斗口号。在这一斗争中，非洲各国人民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全面高涨的民族独立斗争，还结合着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争取自身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

每一个斗争都带有广泛的群众性。刚果、加蓬、南非联邦、肯尼亚、津巴布韦、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工人们为改善生活条件举行了罢工，乌干达的农民们进行着抗捐抗税的斗争，尼日利亚的学生们举行反对军事条约的游行示威，桑给巴尔的各阶层人民为反对美国建立导弹基地而进行的群众示威，南非联邦的人民为反对种族歧视进行全民性的抵制运动和暴动。非洲人民在各种激烈的斗争中遭到了帝国主义疯狂的屠杀和迫害，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更高地举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

二是斗争的地域发展得更为广泛，人民的团结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 1960 年这一年里，从北非到南非，从西非到中非、东非，斗争此伏彼起，前后呼应，相互声援，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同摩洛哥人民反对美法两国军事基地的斗争以及突尼斯人民反对法国在比塞大的军事基地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南非联邦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得到非洲各国人民广泛的声援。在西非，继加纳独立之后，一个接一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马里共和国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行动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非，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号鲸吞刚果的阴谋，刚果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中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人民正在为解散联邦殖民政府、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而斗争。在东非，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等各国人民正在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提高到争取独立的斗争。一向被视为安定的安哥拉等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在 1960 年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行列。非洲任何一个角落响起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号角，都会很快地赢得非洲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坚决

支持。在民族独立斗争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全非性的团结会议纷纷召开。在 1960 年一年里，这样的会议就召开了四次。这些民间性的和政府性的会议，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加强和推动了非洲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

三是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非洲各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觉悟。这首先表现在非洲人民要求继续扩大民族独立的成果。新独立国家的人民并不仅仅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他们进一步要求废除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的所谓防御条约和军事基地，撤换政府机关和军队里的外国殖民官员、顾问和军官；在经济上要求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收回货币发行权，建设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在外交上要求执行独立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几内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走在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前列。非洲人民觉悟的提高还表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深化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刚果人民反对冲伯集团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例子。

四是非洲人民从自己切身的斗争经验中开始进一步懂得，为了争取本民族的彻底解放，不仅要继续反对英、法、比、葡等老牌殖民主义者，而且还要同时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许多对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认识不清或者抱有幻想的民族主义者，从美国在 1960 年侵略刚果的罪行中吸取了教训。非洲人民纷纷为此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几内亚和埃及等政府还宣布把他们派往刚果的军队从美国操纵之下的联合国军中撤出来。

1960 年非洲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非洲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豪迈地把 1960 年称为“非洲年”。

非洲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

六七十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1960—1970 年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有 3/4 的非洲国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特别是 1960 年代可称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峰年代，非洲大陆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这个年代里实现了独立。继 1960 年 17 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1961—1969 年又有 16 个非洲国家先后实现了独立，它们是：塞拉利昂（1961 年 4 月 27 日）、坦噶尼喀（1961 年 12 月 9 日）、卢旺达（1962 年 7 月 1 日）、布隆迪（1962 年 7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1962 年 7 月 5 日）、乌干达（1962 年 10 月 9 日）、桑给巴尔（1963 年 12 月 10 日独立，1964 年 4 月 26 日与坦噶尼喀联合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1963 年 12 月 12 日）、尼亚萨兰（1964 年 7 月 6 日，独立后更名马拉维）、南罗得西亚（1964 年 10 月 24 日独立后更名赞比亚）、冈比亚（1965 年 2 月 18 日）、贝专纳兰（1966 年 9 月 30 日独立后更名博茨瓦纳）、巴苏陀兰（1966 年 10 月 4 日，独立后更名莱索托）、毛里求斯（1968 年 3 月 12 日）、斯威士兰（1968 年 9 月 6 日）、赤道几内亚（1968 年 10 月 12 日）。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 1960—1970 年代实现独立，首先是非洲人民长期坚持斗争的结果。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 1950 年代下半期起进一步加强了反殖斗争，更沉重地打击了殖民统治当局，迫使他们考虑非洲殖民地的独立问题。坦噶尼喀的工人在劳工联

合会及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下,在 1958—1960 年间共进行了 561 次罢工,参加人数达 24 万人,使殖民者损失 200 万个工作日。罢工工人在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国家独立的强烈要求。桑给巴尔人民于 1959 年举行了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又于次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在桑给巴尔设立导弹基地,约占全国 1/3 的人参加了活动,显示了广大人民爱国情绪的高涨。乌干达人民于 1960 年 9 月举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示威,要求独立与自由。肯尼亚工人在 1962 年的 3—10 月期间曾举行了 150 次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及废除殖民统治等要求。

非洲各殖民地人民除了开展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形式反对殖民主义外,有一部分殖民地人民还采取起义、暴动、游击战等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殖民主义。阿尔及利亚人民从 1954 年举行起义后,直至 1960 年代初仍坚持武装斗争,给法国殖民主义以沉重的打击。1960 年代,又有几个非洲殖民地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开展反殖武装斗争。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等政党领导下,于 1961 年起进行武装斗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分别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下,先后于 1963 年和 1964 年也开展了民族独立战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两国人民均于 1966 年分别掀起了反对罗得西亚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这些国家武装斗争的崛起和非洲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游行示威等群众运动相结合,把非洲反殖斗争推向高潮,这是迫使西方殖民主义纷纷承认非洲国家独立的最根本的动力。

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提高和反殖斗争的加强是与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

其一，这时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存在着十多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不仅在道义上、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军事上给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以物质支持。中国曾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殖民地人民反对法国、葡萄牙及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就是明显的一例。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加强了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

其二，这时东亚、南亚、中东、拉美地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它们不仅为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而且也给予积极的支持。继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于1961年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会议在宣言中提出要“立即无条件地、彻底地和最后地废除殖民主义”。至1970年代末，不结盟国家共召开了六次首脑会议。每次首脑会议都在文件中声援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几次首脑会议还具体表示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许多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这对非洲的反殖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其三，至1950年代末，北部非洲除阿尔及利亚外都已实现了独立，西部非洲的加纳、几内亚也已实现了独立，这时独立国家在1960年代以后大力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成为他们反殖斗争的后方基地。如几内亚比绍的非洲独立党就曾把总部机关和一些训练营地设在邻国几内亚共和国的境内，这对于它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直至最后摧垮葡萄牙殖民帝国起了重要作用。安哥拉、津巴布韦等民族解放组织也曾以扎伊尔、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的领土作为反殖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

1963年5月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成为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协调政策、支持未独立国家争取解放的重要的国际组织。非统组织除了在宗旨中强调“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外，还专门成立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负责支持非洲各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具体事务，并在历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对反殖斗争表示关注和支持，这对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四，英、法、比、葡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和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为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某种可以利用的条件。美国一方面支持老殖民主义国家镇压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趁机大力向非洲渗透，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妄图取而代之。美国 and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争夺就是明显的一例。美国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提供武器弹药，但又几次策划法国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秘密军队组织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戴高乐政权。美国和比利时、法国等西欧国家在扎伊尔也曾存在尖锐的对立。西方阵营的这种裂缝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非洲独立运动。

其五，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竞相插手非洲，这对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既有不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苏联为了争夺非洲的势力范围，极力把自己打扮成非洲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为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及物质援助，支持殖民地的反殖斗争。而美国为了抵制苏联对非洲的渗透，也促使老殖民主义国家在有些殖民地改变武力镇压及旧殖民统治的模式，这都有利于非洲殖民地实现国家独立。

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大鼓舞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斗争，而反殖斗争的蓬勃发展是迫使殖民主义者承认殖民地独立的主要原因。在反殖斗争的打击和威胁下，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在非洲的利益，纷纷改变旧殖民统治的制度与方法。

从地区分布看，1960—1970 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绝大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只有阿尔及利亚于 1962 年实现了独立）；从打击目标看，逐渐由英国、法国转向葡萄牙、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发展道路及斗争形式看，逐渐由以和平的、非暴力为主的形式转向以暴力斗争为主的形式；从反殖队伍及领导力量看，团结问题成为影响运动的重大问题；从国际环境看，有利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发生作用。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1960—1962 年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解放阵线除了继续领导武装斗争外，还在法国占领区发动各阶层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开辟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在此基础上，民族解放阵线又派出代表同法国进行谈判。由于这三条战线紧密配合，接连取胜，阿尔及利亚终于在 1962 年获得了独立。

从军事战线看，由于殖民军构筑的莫里斯防线、西部防线及夏尔防线于 1959 年相继被民族解放军所击破，法军于同年 7 月发动的规模空前的攻势也被挫败，殖民当局所实行的“重点围剿、重点扫荡”战略宣告破产，此后转而采取“固守要点、全面封锁”的战略，即退守

主要城镇，守住主要交通线、石油产区及东西边境防线，对解放区进行封锁。殖民当局的封锁政策并没有能够抑制反殖力量的发展。至 1960 年代初，民族解放军兵力已达 15 万人，尽管在数量上仍少于殖民军警，但士气高昂。已解放和控制了全国 4/5 的土地。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且也面临空前有利的国际形势。1960 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反帝反殖为主要内容的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全非人民会议的召开，1960 年 17 个非洲国家的独立，法国国内民主人士反对殖民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的日益高涨，所有这些都鼓舞了阿尔及利亚各阶层人民的反殖斗争，打击了法国坚持殖民统治的势力。

在法国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情况下，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被迫决定对阿尔及利亚实行如下的政策：一方面改变过去一直采取的维护旧殖民制度的政策，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设法使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继续受法国实际上的控制与剥削，尽可能地推迟其独立的时间，并尽可能多地保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利和利益。1959 年 9 月 16 日及 1960 年 6 月 14 日，戴高乐先后在两次讲话中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自决权。从 1960 年 6 月起，法国的代表在多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代表举行公开及秘密的谈判中都极力要保持与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

从 1960 年至 1962 年 3 月，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遭到了法军中的右翼将领和法国移民中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部分大庄园主及其政治

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政策，组织秘密军队，多次策动武装叛乱，大搞恐怖活动。戴高乐政府从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这部分反对派采取了镇压和惩治行动，坚持其殖民主义的新政策。

自1959年9月戴高乐发表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有自决权的演说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政府即重视运用武装斗争和谈判斗争的两手策略，并发动法占区人民开展反殖运动，从三条战线上打击殖民势力。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机构从1959年12月16日起在黎波里举行会议，并于1960年1月19日发表声明，除了重申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决心外，还表示将尽力争取和平解决独立问题。民族解放军利用法军退守主要城市、交通线、产油区及边境防线的形势，在战场上广泛出击，仅在1960年头三个月中就对突阿边境的法国殖民军防线进行了400多次出击，平均每天出击4次以上，对法军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与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遥相配合，法国人民于1960年2月举行了有1300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反对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右翼将领在法国发动的叛乱，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撤除街垒。在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打击和法国人民要求停止殖民战争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于1960年6月14日宣布它准备谈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拟派遣一个以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代表团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会晤，并先派以布曼杰尔为首的代表团在巴黎附近的默伦同法国政府代表团举行预备性会谈。

在默伦举行的预备性会谈从6月25日开始，至29日结束，前后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中，法国代表提出今后的谈判将按照戴高乐总统提出的建议举行，以便使

阿尔及利亚的战斗得到“光荣的结束，解决军火的处理问题并保证战斗人员的命运”，这实际上是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投降。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均遭法方拒绝。法国代表还提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谈判期间除了同突尼斯的联系外，不准同法国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接触，不得接见访问的人等等。由于法方蛮横地单方面决定今后谈判的内容及条件，这次预备性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双方的正式会谈也就无法进行。

默伦会谈破裂后，法国殖民当局一方面调遣大部分兵力加强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挣扎，企图靠法军数量上的优势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极力制造“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的假象，企图在那里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并把撒哈拉地区大片土地从阿尔及利亚分割出去，成为法国永久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一方面坚决在战场上抗击法国殖民军，使殖民当局每天平均消耗 30 亿法郎的军费；另一方面大力发动法占区人民的抵抗运动，开辟第二战场。

1960 年 12 月 11 日，法占区人民的反殖大示威从阿尔及尔的贝尔古穆斯林居民区爆发。成千上万的青年、妇女、老人及儿童涌向街头，高举阿尔及利亚国旗，高呼“阿尔及利亚独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宁死不屈、斗争到底”等口号。当殖民军警开枪镇压时，群众筑起街垒和路障，示威转为起义。当军警包围贝尔古居民区时，起义人民使用木棒、石块和匕首同法国军警展开拼搏。贝尔古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得到法占区穆斯林居民的响应。1960 年底至 1961 年，阿尔及尔、奥兰、奥尔良维尔、君士坦丁等十多个重要城市都连续爆发大

规模的罢工、罢业和示威游行。法国当局惊呼，这是对 130 年来法国统治的“最严重的公开挑战”。

殖民当局为了缓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情绪，扶植傀儡政权，于 1961 年 1 月举行公民投票。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临时政府领导下，坚决抵制这次投票。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向谈判，于 3 月 15 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举行谈判。双方原定 4 月 7 日正式开始谈判，但由于法国政府宣布同时要与亲法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举行谈判，否定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和谈判对象，谈判又暂告搁浅。4 月 22 日，以右翼将领夏尔为首的法国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然于 25 日被法国政府镇压下去，但美国对这次政变的暗中策动及支持明显暴露了美国争夺阿尔及利亚的野心，促使戴高乐又启动谈判机器。

1961 年 5 月 20 日，阿法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湖畔的埃维昂开始谈判。法国一再提出双方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法国代表正式提出中止进攻问题，单方面宣布停战一个月，企图压阿尔及利亚接受停火，而法军在战场上实际并未中止进攻，继续在“自卫”的借口下对民族解放军开火。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会上拒绝了法国的要求，并在战场上痛击法军，使法国妄图通过谈判迫阿尔及利亚放下武器的阴谋破产。6 月 8 日，法方在谈判中提出了所谓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把占阿尔及利亚领土 $4/5$ 的撒哈拉地区分割出去，由属于法国主权的领地所控制；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将组织一个可以管理和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团，以继续享有特权；保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基地。阿尔及利亚在谈判中坚持在全部领土上实行自决和独立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将保证境内法国人的正当利益，并可讨论双方未来的合作及撒哈拉地区的开发问题。6月13日，法国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

第二次谈判破裂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决定把7月5日作为“全国反对分割日”，号召全体人民继续斗争，挫败殖民当局的分割计划，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走向独立与和平。全国各地人民响应临时政府号召，举行示威游行，再次显示了反殖的决心。法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正义舆论都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立场，要求法国停止殖民战争。7月20日，法国政府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派代表在埃维昂附近的吕格兰堡与阿尔及利亚恢复谈判。在谈判中，阿尔及利亚代表本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提出五项议题的建议：对自决的保证及其实施范围；从停火到自决的过渡时期；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保证，双方合作和停火的技术安排。为推动谈判顺利发展，阿尔及利亚对有些具体问题还表示可作让步。但法方却顽固坚持戴高乐政府的既定政策，不承认临时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主权，力图保持其殖民特权。谈判又第三次破裂。

在谈判期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一直没有放松警惕。1961年下半年及1962年初，民族武装在许多重要的法国殖民军据点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奥雷斯、卡比利亚、北君士坦丁、提特里、瓦尔斯尼斯、特兰仙山脉、赛伊达以及卡扎尔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使法军遭重大损失。法国国内的各阶层人民从1961年11月开始又掀起了反对殖民战争的示威与罢工浪潮，到1962年2月8日达到了高峰。法国政府被迫于1961年12月和1962年初同阿尔及利亚代表秘密会谈。1962年

3月7日，双方恢复埃维昂的正式谈判。阿尔及利亚代表既坚持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又讲究斗争的策略，同法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妥协的基础上，双方终于在3月18日签署了埃维昂协议。

埃维昂协议规定，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通过直接和普遍的投票，决定他们同法国关系的前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同法国合作下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阿尔及利亚国家对内对外将行使其充分和完全的主权；在实现自决后，法军将立即从阿尔及利亚边境撤退；同意法国租借米尔斯、克比尔基地15年，期满后还可以续借；允许法国使用它所需要的某些军用机场、场地、地段和设施；法国承担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为期三年的经济援助，法国公司保持它们在阿尔及利亚的石油租借权，而且享有取得新租借权的优先权。协议还对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过渡期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大赦等问题作了规定。按照协议，阿法双方于3月19日停止敌对行动。7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自决投票，99%以上的人赞成独立。两天后，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年7月5日成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日。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砸碎了持续130年之久的殖民枷锁，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统一，为独立后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创造了最基本的政治条件。独立30多年来，阿尔及利亚推行土地改革和高速工业化战略，经济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独立初期不到300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2320美元。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牵制了法国近百万的军警武装力量，消耗了法国近百亿美元的财

力和大量物力，消灭了 10 万以上的殖民军，促使法国内部各种矛盾尖锐化，因而大大地削弱了法国控制和镇压其他殖民地的力量，迫使法国在 1950 年代中期和 1960 年代初期同意许多法属殖民地独立，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斗争，为他们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力量在 1954 年起义时只有游击队员 3000 人，被殖民者称为“乌合之众”。但他们并没有被武装到牙齿的 10 万殖民军所吓倒，敢于以游击战与敌军周旋，先后粉碎了殖民者的全面围剿和重点围剿。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武装斗争、和平谈判、发动敌占区人民反殖运动、争取法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支持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的反殖武装斗争及其他非洲殖民地的争取独立运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主动调解两伊战争，坚决反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策，支持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积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重要力量。

刚果事件分析

刚果原系比利时殖民地，1960 年 6 月独立时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1971 年 10 月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刚果独立后的第八天，即遭比利时的入侵。不久，美国也乘机操纵联合国军队开入刚果。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

量和政治欺骗，先后颠覆了卢蒙巴政府和基赞加政府，杀害卢蒙巴（1925—1961），监禁基赞加。他们扶植刚果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建立傀儡政权，镇压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企图永久控制刚果。新老殖民主义者还以刚果为战场，互相争夺、倾轧，发生多次火并。刚果事件不仅使刚果人民在实践中提高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刚果独立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仍然继续完全控制着刚果的军队。军队司令让桑正是前比利时殖民军总司令。他是 1959 年指挥比利时殖民军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刚果士兵和广大人民对此非常不满。从独立后的第六天开始，刚果士兵即走出兵营，举行示威，要求政府撤换让桑及其他全部殖民军官，代之以刚果人。由于刚果爱国军民驱逐比利时军官、维护国家主权的运动激怒了比利时殖民者，从 7 月 8 日开始，比利时悍然对刚果发动武装侵略，除命令驻扎在刚果基地上的殖民军干涉刚果爱国运动外，还从本土增派兵力前往参加战斗，比利时的伞兵部队在刚果降落，对刚果爱国军民进行粗暴镇压。比利时殖民者还伙同英国与冲伯反动集团相勾结，在加丹加省宣布成立加丹加共和国，策动卡隆吉集团在开赛省成立开赛矿业国。

比利时军队的侵略遭到刚果军民奋起抗击。保卫祖国独立和统一的斗争迅速在刚果各地开展起来。尽管侵略者出动飞机，甚至使用了火箭，但刚果爱国军民在许多地方仍击退侵略军的进攻。刚果最大海港马塔迪的军民冒着敌人飞机、火箭的袭击，接连地打退了企图包围港口的 1500 名比利时伞兵部队的进攻，并且击落了 1

架比利时侦察机。在太斯维尔，刚果军队击落击伤了 3 架入侵的比利时军用飞机，并曾多次击退侵略军的攻势。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部分居民拿起武器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居民成群结队地用石块还击殖民者，和士兵一起战斗。刚果爱国军队还向冲伯集团所控制的加丹加省展开勇猛的进攻。

正当刚果爱国军民英勇抗击比利时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候，刚果总理卢蒙巴由于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本质认识不清，竟然同刚果总统卡萨武布一起打电报给联合国，要求给予刚果以紧急的军事援助，这正好给美国干涉刚果提供了藉口。刚果事件一开始，美国即做好了插手刚果的准备，扬言美国“有必要以任何适当的手段保住侨民的生命”。卢蒙巴要求援助后，美国于 7 月 13 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联合国军队到刚果，并要求比利时撤军。联合国军队进驻刚果后，按美国的旨意，不仅没有援助刚果人民抗击比利时侵略军，反而和比利时串通一气，对刚果的重要城市和港口实行军事占领。连刚果的飞机场和国家电台也禁止刚果政府使用。

刚果人民对联合国军队由开始时的怀疑、警惕很快地转向公开反对。在马塔迪和卢卢阿堡等重要港口和城镇，当联合国军解除刚果爱国士兵的武装时，一部分刚果士兵拒绝放下武器，坚持斗争。在东方省，刚果士兵继续保持警惕，解除了所有殖民者的武装。有些地方的爱国军民还携带武器转入农村及山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刚果总理卢蒙巴也从联合国军的罪恶行径中受到教育，8 月 9 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刚果永远不做联合国的殖民地，永远不接受联合国的托管”。他还

致函联合国驻刚果代表，并派遣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总部，抗议联合国军封闭刚果各机场和国家电台，要求他们撤出机场和电台。在9月7日举行的刚果议会的一次会上，卢蒙巴要求联合国军从刚果撤走。

卢蒙巴政府对联合国军的不满和反对成了美帝鲸吞刚果的一个障碍，美国即加紧颠覆卢蒙巴政府。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下令罢免卢蒙巴总理、基赞加副总理及其他几位政府高级官员。卢蒙巴对此进行了反击，于第二天举行部长会议非常会议后发表公报，宣布卡萨武布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决定撤除他的国家元首职务。9月7日，刚果议会通过决议，认为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总理职务的决定及刚果部长会议解除卡萨武布总统职务的决定都是无效的。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仍然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刚果议会参众两院议长还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抗议联合国干涉刚果内政，同时声明完全信任卢蒙巴政府。9月13日，刚果议会两院举行特别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授于卢蒙巴政府以全权。次日，卡萨武布和他所任命的刚果新总理伊里奥签署命令，宣布议会休会一个月。同日，刚果军队参谋长蒙博托在刚果国家电台宣布，卡萨武布、卢蒙巴政府及议会两院即日停止行使职权，由他接管政府并执掌总统和总理的权力。据路透社消息，蒙博托在接管政权以前曾到联合国军总部与他们会谈过。9月15日，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总理。支持卢蒙巴政府的军队由东方省首府斯坦利维尔开赴首都恢复秩序时，受到联合国军的阻挠。而反对卢蒙巴的军官却可以自由地从太斯维尔和其它地区调遣其所控制的部队，对支持卢蒙巴的部队进行攻击。反对卢蒙巴的集团在联合国军的支持下，封闭议会大厦，成立专

家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卢蒙巴被软禁后行动受到限制。为了摆脱联合国军及反政府集团的控制，卢蒙巴于 11 月 27 日离开首都前往斯坦利维尔，12 月 1 日在卢卢阿堡的弗朗基港被反政府集团所绑架，拘留于太斯维尔的哈迪兵营。1961 年 1 月 17 日被转移到加丹加，不久即被杀害。

在卢蒙巴被绑架以后，刚果合法政府副总理基赞加于 1960 年 12 月 13 日宣布代理总理职务，并将合法政府迁往斯坦利维尔。这时该政府控制着东方省、基伍省和加丹加省、开赛省的北部地区，面积约占全国的一半。伦杜拉将军为军队总司令，统率着包括原第三军团全体官兵在内的一支军队。1961 年 2 月 24 日。政府军攻入开赛省省会卢卢阿堡，并占领弗朗斯港。该政府在外交上得到埃及、马里（独立前称法属苏丹）、加纳、摩洛哥、伊拉克，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古巴等 20 多个国家的承认。

当基赞加政府军开入卢卢阿堡后，盘踞在利奥波德维尔省和赤道省的卡萨武布—伊里奥政权和冲伯集团及卡隆吉集团于 2 月 28 日缔结了军事协定，共同反对基赞加政府。他们于 3 月 8—12 日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召开会议，决定把刚果改建为由 16 个独立自主共和国组成的邦联，由卡萨武布担任邦联主席。4 月 24 日，他们又在赤道省的科基拉特维尔开始举行会议，决定刚果为联邦共和国，由 23—25 个共和国组成，全国设统一的联邦议会与代议制政府。会议还建议给总统以任命部长的广泛权力。上述几次会议后，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和卡萨武布等反对合法政府的集团对基赞加政府展开政治诱骗、经济封锁、军事围困等一系列活动。在一阵紧锣

密鼓之后,1961年7月22日—8月2日在洛瓦宁大学举行刚果议会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一个新政府,作为第一届中央政府的合法继承者。政府总理由卡萨武布集团的阿杜拉担任,基赞加担任副总理。9月9日,基赞加到利奥波德维尔正式就职,以前设在斯坦利维尔的合法政府宣布解散。1962年1月15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被联合国军和阿杜拉军队软禁,并被撤去副总理职务。2月3日,他被押送到莫安达城,后又被囚禁到布拉姆邦巴岛。

在基赞加领导的合法政府被解散之后,美国又集中力量打击比利时和英国、法国在刚果的势力。这是长期以来新老殖民主义争夺刚果的继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即加紧侵入刚果,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扩大对刚果的直接投资、贷款及收买股票等方式,渗入刚果的各个经济部门。美国垄断资本在刚果的投资,到刚果宣布独立时已达6亿美元,仅次于比利时。美国还迫使比利时向它提供刚果出产的战略原料。在1953—1954年度,美国从刚果取得了它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的铀和锂、96%的钴、88%的锡、87%的工业用钻石、79%的钽、64%的锰。美国从刚果掠取的资源总值从1937年的300万美元增加到1957年的1亿多美元,占美国从非洲各国进口总值的第一位。

正由于刚果在战略上对美国有重要意义,所以当刚果事件一发生,美国即迅速抓住机会,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为了镇压刚果人民的反殖斗争及颠覆刚果合法政府,美国在初期不仅纵容比利时向刚果增兵,而且支持它对加丹加傀儡政权的扶植。卢蒙巴被杀害后,美国于1961年2月21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

采取措施从刚果立即撤走比利时的和不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国籍的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和政治顾问及其雇佣军。决议通过后的半年期间，有 200 多个欧洲人撤出了刚果，还有 100 多个欧洲人仍在加丹加宪兵部队服役。基赞加政府解散后，美国认为全面鲸吞刚果的时机已到，于是调动联合国军队和阿杜拉政府军集中力量摧毁盘踞在加丹加地区得到比利时、英国、法国支持的冲伯集团。

加丹加地区战略资源十分丰富，有“地质学上的奇迹”之称。在 1950—1960 年代，其矿产占刚果矿产总额的 80%，该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刚果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是比、英、法等国垄断资本在刚果投资的中心地区，也是它们控制中、南非洲矿产资源的枢纽。美国要全面控制刚果，就必须排挤比、英、法的势力，驯服冲伯集团，从而掌握加丹加的资源。当安理会按美国的要求于 1961 年 2 月 21 日通过决议后，比利时、法国等不仅没有全部撤走其军事人员，而且还把大批军用物资交给冲伯集团，并帮助它扩充军队，准备顽抗。

1961 年 8 月 24 日，刚果总统发布命令，决定将非刚果人的军官和雇佣军从加丹加驱逐出去。接着，联合国当局勒令冲伯与阿杜拉政府和好，否则将用武力解决问题。9 月 13 日，联合国军向加丹加军队进攻，遭反击而被迫停火。9 月 21 日—11 月初，阿杜拉军队分两路攻打加丹加，都没有取胜。1962 年 12 月 27 日，联合国军又向冲伯军队进攻，28 日占领了加丹加首府伊利沙伯维尔。1963 年初，联合国军击败冲伯军队，加丹加共和国覆灭。

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队和阿杜拉政府军在击溃加丹

加军队后，美国垄断资本更大量地涌入刚果。1963年美国在刚果的投资比1961年增加了一倍，达12亿美元。1962年美国对刚果的出口额猛增至6800万美元，为1961年的3倍，使美国成为刚果市场的首要供应者。美国及其所支持的阿杜拉政权对刚果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法西斯统治使刚果经济遭严重摧残，农业歉收，财政恶化，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增加，刚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及阿杜拉政权对刚果的统治和掠夺，激起刚果各阶层人民的反对。1961年11月，基伍省金杜地区和果马地区的刚果士兵先后爆发了反对联合国军队挑衅和干涉的斗争。当联合国军占领金杜城区后，当地的大部分刚果士兵转入丛林地带坚持斗争。1962年11月23日，刚果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反对卡萨武布—阿杜拉集团残暴统治的决议。1963年6月，刚果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释放基赞加。刚果统治集团不仅对这些合理意见和要求置之不理，反而于9月解散议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刚果民族运动党、非洲团结党等四个主要的民族爱国政党都遭取缔。

反动势力的镇压阻挡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各进步党派的领导人于1963年10月建立了全国解放委员会，首先在西部克韦卢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起义。1964年初，刚果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起义烈火由克韦卢地区迅速蔓延到东部的基伍省、北加丹加地区、宽果地区和东北部的斯坦利维尔地区。起义群众袭击敌人据点，占领敌人盘踞的机场，切断交通，击毁敌人的飞机、车辆、解放许多村庄和城镇。在广大人民爱国斗争的影响下，北加丹加省阿杜拉军队的士兵也举起义旗，占领省会，逮捕省长及省政府的其他

官员。西方通讯社惊呼这是 1961 年以来刚果“最为危急的局势”。1964 年 6 月，联合国军队被迫撤出刚果，阿杜拉政权也随之瓦解。

美国为了缓和它同老殖民主义之间在刚果的矛盾，纠集更多力量镇压刚果的反美爱国武装力量，起用冲伯作为刚果政府总理。冲伯上台后，即玩弄“全国和解”的阴谋，妄图分化瓦解爱国力量。当这个阴谋破产后，美国又企图拉拢非洲其他国家拼凑雇佣军，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去直接干涉刚果，把刚果变成其特种战争的另一个试验场。但这个侵略计划也没有得逞。在和平伪装及“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阴谋被戳穿后，美国即加紧对刚果实行武装干涉。1964 年 8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除了紧急运送坦克、飞机及其他军事物资去刚果援助冲伯政权外，还派遣军事人员包括伞兵及空军人员到刚果，冲伯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招募大量欧洲人雇佣军，和它原有的军队一起向爱国武装力量大举进攻。但爱国武装斗争继续发展，在 8 月又相继攻占了刚果第三大城市斯坦利维尔、锡矿中心马诺诺、中刚果省会利萨拉和北部重镇奔巴等地，解放了全国 1/3 的领土。

在上述形势下，美国走上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刚果的道路。1964 年 11 月 24 日，在美国总统约翰逊亲自指挥下，美国派遣飞机运载数百名比利时侵略军空降斯坦利维尔机场，配合冲伯反动军队向刚果爱国武装控制下的斯坦利维尔发动武装进攻，并强行占领了斯坦利维尔。美、比侵略军在引进冲伯伪军后被迫撤出斯坦利维尔市。美国直接侵略刚果的行径激起刚果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疯狂镇压和分

化瓦解下，刚果全国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剧，削弱了爱国力量，各地区的爱国武装斗争先后遭到挫折。

刚果事件说明，非洲国家要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不仅要识别和警惕国内的敌对势力，也要注意识别和警惕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爱国力量在初期对比利时老殖民主义的本质认识较清楚，而对美国及其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本质认识不清，结果导致“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悲剧。后来联合国军对刚果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使卢蒙巴认清了联合国军的面目并要其撤走，但为时已晚。血的代价教育了刚果人民。有一位刚果领导人说得好：“假如说，一年多以前，在刚果还有人曾把联合国军看作是他们的‘救星’，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苦难深重的刚果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联合国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刚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刚果事件也说明，非洲国家必须建立起能真正保持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军队，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刚果独立后，卢蒙巴政府没有抓紧认真地解决军队问题，军队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支持合法政府的爱国军官手中，基赞加政府没有很好地接受卢蒙巴的教训，迷信议会而不重视掌握和发展爱国武装。刚果事件还说明，非洲国家内部各民族、各部族、一切爱国力量要加强团结，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非洲统一组织

1963年5月22—26日，31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

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非洲未独立国家的一些民族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于 5 月 25 日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宣告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或“非统”）。这是非洲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不包括殖民主义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它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与加强它们之间在政治、外交、经济、文教、卫生、科技、防务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保卫它们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努力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对联合国宪章给予应有尊重的情况下促进国际合作。

非统组织是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非洲人民要求在非洲大陆全部铲除殖民主义的情况下成立的。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正是非洲人民反殖斗争蓬勃发展的时期。至 1962 年底，非洲已有 33 个独立国家，还有 20 个国家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南部非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与南罗得西亚及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相勾结，残酷镇压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非统组织的建立正是非洲已独立国家为了加强团结、协调政策，更有力地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以实现非洲全面的非殖民化。

非统组织也是在泛非主义广泛传播、非洲人民强烈要求实现非洲统一的情况下成立的。泛非主义主张非洲人民团结反殖、争取国家独立，也主张非洲各国联合起来、实现统一。在 1960 年代以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所以非洲人民集中精力解决国家的独立问题。至 1960 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实现了独立。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除了要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外，还面临着争取本国经济独立及巩固本国的政治独立的任务。要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就需要非洲独立国家加强彼此间的互助、合作、团结与联合。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赞同泛非主义关于非洲联合、统一的思想。恩克鲁玛、纳赛尔、乌弗埃·博瓦尼、阿希乔等都提出了关于实现非洲统一的形式与步骤等方面的主张。非洲统一组织正是在泛非主义思想影响下，并综合考虑各种具体主张的基础上建立的。

非统组织是在克服非洲国家分裂为两大国家集团情况下建立的。1960年末、1961年初，非洲独立国家中出现了两个国家集团：一个是蒙罗维亚集团（前身是布拉柴维尔集团），另一个是卡萨布兰卡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对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刚果问题、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的途径问题、非洲统一的内容及形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团结统一毕竟是非洲各国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刚果实现民族和解及阿尔及利亚反殖斗争的胜利，阻碍两个集团统一的分歧基本得到解决，为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国家组织提供了条件。在促进非洲两个国家集团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起了积极作用。在1962年1月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③上，海尔·塞拉西强调两个国家集团存在着团结的基础，号召非洲国家克服分裂、实现统一。会后，他还在非洲两个集团国家之间进行调解活动，终于弥合裂缝、消除分歧，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为非统组织的诞生地和总部所在地。

非统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开会的法定人数为全体成员的

2/3，一切决议均由 2/3 多数决定。非统还设有部长理事会、秘书处、解放委员会、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教育、文化、科学和卫生委员会，防务委员会）。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或其他部长组成，负责筹备首脑会议等事宜，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秘书处为常设机构，秘书长由首脑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委员会又称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成员国由 1963 年成立时的 11 国扩大到现在的 23 国，其常设秘书处设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负责计划并协调非洲独立国家对非洲未独立国家争取独立斗争的援助。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由 21 人组成，其任务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

至 1990 年 7 月，非统组织已召开了 26 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会议着重讨论非洲国家的领土及边界问题和对南非的制裁问题。第二届至第十六届首脑会议主要讨论非殖民化、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外来势力对非洲的军事干涉等问题。第十七届至二十五届是在 1980 年代举行的，主要讨论了南部非洲、西撒哈拉、乍得、非洲—阿拉伯合作以及非洲的经济问题。进入 1990 年代以来，非统于 1990 年 7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二十六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共通过了 12 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决议。

非统组织不是凌驾于非洲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并不像恩克鲁玛原先所设想的具有一定政府职能的机构。非统宪章规定，各成员国独立存在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各国之间要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各国的内

部事务。根据这些规定，非统组织的决议对于各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但它的建立及存在对非洲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非洲各国领导人定期聚会、沟通思想、协调政策的场所。它在促进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在调解非洲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加强非洲国家的政治团结及经济合作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非统组织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支持尚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在非洲实现全面非殖民化。非统组织宪章第二款第四条规定，非统的目的之一是“从非洲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直至1980年代末，非统组织历届的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几乎都重视和讨论非殖民化问题和非洲的完全解放问题，发表有关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决议，或在宣言中对某些地区人民的争取独立运动表示同情或支持。这些宣言、决议等文献对于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民起着鼓舞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上起了动员舆论、发动各国民主与进步力量对顽固坚持殖民统治的势力施加压力与制裁的作用。

非统组织在进行一般号召动员的同时，还通过它所建立的解放委员会和在它影响下的前线国家组织以及许多成员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支援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解放委员会负责管理援助特别基金及其他有关对解放运动的援助问题。这个机构的成员和预算后来都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工作也不断得到加强。

前线国家组织是由部分非统成员国组成的，形成于1976年，当时的成员国有坦桑尼亚、赞比亚（独立前称

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称贝专纳)。它虽然不是非统组织的一个正式机构,但在贯彻执行非统组织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非统组织和解放委员会的有力助手。前线国家组织除了把解放委员会募集的基金转送给南部非洲各解放组织外,还为它们向世界其他国家争取物质援助,成为向解放运动提供武器、金钱、生活用品、医药设备及训练场所的前沿基地。前线国家组织还促进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各派的团结与统一,如促使南罗得西亚的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人民联盟联合成立统一的爱国阵线,并建议非统组织承认它为南罗得西亚唯一合法的解放运动组织。前线国家组织还通过各种外交渠道促使殖民当局接受谈判,协助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组织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独立。

非统组织的作用还表现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非洲国家的独立、统一与主权方面。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经常面临外国侵略与干涉的威胁,特别是有些内部矛盾较为尖锐的国家更给外来侵略干涉以可乘之机。非统组织一贯奉行反对外来干涉的政策。1964年末,当美国伙同比利时出动伞兵侵入刚果时,非统组织召开第三次例会,对美国、比利时的行为进行了谴责。1967年,当美国、英国、苏联等争相插手尼日利亚内战时,非统组织第四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保障尼日利亚的领土完整、统一与和平。次年,在非统组织第五届首脑会议上,非统主席又警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要干涉非洲事务。

到1970年代,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外来势力干涉非洲的事件日益增多。在超级大国插手下,安哥拉爆发

了内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爆发了军事冲突，扎伊尔（前称刚果）两度遭到雇佣军的入侵。1977年，非统组织举行第十四届首脑会议，着重讨论外来干涉问题，通过了《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会议严正地指出：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决不允许外来势力插手，决不允许超级大国在这个大陆上为所欲为。1978年，非统组织第十五届首脑会议继续把外来干涉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与会各国首脑及代表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和建立非洲干预部队的决议。为了反对外来干涉，非统组织还强调成员国要切实贯彻对一切集团的不结盟政策，并酝酿建立一支泛非部队，作为在非统组织领导下防御外来侵略干涉的武装力量。

除了支持未独立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及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外，非统组织还成立专门的和临时的机构调解非洲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促进非洲各国的团结与合作。非统组织从1984年第二十届首脑会议起，还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经济问题。它号召非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葡属殖民地反殖武装斗争

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有着长期武装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光荣传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都先后被葡萄牙殖民者镇压下去。战后，

葡萄牙殖民者变本加厉地采取强占土地、强迫劳动、贱买贵卖、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等方法，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敲诈与剥削。莫桑比克殖民当局规定，每个黑人男子每年均须为殖民者劳动六个月。殖民官员把这些变相的奴隶送给白人农场主支配，而自己却从中取得巨额的报酬。地狱般的灾难生活，迫使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拿起枪杆子，再次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从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在广大人民不断觉醒的基础上，葡属非洲殖民地先后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它们提出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纲领，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重要条件。

安哥拉在 195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民族主义组织：安哥拉人民联盟（简称“安人盟”）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

安人盟成立于 1954 年，原名北安哥拉人民联盟，1958 年改现名。它在 1960 年公布的纲领中强烈谴责葡萄牙对安哥拉的殖民压迫与种族歧视。1962 年，它与安哥拉民主党联合组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主张争取民族独立。安解阵主席霍尔敦·罗伯托 1923 年生于安哥拉北部圣萨尔厄多城，曾留学美国。1954 年，他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安人盟，1960 年当选为该党总书记，1961 年任该党主席。他所领导的安人盟、安解阵主要在安哥拉西北部地区进行反殖斗争。

安人运成立于 1956 年，由安哥拉非洲人斗争党与共产主义小组联合组成。它于 1960 年代初制订的纲领中提出，“采用一切手段消灭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尽快获得完全独立”，“保证安哥拉一切种族的平等”，在“安哥拉建立共和的、民主的和世俗

的制度”。该党主要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 1922 年生于罗安达，1947 年到葡萄牙大学学习，开始从事反殖活动。1959 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安人运的领导工作，1962 年当选为领导委员会主席。该组织主要在罗安达地区、东部地区及卡宾达地区等地从事反殖活动。

几内亚比绍于 1950 年代中期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最主要的是成立于 1956 年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简称“几独立党”）。其创始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 1924 年生于几内亚比绍的巴法塔市，毕业于里斯本农学院，1950 年返回比绍任农技师。1954 年，他参与建立反殖运动组织，1956 年创建几独立党，担任该党总书记直至 1973 年去世。几独立党的纲领是：“争取真正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独立，打倒葡萄牙和一切殖民主义。”

莫桑比克最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简称“莫解阵”）成立于 1962 年，由原来的民族民主联盟、非洲民族联盟及争取莫桑比克独立非洲民族联盟三个组织联合组成。早期领导人为蒙德拉纳。1969 年蒙德拉纳被刺后，萨莫拉·马谢尔成为该党领袖。萨莫拉 1933 年生于莫桑比克南部加扎省，1963 年参加莫解阵，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接受军事训练。1964 年，他率领游击队进入莫桑比克北部，打响了反殖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从此，他先后担任莫解阵军事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 年当选为莫解阵主席。莫解阵的纲领是争取早日实现莫桑比克的完全独立，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莫桑比克。

葡属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建立之后，一般都

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为反殖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当民族解放运动于 1950 年代在葡属非洲各殖民地兴起时，葡萄牙殖民当局不仅玩弄欺骗花招，妄图瓦解反抗运动，而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极力扼杀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56 年后，葡萄牙萨拉查政权为了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把原来用于本土的国家秘密警察先后派遣到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到 1958 年中，在几内亚比绍就建立起 5 个新的警察分队、11 个特别警察哨所。他们监视殖民地人民的行动，取缔民族主义组织，搜捕对殖民当局不满的人，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1959 年 8 月，殖民军警在比绍市向罢工的码头及港口工人开枪，打死 50 多人，打伤 100 多人。同年，殖民当局在安哥拉实行大逮捕，安人运领导人内图被捕入狱，另一领导人达克鲁斯流亡国外。1960 年，殖民军警在莫桑比克北部木韦达地区向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500 多人。在殖民者残酷镇压的情况下，采取和平形式的斗争已难于实现独立，这就迫使殖民地人民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正如安哥拉一位民族主义者弗洛伦蒂诺·杜瓦蒂所说：“葡萄牙殖民主义懂得的唯一语言是武装镇压”，“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别无办法”。

安哥拉是战后葡属非洲第一个开展反殖武装斗争的殖民地。1961 年 2 月 4 日，安哥拉的民族主义者拿起武器，袭击了首都罗安达关押政治犯和爱国者的监狱及警察总部。同年 3 月中旬，安哥拉北部的刚果省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袭击了殖民当局的军事据点和

殖民者的种植园。从此，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61 年的两次起义是由安人运和安人盟分别领导的。起义者所用的除了一小部分是从敌人手里夺取来的现代化武器外，绝大部分都是木棍、砍刀以及自制的土枪、土炮等。安哥拉人民怀着对殖民主义者的深仇大恨，以简陋的武器英勇地同敌人搏斗。起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斗争烈火即席卷安哥拉西北部各州，起义者一度控制了从罗安达到马兰热铁路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起义爆发后，殖民当局立即派遣大批军队、警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安哥拉人民实行残酷镇压。仅在一天内，殖民军警在罗安达即屠杀了 3000 名非洲人。从 1961 年 3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的两个多月里，殖民者炸毁了 25 个村庄，屠杀了 3 万非洲人。葡萄牙总理萨拉查自己兼任国防部长，发誓要把安哥拉民族解放战争镇压下去。葡萄牙政府大量增加军事拨款，仅 4 月初的一次拨款即达 2100 万英镑；并陆续向安哥拉增派武装力量，对起义人民加紧围剿。在残酷镇压起义的同时，1961 年 8 月，葡萄牙当局又宣布对殖民地实行根本改革。他们撤销《土著法》，形式上承认殖民地人民为葡萄牙公民，增加非洲人在葡萄牙国民议会中的议席，允诺在殖民地发展教育、建筑城市住宅、增建医院、修筑公路等，妄图以此欺骗殖民地人民。

殖民当局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都未能扑灭安哥拉人民反殖武装斗争烈火。1962 年 4 月，安解阵宣布成立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并把武装力量改组为民族解放军。这支力量除了继续坚持在安哥拉西北部山林地区活动外，从 1966 年开始还扩展到马兰热的卡松加地区及靠近

扎伊尔沙巴地区的东部边境一带进行反殖斗争。安人运于 1963 年初在卡奔达开避新战线,并设立培训游击队干部的中心,1964 年又在东部丛林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966 年 5 月,安人运的武装在卢祖镇附近袭击葡军,开始了东部战线的武装斗争。

除了上述两支反殖武装外,1966 年又出现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领导的反殖武装力量。安盟主席萨文比 1934 年生于蒙汉戈,1958 年曾到里斯本大学学医,1961 年加入安人盟,任总书记。1964 年因与安人盟主席罗伯托发生政见分歧,他退出安人盟,另组安盟。1966 年 3 月,安盟在安哥拉东部地区建立游击基地,创建了安哥拉解放军。

在安哥拉爆发武装斗争后,几内亚比绍人民也加紧准备武装斗争。1963 年 1 月 23 日,由几独立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热巴河南岸的蒂特市向殖民军发起进攻,开始了武装斗争。起义人民以弓箭、匕首、砍刀以及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同比自己强大好多倍的敌人拼杀。至同年 3 月,爱国武装力量控制了南部地区,武装斗争向几内亚比绍全境发展。

1964 年初,殖民当局调集 3000 名精锐部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海上向南方科莫岛的游击队反扑,妄图重新占领这个岛屿作为进攻南部解放区的跳板。在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科莫岛爱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接连几次击退敌人的登陆部队。经过 75 天战斗,他们击毙击伤殖民军官兵 650 名,还击毙司令官 1 名,击沉击伤汽艇 13 艘,击落击毁飞机 5 架,于同年 4 月粉碎了殖民军的进攻,取得了科莫岛保卫战的胜利。在这次战役的鼓舞下,北部爱国军民也相继击退敌人的多次

进犯。同年底，爱国武装力量又在莫雷斯地区打退 1000 名殖民军的入侵，打死打伤 750 多名敌人。

在几内亚比绍人民抗敌保卫战节节胜利的时刻，莫桑比克也爆发了反殖武装斗争。1964 年 9 月 25 日，莫解阵发表了《武装大起义宣言》，号召人民举行反殖起义，为实现莫桑比克的彻底独立而斗争。莫桑比克爱国武装力量随即在德尔加多角州的沙伊镇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在起义后的第一年里，武装斗争扩展到全国一半领土。游击队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袭击殖民军据点、监狱及政府机构，狙击敌军卡车，偷袭火车及巡逻艇，给殖民当局以沉重打击。莫解阵的武装力量从 1964 年的 250 人增加到 1967 年 2 月的 7000 名士兵和 3000 名干部。

从 1960 年代下半期至 1970 年代上半期，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的反殖武装斗争继续发展，爱国力量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游击基地更加扩大和巩固，对殖民军警的袭击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

在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有了加强。1968 年，安人运在东部地区的游击战已扩展到隆达及比耶两省。至 1970 年代初，它的武装力量已达到五个军区：丹博斯、卡奔达、莫西哥及宽多库邦戈、隆达及马兰热、比耶。安解阵的游击活动也已扩展到宰雷、威热、北宽扎、罗安达、卡奔达、马兰热、隆达及莫西哥等省。安盟的武装斗争也由莫西哥省逐步发展到隆达、马兰热、比耶、宽多库邦戈等省的部分地区，1969 年 5 月又扩展到维拉省的部分地区。

为了消灭安哥拉反殖爱国力量，葡萄牙殖民当局采用美国在越南使用过的焦土战、细菌战及建立战略村等手段。1967 年末，殖民者强迫原分散居住的安哥拉农民

密集地居住在指定的地点。有的居民点周围设置了铁丝网等障碍物。殖民者原以为这样可防止游击队渗透，便于割断当地居民与游击队的联系，得以孤立、削弱并消灭爱国武装力量。但集中营式的生活使安哥拉广大人民对殖民当局更加不满，更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反殖斗争。

安哥拉爱国武装力量在根据地及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利用境内山岭绵延、森林密布的有利环境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他们设路障，埋地雷，炸桥梁，切断输电线和电话线，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抗击敌人的扫荡，歼灭殖民军警的有生力量，还经常袭击敌人的军事据点及巡逻队，烧毁殖民者的种植园，使敌人疲于奔命。据不完全统计，到 1974 年，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反殖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15000 人，解放了 2/3 的国土和 100 多万人口。

几内亚比绍爱国武装力量在 1960 年代下半期继续粉碎敌人的进攻。1968 年 5 月至 1969 年 2 月，当两个营的殖民军进犯南部边境地区、妄图切断解放区运输线时，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达九个月之久，终于用迂回战术打败敌军，保住了这条重要的运输线。1971 年 12 月下旬，爱国武装力量再度粉碎了敌人对莫雷斯解放区的进犯，打死敌人 100 多名，打伤数千名，迫使敌指挥官自杀。经过保卫战的多次胜利，至 1971 年，南部地区已成为较巩固的解放区，东南部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部爱国武装力量也正在压缩敌人的据点。南部游击队的活动已威胁到殖民当局的首脑机关所在地——比绍。爱国武装力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莫桑比克的反殖武装于 1960 年代下半期除了在德尔加多角州和尼亚萨州建立较牢靠的基地外，还在莫桑

比克州及赞比西州开展游击活动，1968年在太特州开辟了新战场。1970年5月，殖民当局纠集了3.5万人的兵力，动用1.5万吨军事物资，还出动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向德尔加多角州、尼亚萨州和太特州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莫桑比克爱国军民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400多人，炸毁敌军车几十辆，击落敌机4架，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解放区，迫使敌人在德尔加多角州放弃了7个据点，而且还利用敌人后方空虚的机会向南推进，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

1970年下半年，莫桑比克爱国武装力量乘胜继续袭击葡萄牙殖民军。在1970年11月—1971年11月的一年里，爱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数百次游击战，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摧毁敌军兵营及据点40多个。1972年7月25日，游击队又在马尼卡—索法拉州开辟新战线，对殖民军的一些战略据点发动进攻。同年11月对太特州的太特镇和兴戈齐机场发动的猛攻，击毁敌机17架及机场附近的30个兵营。1972年9月—1973年9月，爱国武装力量共歼敌2300多名，袭击120多个敌人哨所及基地，击落击毁敌机49架，击沉舰只11艘，击毁军车280多辆。至1973年底，莫解阵已控制了全国1/4以上的土地，拥有100多万人口。

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人民的反殖武装斗争，给葡萄牙当局以沉重打击。为了镇压殖民地日益强大的爱国武装力量，它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和物资投入非洲，应付殖民战争的需要。1972年，葡萄牙20万兵力中约有16万陷入非洲。据葡萄牙官方公布的数字，到1974年5月止，葡军共伤亡3.4万余人，另有8.4万多人“生病”。战场上的大量伤亡急需补充兵源，

而国内兵源不足，迫使葡萄牙当局降低征兵的条件，延长士兵服役的期限，甚至强迫不适于服役的人入伍。殖民战争也使葡萄牙军费开支连年增加。1963年葡萄牙本土及殖民地的军费支出为1.93亿美元，而1967年的军事预算仅海外领地一项即达2.17亿美元。葡萄牙当局所进行的殖民战争不仅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且在葡萄牙本土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葡萄牙国内的工人、青年、学生等各阶层群众广泛开展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继续镇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民主与自由。被征召派往非洲的葡萄牙士兵及下级军官越来越多地采取集体逃跑、拒绝上船去非洲、甚至起义等方式，反对政府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战争。

由于萨拉查和卡埃塔诺两届政府都顽固地支持在非洲继续进行殖民战争，葡萄牙内外矛盾都越来越尖锐，政局越来越不稳定。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军队中一批中下级军官组织尉官运动（后改称为“武装部队运动”），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政府。新政权表示，将采取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军事办法解决海外战争问题。

首先同葡萄牙新政权举行谈判并实现政治解决的是几内亚比绍反殖力量的代表。几内亚比绍人民早在1973年9月23—24日在东部的马迪纳—博埃解放区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议会。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通过了宪法，选出了国务委员会。至1974年3月，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得到了70多个国家的承认，被接纳为非统组织的成员国。联合国也通过决议，承认它是独立主权国家。但葡萄牙殖民当局拒绝承认几内亚比绍的独

立，并继续占领其部分地区。卡埃塔诺政府垮台后，1974年5月，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派出代表和葡萄牙新政府的代表在伦敦、阿尔及尔等地进行谈判。双方于同年8月26日达成协议，葡萄牙宣布在法律上承认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并同意在同年10月31日以前全部撤出它在几内亚比绍的军队。

1974年6月及9月，莫解阵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同葡萄牙新政府进行谈判，揭露葡萄牙提出的“葡非联邦”的殖民主义本质，坚持要实现完全独立的立场。在莫解阵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卢萨卡协议》，葡萄牙承认莫桑比克人民的独立权。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正式宣告独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也同葡萄牙新政权进行了谈判，于1974年11月在阿尔及尔达成协议。1975年7月12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告独立。

1974年12月9日，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佛得角岛独立的协议。1975年7月5日，佛得角群岛正式宣布独立。

从1975年1月15日起，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在葡萄牙的阿沃尔市同葡萄牙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最后签署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协议，承认安哥拉人民的独立权利，并承认三个民族主义组织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安哥拉于1975年11月11日实现了独立。

至此，除了亚速尔群岛及马德拉群岛外，葡属非洲殖民地都取得了独立。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组织能够敏锐地观察形势，及时地把和平的、合法的斗争转为武装斗争，这是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的因

素。几内亚比绍自 1959 年 8 月发生殖民军警屠杀比绍市码头、港口工人的事件后，几独立党即于同年 9 月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总部转移到邻国，斗争方法由和平转为暴力。当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扬言“葡萄牙永远也不会同意讨论海外领地的自决问题”的情况下，莫解阵领导人蒙德拉纳就指出，温和的政治行动，如罢工、示威、请愿等，只会导致参加者自己的毁灭；莫桑比克人民要么长此生活在高压的帝国统治下，要么找到某种用武力反抗葡萄牙的办法。正是由于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殖民主义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才迫使葡萄牙政府走到谈判桌前，达成了最后的政治解决。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的反殖武装斗争，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民族主义政党较重视发动群众和建设稳固的解放区。几独立党非常重视培训干部和发动群众。1960 年，该党领袖卡布拉尔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举办了一所训练干部的学校。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回国内，到农村发动农民。在 1960 年代初期的几年中，该党共培养了约 3000 名从事政治宣传的干部，这支干部队伍在发动农民开展反殖武装斗争及建设解放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几内亚比绍的解放区由 1963 年占全国 1/3 的土地扩大到 1965 年占全国土地的一半，1966 年又扩大到全国 60% 以上的国土。卡布拉尔认为，把解放区建设好，改善农民的生活，就能使农民更积极地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提出了“以医院和学校取得战争胜利”的思想。几独立党号召并帮助解放区农民发展粮食及副食品的生产，以满足解放区

人民生活的需要，并建立人民商店作为新的贸易流通体系的重要环节。其解放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重视，至 1972 年已办了 164 所学校，招收小学生 1 万多人，设了 9 个医院及 117 个诊所。解放区还普遍建立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村政权及乡政权，有的地方还设立了军政训练中心。莫解阵也很重视在它控制的广大农村和森林地带建设解放区和游击基地。其解放区建立了州、县、乡各级政权，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1966 年，仅在德尔加多角州就设有初级学校 100 所，供 1 万名儿童上学。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的反殖爱国力量之所以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挫败殖民军的围剿，逐步发展壮大自己，最后促使葡萄牙殖民帝国垮台，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够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队伍，在作战中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几独立党在建设武装队伍时较注意政治方向问题。1964 年 2 月，该党在卡提奥解放区的卡萨卡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 60 个代表包括当时担任较重要职务的政治及军事干部。会上批评了一些游击队领导人个人野心膨胀、脱离该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指示和政策的倾向，加强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这次会议还决定把各自为政的游击队分队统一为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由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军事委员会由几独立党高级领导人组成，以卡布拉尔为主席。各级武装部队都设指挥员及政委，指挥员是军事行动的决定者，政委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武装力量的基层单位是联合突击队。几独立党强调在作战中采取伏击、打了就跑的灵活战术，避免无把握的全面出击，因而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收复了 2/3 的国土，以不到 1 万人的游击队把 5 万

人的现代化葡萄牙殖民军围困在据点里，成为葡属殖民地中反殖武装斗争开展得最好的地区。莫解阵在建设爱国武装力量中也很注意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至 1970 年，该党领导的武装已由开始时的 250 名只有简陋武器的造反者发展成为近万人的训练有素的、拥有一批新式武器的队伍。莫桑比克另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还仿照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其游击队“一切行动服从命令”，“一切缴获归军队集体”，“讨论和解决问题时说话要和气”，“借物要归还原主”等。

葡属非洲各殖民地反殖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力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得到非洲邻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几独立党积极争取邻国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支持，那里成了它培训干部、医疗伤病员、接受及运输国际社会提供的武器及其他物资的重要后方基地。卡布拉尔多次出席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会议，揭露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的民族主义组织也都大力争取非洲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上的援助对葡属非洲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罗得西亚独立斗争

南罗得西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从 1960 年代初起有了明显的发展。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于 1953 年（一说 1957 年）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纲领是要取消殖民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律，在政治上实现一人

一票的原则。当这个组织于 1959 年被当局取缔后，民族主义者于 1960 年 1 月成立了民族民主党。1961 年民族民主党又被当局取缔后，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政党——津巴布韦人民联盟（简称“人盟”）。该党由原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民主党的领导人乔舒阿·恩科莫（1917—）担任主席，并继承了以往民族主义政党的纲领。人盟的活动范围及影响较其前身更为广泛，除在国内活动外，还较多地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争取其支持与援助。

1963 年 8 月，人盟中部分成员由于对恩科莫不满，另行成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简称“民盟”）。1964 年 5 月，民盟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宣布该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泛非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穆加贝（1924—）为该党的总书记。同年 8 月，该党遭当局取缔，穆加贝等在国内的领导人被捕。但在国外的民盟领导人契特波等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临时总部。1966 年 1 月，民盟经过重组，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机构，建立了民族解放军，并将总部迁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1966 年 4 月 28 日，民盟领导的游击队在罗得西亚中央政府所在地索尔兹伯里西北部的锡诺亚地区打响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第一枪，开始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武装斗争日。在民盟的影响和促进下，人盟也在国内开展游击战。这两个政党都从国外基地派遣游击队进入南罗得西亚，袭击政府军的一些营地。1967 年，人盟还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1967—1970 年，人盟先后六次从赞比亚派武装力量打入国内，其中有三次是与南非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游击队联合作战。这些游击活动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在南罗得西亚当局及南非军队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民盟这时和人盟一样，由于在国内发动群众的工作尚未开展，因此到 1960 年代末期游击战争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民盟主席契特波在总结前阶段反殖斗争时指出，受挫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解放组织强调了军事斗争，忽视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没有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武装斗争。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民盟加强了对国内群众的发动工作。1971 年，该党派遣人员潜入国内，经过艰苦的工作，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在东北部一些地区建立了政治、教育及医疗机构，并招募游击战士，扩大反殖武装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打下了较可靠的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 1972 年 12 月起，民盟武装力量在津东北部地区发动了新的反殖游击战，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南罗得西亚当局对游击队在人民支持下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惊慌与忧虑。他们在边境地区强迫几十万农民迁入周围设置铁丝网的保护村，实际上加以软禁和看管。这种策略虽然给反殖斗争造成某些困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越来越多的人民逃出保护村，投奔游击队。由于民心归向民族主义组织，南罗得西亚当局对军队中的黑人士兵也心生疑虑，大量招募白人充当军警。

除了敌人的封锁镇压外，民族解放力量内部的矛盾冲突也给反殖斗争的发展增加了困难。南罗得西亚各民族主义组织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联合起来，而且经常磨擦，甚至有时还发生激烈的内讧。1973 年 3 月，民盟与人盟

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及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的促进下，曾在卢萨卡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的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指挥部，但这些组织机构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次年12月，在外部的压力下，民盟、人盟、津巴布韦解放阵线（1971年成立，领导人是契克雷马）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是穆佐雷瓦）组成联合阵线，定名为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由穆佐雷瓦任临时主席。这个统一的机构也是空架子，由于各派斗争激烈，不到一年即告夭折。

在葡萄牙殖民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影响下，南非当局力促南罗得西亚当局停止战争，释放被逮捕的民族主义领袖，同民族主义政党举行谈判，以便在南罗得西亚建立温和的黑人政权。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重要国外基地的赞比亚，也积极催促南罗得西亚各派联合起来，与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在这种外部条件下，1975年初，民盟内部爆发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同年3月，民盟国外领导人契特波在卢萨卡被杀害。在举行葬礼时，民盟的50位领导人被逮捕，1000多名战士被扣留，总部被封闭，基地被包围，和国内游击战士的联系也大部分被切断。那些侥幸未被捕的民盟成员逃往莫桑比克。同年9月，民盟和人盟中主张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成员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支持下，组建津巴布韦人民军，由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领导，逐渐在国内恢复和发展游击战。军事委员会的18个成员由民盟、人盟各占半数。他们未能团结一致，而且人民军内部两党成员之间还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不久，军事委员会及人民军中的人盟成员纷纷离去，人民军遂成为民盟的武装队伍。

穆加贝经过10年的监禁，于1974年12月获释。1975

年4月，他到莫桑比克民盟营地从事反殖斗争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政治领导人。这时民盟总部也从赞比亚迁往莫桑比克，穆加贝确立了他在民盟的最高领导地位。1976年10月，在前线国家推动下，民盟与人盟组成了爱国阵线，穆加贝与恩科莫分别担任阵线的两位主席。1976年底起，民盟进行了多次大改组。1977年9月，穆加贝当选为民盟主席。

民盟虽然1975年春在赞比亚时一度遭到摧残，但不久在新独立的莫桑比克支持下，迅速重振旗鼓，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75年10月，游击队在东南部开辟了新战场；1976年4月，袭击了南罗得西亚通往南非的铁路与公路，使运输动脉遭到威胁。到1970年代末，爱国武装斗争有了明显的发展。民盟发表的战报宣布，在1979年的头五个月里，游击队歼灭了大量敌军，击落敌机12架，击毁军车和其他车辆54辆，还破坏了8座桥梁和1个发电站，并且进行了12次破坏铁路的活动。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还扩大到南罗得西亚当局的首府索尔兹伯里，击毁了一座燃料库，并加紧袭击南罗得西亚傀儡政权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其他经济设施。

从1974年末起，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在赞比亚等国的促使下，开始与南罗得西亚及南非当局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谈判。人盟主席乔舒亚·恩科莫、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主席毕·艾·穆佐雷瓦比较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美国、英国也派出高级官员，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参与了和谈活动。但南罗得西亚当局顽固坚持在过渡时期要由白人掌握军警和制宪大权，使谈判进程受阻。1977年9月1日，英国公布了英、美两国关于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建议：在过渡时期，由英国派出

驻节专员，掌管军队、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权力。1978年3月，南罗得西亚当局同穆佐雷瓦等三位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达成内部解决协议，组成了以史密斯为总理的过渡政府。1979年初，过渡政府公布新宪法，规定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院30席，众院100席，其中白人分别占10席和28席。根据该宪法，南罗得西亚于1979年4月举行了大选，白人的罗得西亚阵线党获28席，黑人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获51席，民盟国内派获12席，统一人民联邦党获9席。穆佐雷瓦接替史密斯出任总理，组成了黑人占多数的新政府。该政府遭爱国阵线及非洲国家的反对，并未得到国际上除南非以外任何国家的承认。

同年8月5日，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九点声明，指出1979年初史密斯政府公布的内部解决的宪法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有缺点的，必须让所有各方共同协商，解决争端；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独立需要通过一项民主宪法，其中包括适当保护少数的条款；必须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选举应由英国政府当局加以适当监督，并有英联邦观察员在场。声明表示欢迎英国政府关于召开包括有南罗得西亚各方参加的制宪会议的建议。

1979年9月10日，英国以宗主国身份在伦敦召集了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参加会议有三方的领导人：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南罗得西亚爱国阵线的两名主席恩科莫和穆加贝；南罗得西亚政权的总理穆佐雷瓦和前总理史密斯。三方各有20名代表与会，以卡林顿为会议主席。

制宪会议首先讨论了白人的权力及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英国代表主张，独立后南罗得西亚的权力从少数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多数手中，确保黑人多数能控制议会、行政机构、军队和司法部门，白人在议会里没有否决权，但保证白人在未来的议会里有一定的席位，并允许白人单独选举白人议员。爱国阵线代表主张，掌握权力的下议院议员应通过普遍、直接投票选出，白人不得享有特权。南罗得西亚当局要求占人口总数 4% 左右的白人在议会中占 28% 的席位，对不利于白人的法律有否决权。经过反复协商，各方同意组成一个有 100 个议席的议会，其中 80 名议员由普选产生，20 名在白人选民中选出，白人在议会中不拥有否决权。

关于独立后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英国提出国家由一个立宪总统领导，而由向议会负责的总理掌握实际权力。南罗得西亚当局同意英国的主张。爱国阵线主张通过直接的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总统有权任命和解散政府，并统率武装部队。经过会议讨论，各方一致同意，今后实行立宪总统和执行总理的内阁制。

会议接着讨论走向独立的过渡期安排问题。英国主张普选前的过渡期为两个月，由英国派驻全权总督来管理国家并监督选举，由英国警察顾问协助南罗得西亚现有的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南罗得西亚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爱国阵线主张过渡期为六个月，以便有更多时间做群众工作，并反对由罗得西亚现有的警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经过讨论，英国同意在过渡期内爱国阵线游击队享有部分军事代表权利，爱国阵线赞同过渡期为两个月。

制宪会议继 11 月 15 日取得上述突破后，又于 12

月 5 日取得重大进展，在停火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英国通知南非当局不干涉南罗得西亚；有效地监督南罗得西亚空军；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肯尼亚、斐济五国组成一支近 1200 人的监督部队。

出席制宪会议的三方代表经过三个半月的谈判，于 12 月 21 日在伦敦正式签署了南罗得西亚和平协定。签署的文件包括宪法、独立前的安排和停火协议。根据文件的规定，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英国总督负责在南罗得西亚行使行政权力，在英国总督安排和监督下在全国进行选举，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平等地参加竞选；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将组织政府，然后由英国总督向它移交权力。

停火协议规定，从协议签署之日的午夜起，即停止双方军队的一切越境调动和其他军事行动，从 12 月 28 日起停止境内的一切敌对行动；成立停火委员会，由英国总督的军事顾问任主席，南罗得西亚当局和爱国阵线双方各派人数相等的军事指挥官参加；由五个英联邦国家派出 1200 人组成监督部队，协助停火委员会执行确保停火的任务；双方武装力量集结并使他们脱离接触的工作应在 1980 年 1 月 4 日以前完成。

根据上述和平协议，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于 12 月 12 日到达索尔兹伯里，接管了南罗得西亚政府的权力，担负起监督停火和主持大选的事务。27 日，英联邦国家派遣的监督部队开始前往南罗得西亚监督停火。1980 年 1 月 27 日，民盟主席穆加贝回到国内。2 月 27—29 日，南罗得西亚举行了议会选举，90% 以上的黑人选民参加了投票。穆加贝领导的民盟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中 80 个黑人议席的 57 席，取得了绝对多数。英国总督索姆斯要求

穆加贝组织新政府。1980年4月18日，在首都索尔兹伯里（后改名哈拉雷）隆重举行独立庆典，穆加贝总理发表文告，宣布南罗得西亚独立，建立共和国，更名为津巴布韦。

南罗得西亚各方于1979年底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并于1980年4月获得国家独立，这是南罗得西亚人民长期坚持反殖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结果。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夕，爱国阵线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人左右，游击活动的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的地区，使南罗得西亚当局的行政、交通、税收等遭到打击，陷于部分瘫痪，大量白人外流，经济困难日趋严重。穆佐雷瓦排斥爱国阵线，单方面上台组成内部解决政府，不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相反还受到国际上的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处于内外交困的穆佐雷瓦政府为了摆脱被动处境，不得不赞同召开制宪会议，签订和平协议，希望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重新上台执政。

在签订和平协议中，爱国阵线方面也做了妥协与让步。爱国阵线的反殖武装斗争虽然给白人统治当局以相当大的打击，但敌我力量对比暂时仍有利于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史密斯政府拥有6万人的军队，装备精良，指挥统一，又有南非当局撑腰，军事上仍处于优势。爱国阵线内部矛盾较多，严重削弱战斗力。民盟、人盟的领导人都现实地认为，要在短期内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彻底打败史密斯—穆佐雷瓦的军事力量是不易办到的。为了早日获得国家独立，实现黑人的多数统治，他们赞同由英国出面主持谈判，在谈判中对有些问题也作了让步，使制宪会议得以达成协议。

制宪会议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英美两国从它

们的切身利益及战略考虑，积极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在 1970 年代下半期苏联竭力插足南部非洲的情况下，英美当局看到如不迅速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就会给苏联及其雇佣军的进一步进入提供有利的条件与机会。撒切尔夫人于 1979 年 5 月出任英国首相后，为了稳定南部非洲局势，遏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渗透扩张，以便保持西方国家的利益，即把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利用英联邦首脑会议等机会与有关的非洲国家磋商，并重新承担起宗主国的责任，主持召开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促使对立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英国对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基本态度及政策得到赞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前线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坦、赞等国在 1970 年代末为了支持南罗得西亚人民争取独立，对南罗得西亚当局实行经济封锁与制裁，本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它们也不愿意南罗得西亚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为苏联继续南下提供机会，因而同意冲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大力促进各方相互妥协。由于前线国家是爱国阵线各党在国外的重要基地，关系密切，前线国家的上述态度对伦敦制宪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南罗得西亚和平协议的签订及独立的津巴布韦共和国的诞生是南罗得西亚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它为津巴布韦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殖斗争

纳米比亚地处非洲的西南部，原称西南非洲，从 15

世纪起即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1920年12月，国际联盟委任南非统治西南非洲。1949年，南非议会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非法吞并了西南非洲。从194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先后采取了直接管辖、建立班图斯坦及实行内部解决三种主要形式。

1960年代以前，南非当局把西南非洲作为它的第五省，在该地设立行政长官、立法议会和行政委员会。行政长官由南非议会代表和管理土著事务的委员兼任，直接管理纳米比亚的行政事务。立法议会实际上是一个咨询机构，无权决定国防、铁路、港口、民航、土著事务以及其他重要的立法事务。议员均由白人殖民者担任。行政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和由立法议会选出的四名委员组成。

南非当局吞并西南非洲后，加强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纳米比亚人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1948—1961年，南非殖民当局制订了5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不仅剥夺了纳米比亚人的政治权利，也对他们的教育、居住地区及日常生活进行了种种限制和隔离。黑人被限制在贫瘠、干旱的保留地里居住，而占全部土地约2/3的肥沃地区则划归白人所有。在教育经费方面，1958—1959年度，用于白人的为112万英镑，而用于保留地黑人的仅3.5万英镑。在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压榨下，纳米比亚黑人的收入在下降，而白人殖民者的收入迅速增加。1951—1956年，保留地黑人的年均收入仅8.5英镑，而白人居住地带每人年均收入却达176.1英镑。

南非当局对西南非洲的吞并及其对当地黑人的残酷

剥削，激起黑人的反抗与国际舆论的谴责。联合国国际法院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于 1950 年宣布南非吞并西南非洲为非法。1957 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纳米比亚人民成立了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并于 1959 年 8 月改组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该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提出西南非洲应首先摆脱南非殖民统治，归联合国托管，然后逐步谋求独立。1960 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西南非洲人民享有独立和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南非当局为了对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为遏制正在蓬勃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向南发展，决定在西南非洲推行班图斯坦体制。它于 1964 年初发表了《奥登达报告书》，计划在西南非洲建立 10 个班图斯坦，作为黑人的家园；纳米比亚黑人按其所属部族分别迁入各个班图斯坦，成为该家园的公民。这些班图斯坦大都被划定在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沙漠干旱地带，总面积仅 3262 万多公顷，其余面积 4975 万多公顷的土地则划归白人占有。这项措施使不到总人口 1/7 的白人占有了全部土地的 60% 以上。

在南非当局的策划下，西南非洲于 1967、1970 和 1972 年先后成立了奥万博、卡万戈和东卡普里维等三个黑人家园，其中奥万博和卡万戈又先后于 1973 年的 4—5 月宣布成为自治领。同年，南非当局通过了《西南非洲土著国家自治发展修正案》，规定黑人家园可以宣布自治，允许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但又同时规定，自治的班图斯坦当局所通过的法令须经南非政府同意。南非当局原想以班图斯坦及其自治形式制造纳米比亚人自决的假象，实际上黑人家园能自决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至

于军事、外交、货币等重大问题仍由南非殖民当局决定。

南非当局推行的班图斯坦及其自治计划并没有缓和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当局的根本矛盾，也未能减轻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压力。当 1964 年 1 月《奥登达报告》刚提出，联合国结束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即通过决议，谴责该计划将产生分割和瓦解西南非洲的结果。同年 2 月，赫雷罗族和纳马族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斯坦计划。1966 年 10 月，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要求南非撤出该地，由联合国直接管理。1968 年，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谴责南非继续占领西南非洲，并根据西南非洲人民的愿望，把西南非洲改名为纳米比亚。以后，联合国又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1974 年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被推翻，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相继获得独立，南部非洲的形势对南非当局更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当局为了维护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又改变手法，停止实施班图斯坦计划，采取了内部解决的政策及措施。

南非当局于 1975 年抛出的内部解决方案，以承认纳米比亚的独立为幌子，撇开联合国和坚决反对它的政党，扶植亲南非的政党和势力，举行选举，组建议会和行政机构，使南非能够通过这个傀儡政权继续控制纳米比亚。按照这个方案，南非当局于 1975 年 9 月召开了有 11 个部族（包括白人和有色人在内）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会议在南非当局的导演下于 1977 年 3 月达成协议，通过宪法草案，确定在纳米比亚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体制。1978 年 12 月，南非当局又在纳米比亚导演了制宪议会的选举，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得

82%的席位，控制了制宪议会。1979年5月，制宪议会改为拥有更大权力的国民议会。1980年6月，南非当局以特恩哈尔民主联盟领导人为班底，组成部长委员会，作为纳米比亚全国性的行政机构，把部分的立法和行政权移交给该机构。

由南非策划组建的第一届内部解决政府不仅得不到广大纳米比亚人的支持，执政党内部及该政府与南非当局派来的行政长官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纳米比亚国民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遭行政长官拒绝、议会也遭解散时，部长委员会主席即于1983年1月宣布辞职。第一届内部解决政府垮台后，南非当局又于同年11月扶植了多党会议，并于1985年4月建立了第二届内部解决政府。这届被当局称为“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机构，设有执行内阁、国民议会和制宪委员会，拥有广泛的、但不是完全的行政和立法权力。南非当局仍掌握纳米比亚外交、国防、安全及谈判解决独立问题的控制权；南非派驻纳米比亚的行政长官有权拒绝批准过渡政府的决策。这届政府仍然没有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自从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踏入西南非洲后，纳米比亚人民即不断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种族主义的压迫。但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纳米比亚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加强了对反殖斗争的组织与领导，使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持续发展。

在纳米比亚的民族主义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其前身是奥万博兰人民组织，刚成立时是一个以奥万博人为主体的地区性部族组织。1960年4

月，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为了广泛吸收纳米比亚人民参加，改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简称“人组”）。萨姆·努乔马（1929—）被选为主席。努乔马出生于纳米比亚北部沙漠地带奥万博兰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曾在温得和克一所圣公会学校学习，后在南非国营铁路局工作。1959年4月，他和贾·托伊沃等共同创建了奥万博兰人民组织。在当年12月的卡士土拉事件中，他因领导黑人群众抗议当局强迫迁居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于1960年2月秘密离开纳米比亚，抵达加纳。同年4月，奥万博兰人民组织易名，由努乔马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直至今日。

人组的政治纲领指出，该党是纳米比亚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有组织的政治先锋队，最近的目标是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和赢得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现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该党还主张对内反对部落主义、地区主义及一切种族主义歧视的倾向，团结所有纳米比亚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对外同非洲独立国家、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切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合作，为彻底消除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为了实现党的纲领目标，人组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临时总部，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开展宣传，反对南非的殖民统治。努乔马于1960年6月到纽约出席了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会议时，递交了一份声讨南非的请愿书。次年，他又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南非霸占西南非洲的罪行。从1962年起，人组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支持下，把从国内逃亡出来的纳米比亚青年组织起来，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接受军事训练，并派遣部

分人员到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苏联等国学习军事，积极为在纳米比亚开展反殖武装斗争做准备。

1966年，人组建立了武装组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安哥拉南部和赞比亚设立营地。同年8月26日，人组领导的游击队在卡普里维向南非殖民者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纳米比亚人民反殖武装斗争的序幕。南非当局慌忙向西南非洲增派军队，并把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划为禁区加以封锁，妄图扑灭武装斗争的烈火。但纳米比亚军民在人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斗争，逐步发展了反殖力量。武装斗争爆发时，人组的游击队只有100人，到1972年已发展到1000人左右。1974年，游击队在全国开辟了六个战区。武装斗争从东北部地区逐步向中部地区发展。人组被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1975年安哥拉的独立鼓舞了纳米比亚人民。纳米比亚游击队在东部、北部及西部的部分地区，用伏击、突袭等战术，打击殖民军警，骚扰当局的运输线及分散据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材料，仅1977年第一季度，人组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即打死殖民武装300多人。同年10—11月，这支武装又向敌人发动进攻，仅10月25—27日三天就消灭敌军82人，打伤敌人130多人。

在反殖武装斗争的鼓舞下，纳米比亚城乡人民也广泛掀起了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1971年，以矿业工人为主体的罢工运动从首府温得和克扩展到23个地区和11个矿区，参加人数达2.5万名，使许多矿场瘫痪。1973年8月，奥万博族人民反对南非当局策划的班图斯坦自治，抵制了立法会议选举，只有3%的选民参加投票。1975年9月，纳米比亚人民举行游行示

威抗议南非当局召开的制宪会议。

对于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及反殖群众运动，南非当局在采取各种欺骗手段的同时，也加强了军事镇压。南非在西南非洲建立了 20 多个军事基地，派驻了 10 万大军，仅 1986 年所耗军费即达 4.79 亿美元。占领军以残酷手段逮捕、拷打、奸污、杀害纳米比亚的平民和儿童。有些村庄（特别是在奥纳穆泰地区）被占领军用装甲车夷为平地。殖民军警还把被害者的尸体悬挂在军用直升飞机下低飞示众。南非当局又不断侵入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妄图捣毁人组在国外的基地，阻挠前线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南非当局的上述种种措施都未能扼杀、消灭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人组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殖斗争。到 1980 年代，这支队伍已发展到 5000 人左右。他们通过埋地雷、伏击、袭击占领军的基地和破坏敌人电讯设备及交通运输等，不断给南非殖民当局以打击。人组还加强了群众工作，包括工会工作。1987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上万名纳米比亚工人冲破了南非军警的重重阻挠，首次举行了五一节的大示威。

南非当局顽固坚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及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持续发展，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美英等国为了抵制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渗透，积极主张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1977 年初，美、英、法、联邦德国和加拿大五国成立接触小组，经过磋商提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大选，南非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合国部队和文职官

员维持纳米比亚的秩序，尽早实现独立。

1978年4月和7月，南非当局和人组愿意就西方五国的建议进行谈判，并同意把建议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同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五国方案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9月，安理会批准了秘书长的计划，并通过了以该计划内容为基础的435号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和人组游击队停止敌对行动，分别在指定地点集中，南非军队逐步撤走，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停火七个月后，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宪法，确定独立日期；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由联合国派遣以秘书长特别代表为首的、包括7500名维持和平部队和1300名文职人员组成的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去纳米比亚监督和控制选举；选举要在12个月内举行，以保证纳米比亚及早取得独立。南非当局迫于形势，表示原则同意上述决议，但在谈判过程中又不断制造借口，拒绝执行该决议。

1981年10月，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提出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新建议：以435号决议为基础进行三个阶段的谈判，第一阶段确定制宪议会选举的原则和独立宪法的原则；第二阶段商定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的组成、部署和任务；第三阶段确定实现独立的具体日程。在1982年上半年进行的第一阶段谈判中，各方对制宪原则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对产生制宪议会的选举制度仍有分歧。在第二、三阶段的谈判中，由于美国和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相联系的方案，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84年5月和7月，人组和南非当局等有关方面代表就纳独立和停火问题举行了

两次会谈，由于南非自会谈一开始即坚持联系方案，未能达成协议。同年 11 月，安哥拉政府提出关于“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一揽子建议，宣布自南非开始实施 435 号决议之日起，古巴开始逐步从安哥拉撤军。南非对此提出反建议，要求安哥拉控制人组在安哥拉、纳米比亚边界的活动；古巴军队在 12 周内全部撤出安哥拉，并成立机构监督古巴撤军等，遭到前线国家拒绝。

1988 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为了把苏联挤出南部非洲，积极抓住和平解决西南部非洲问题的主动权。1988 年 5 月初，美国、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伦敦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议虽未取得任何收获，但它标志着西南部非洲的和平进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年 6 月下旬，四国在开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会上南非坚持要古巴军队先撤出安哥拉，而安哥拉和古巴则要求南非先从安哥拉撤军，双方相持不下，未达成协议。同年 7 月中旬，在纽约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四方达成了解决西南部非洲问题的 14 点原则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安哥拉、南非必须根据 435 号决议为纳米比亚自由公正的选举创造条件；各方要提出开始实施 435 号决议的日期；古巴军队要分阶段从安哥拉撤走；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平等和领土完整，等等。同年 8 月初，四方在日内瓦举行第四轮会谈，一致同意从 8 月 8 日起在安哥拉实行停火，并于同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435 号决议。后来由于在古巴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存在分歧，四国在 8 月下旬及 9 月下旬两轮会谈中未达成任何协议，实施 435 号决议的时间也被推迟。美国助理国务卿为此和苏联副外长会晤，协调了立场，并于 10 月提出了妥协方案。四方在同年 11 月 11 日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中讨论了美国的方案，

并达成了临时协议：确定从 1989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 435 号决议；古巴在开始实施 435 号决议之日起 27 个月内分阶段从安哥拉撤军。1988 年 12 月 22 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三国在纽约正式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最后确定从 1989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 435 号决议，并于同年 11 月初在纳米比亚全国举行制宪议会选举，1990 年 4 月 1 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1989 年 4 月 1 日，在实施 435 号决议的第一天，纳米比亚北部边境地区就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后经联合国及有关方面调解，事态很快平息。联合国按计划迅速向纳米比亚派出了协助团。流亡在外的数万名纳米比亚难民开始返回祖国，人组在纳米比亚境内恢复活动。同年 11 月 7—11 日，纳米比亚举行了制宪议会的选举，人组获得了全部 67 万多张有效选票的 38 万多张，赢得了议会 72 个席位中的 41 席。人组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获得 21 席，联合民主阵线获得 4 席，其他席位为一些小党所得。新议会组成后即着手制定新宪法、组织新内阁和确定独立日期、准备独立庆典。议会常设委员会于 12 月中旬接连举行了五次会议，经反复协商，确定由人组派人出任执行总统一职，议会实行两院制，各党派按比例分配两院代表名额。1990 年 2 月，制宪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在和解气氛中通过了纳米比亚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每届任期五年，每位总统至多只能连任两届；实行多党制，定期选举；司法独立。努乔马被制宪议会选举为首任总统。1990 年 3 月 21 日，纳米比亚宣告独立。

纳米比亚的独立彻底结束了南非长达 75 年的殖民统治，揭开了纳米比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它是纳米比

亚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重大成就，也是非洲国家及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大力支持的结果。

非洲各国为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

一、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形势与发展道路

从 1960 年代起，非洲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殖民主义者被迫移交政权。但是外国垄断资本仍然控制着银行、金融、保险、外贸、商业、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农场等部门，掌握着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非洲经济仍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根深蒂固，不会随着独立而自动消失。在单一经济的条件下，非洲国家生产自己不消费的东西，消费自己不生产的东西。尽管许多国家是农业国，但粮食不能自给，靠进口维持生计。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内陆尚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基础工业十分薄弱，除了埃及、南非、津巴布韦有一些钢铁、机器制造业外，多数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农矿产品初步加工厂和食品厂等，有的几乎完全没有工业。加之有的独立国家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工厂、商店倒闭，生产停顿，田园荒芜，失业队伍扩大，大量难民流亡。而殖民主义者又采取报复措施，新独立国家都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在上述背景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振兴民族经济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致强调要以经济上的独立补充政治上的独立。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前夕写道：“应该随着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且借以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要求人民付出一切努力并动员全部的智力和人力。”科特迪瓦（前称象牙海岸）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乌弗埃—博瓦

尼指出：“没有一个健全的平衡的和自主的经济，‘独立’这个概念只是一句空话。”1961年3月25—30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了《关于改组结构和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的决议》和《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强调“享有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必须以获得经济独立来保卫和巩固它”；“经济独立是通过消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同时建设本国民族经济而获得的”^③。

在繁荣民族经济的问题上，非洲各国选择了多种发展道路和建设方针。有的奉行“非洲社会主义”，声明这是一种不同于苏联、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山坡和社会主义山坡所形成的这个山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有的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自由经济，奉行自由化政策、自由企业制度。有的则声明走中间道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奉行“有计划的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有的国家宣布未来的建设目标是社会主义，但现阶段是发展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最初实行“非洲社会主义”，后因遇到问题而改变方向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有的起初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后来经过政变或革命而改行“非洲社会主义”。虽然发展道路的类型繁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非洲社会主义”，一是自由资本主义。两者的差别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间的差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种道路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理论宣传和确定发展方向方面。就具体政策而论，宣布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注重与原宗主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对原殖民主义

经济的改造采取温和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发展，扩大外国的投资。宣布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则与原宗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敌对，而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并对原殖民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改造采取较强硬的急于求成的措施。不过由于两者都不立即取消私有制，与西方经济体系仍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在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没有根本性差别，都属于民族主义范畴。“非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这类国家的成立都经历过武装斗争或群众运动，其领导人都曾是泛非运动或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

在北非，埃及总统纳赛尔 1955 年春首先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1957 年 12 月，他正式宣布在埃及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民主合作制度”。1962 年 5 月，他主持制订《全国行动宪章》，规定社会主义是埃及革命的必由之路，指出：“这种必然性是由现实和群众的普遍愿望，并由 20 世纪后半半个世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形势所决定的”。继纳赛尔之后，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也在寻求“一种合理的，能动员社会全体都来关心生产的发展的方式”。1961 年，他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被 1963 年 10 月突尼斯新宪政党“七大”正式确定为党的基本道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 1962 年 6 月独立前夕通过了《的黎波里纲领》，提出“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自觉地建设国家”，次年被写入宪法。1964 年 4 月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进一步确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西非，最先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加纳、几内亚、塞内加尔、马里。恩克鲁玛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复杂的制度，不适合加纳国情。1959 年 6 月，他提出要建设一个“建立在非洲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福利国

家”，认为“恢复非洲社会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需要社会主义”^③。塞内加尔的桑戈尔与马里的凯塔共同创建了一个联合党，1960年组成马里联邦，声称“我们必须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同时也在黑非洲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制订我们自己的发展计划”^④。1960年马里联邦解体，但两国都没有放弃“非洲社会主义”。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为了对抗来自西方的压力，1962年12月提出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翌年4月在民主党大会上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

在东南非洲，宣布实行“非洲社会主义”的是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1960年马达加斯加独立后，社会民主党执政，虽然它宣布实行“独特的马尔加什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中执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缔结《法马合作协定》，法国在国防、经济等方面仍享有特权。肯尼亚独立后，肯雅塔表示信仰“非洲社会主义”。1965年，议会通过了第十号白皮书——《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强调政府对经济行动的控制和规划，不过对社会主义方针的执行不是很坚决。坦桑尼亚则不然，尼雷尔总统为“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制定了完整的纲领和政策。1962年坦噶尼喀共和国成立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1967年2月5日，他发表了著名的《阿鲁沙宣言》，作为坦桑尼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纲领。它以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政策为中心内容，提出了建设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措施，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其影响下，赞比亚的卡翁达宣布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国方针。他于1967年5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一阶段》后，又在1977年6月发表《人

道主义第二阶段》，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完成从资本主义向人道主义的变革”。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拉姆古兰领导下的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宣布将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福利社会主义”。

这些从独立起就选择“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非都坚持到底。1968年加纳的恩克鲁玛政府、1968年马里的凯塔政府相继被推翻，这条道路便中断了。1969年肯尼亚发生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姆博亚遇刺事件后，也不再提社会主义了。但是在1970年代前期，随着葡属殖民地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非洲社会主义”在继续发展。1975年莫桑比克、安哥拉独立后，都宣布要通过人民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激进的民族主义派别通过政变，走上了“非洲社会主义”的道路。例如，1963年8月，在刚果（前法属刚果）爆发了黑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次人民起义，推翻了尤卢政权，代之以倾向社会主义的马桑巴——代巴政府。后来以恩古瓦比为首的青年军人又发动七·三一运动，建立新政权，首次在非洲大陆宣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在乌干达，1967年9月，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国王和封建王国，建立共和国，总统奥博特奉行“非洲社会主义”，1969年10月发表《平民宪章》。同年，苏丹军人尼迈里发动了五·二五革命，宣布苏丹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共和国”。同年9月1日，利比亚的卡扎菲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国，奉行一种完全建立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还在国内发动文化革命，提出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进行别具一格的社

会主义试验。1969年10月21日，索马里的西亚德少将发动政变，建立民主共和国，成立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宪法中规定“索马里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1971年4月19日，塞拉利昂以史蒂文斯为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完全掌握政权之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翌年，在贝宁以克雷库少校为首的青年军官政变上台，1975年宣布贝宁人民革命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党”，贝宁革命将分为“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阶段。1974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被以门格斯图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推翻，国名被改为“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新政府在1976年4月20日发表了《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宣布“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岛国塞舌尔于1977年6月5日发生政变，人民进步阵线政府宣布要进行社会改革，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社会”。津巴布韦是非洲较晚获得独立的国家，根据别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方针。1980年，穆加贝强调分阶段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强调要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先后共有23个国家宣布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有的国家后来发生变化，但到1980年代末仍然有17个国家坚持原定方针，约占非洲独立国家总数的1/3。它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各具特色，大致可分为四个流派。一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如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奉行的社会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特性、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教传统，认为《古兰经》中

含有社会主义原则。二是村社社会主义，主张在非洲传统村社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如恩克鲁玛、杜尔、凯塔和桑戈尔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拉齐拉卡的“福科诺纳社会主义”^③、卡翁达的“人道社会主义”、塞舌尔的勒内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此类。三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接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流派。如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毛里求斯的“福利社会主义”。桑戈尔后期也致力于这种社会主义，1981年他与布尔吉巴联合创建非洲社会党国际。四是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刚果、贝宁、埃塞俄比亚等国属于此类。它们通过武装斗争和军事政变建立新政权，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强调根据本国的具体特殊条件，创造性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特殊关系。

不过，多数非洲国家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或有计划的自由主义的路线。这些国家很少在纲领、宪法中明确宣扬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体现于具体经济政策之中。唯有利比里亚因曾接受了美国宪法模式，战后仍然奉行原订的宪法宗旨。还有乌弗埃-博瓦尼领导下的科特迪瓦，1960年独立后明确宣布依据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发展本国经济。虽然在1940年代他也曾与恩克鲁玛等泛非运动领导人一起设想过建立西非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独立后却根据对国情的分析，认为只有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引进国外的资金、人才和国内的劳动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宣布继续留在法郎区内以维持金融的稳定，保证外资和利润汇往国外的自由，为国外投资者提供方

便和税收优惠，与原宗主国维持一种特殊关系。

选择有计划和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典型国家是喀麦隆。阿希乔总统是在法国和联合国的支持下上台的，国内左派力量曾进行过武装斗争。在多方压力下，他采取不左不右的方针，提出“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和地区平衡”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宣布与西方国家合作维持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又保持距离，尽量依靠本国资源和能力发展经济，逐步限制外国公司的控制，实现统一平衡的经济发展。1964年，马拉维班达总统也宣布他的建国方针“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实行自由经营发展经济的政策。1967年11月，邦戈继任加蓬总统，明确提出走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即所谓“民主协商进步主义”的新道路。他主张“有领导有计划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行开放，寻求外援，保护外资；有计划地开发林、矿、石油资源；鼓励私人经济。1973年7月卢旺达政变，哈比亚利马纳少将出任共和国总统，宣布实行以农牧业为主的“有计划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这种“中间道路”的发展方针，常常被一些中断了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采用。例如，马里的特拉奥雷推翻了凯塔政府，1979年3月宣布恢复宪政，规定国家的发展道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而是发展“独立的、有计划的民族经济”。1983年，几内亚的孔戴军人政府在结束塞古·杜尔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宣布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作为其经济发展总战略。1986年，穆塞韦尼通过军事政变取得乌干达政权之后，也宣布奉行同样的方针。

二、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措施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目标都是为了振兴民族经济，因而它们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是共同的，主要有：土地改革；合作化、绿色革命；国有化、本地化；计划化与多类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土地改革

非洲居民 80—90%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各独立国家不论是搞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非洲社会主义”，都需要首先解决农民问题，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非洲国家的土地制度，在独立时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同时存在殖民者种植园，北非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均属此类；另一种是殖民者种植园占优势，同时存在部落村社所有制和保留地，这主要存在于东南非洲和扎伊尔等地；第三种是村社形式下的小农所有制与封建酋长所有制占优势，同时存在少量殖民者种植园，西非地区属于此类。

土地改革首先是在第一类国家中展开。1952 年埃及革命后，先后颁发了三个土改法令，用十多年时间逐步完成了土改。七月革命前的埃及共有耕地 598.4 万费丹，407 万农户，其中占农户总数 2.9%的封建主却占有全国耕地的 55.8%，特别是仅占农户总数 0.4%的法鲁克王公贵族、寺院、土地公司和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 35%；而占农户总数 94.3%的小农却只占有土地总面积的 35.4%，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仅 0.8 费丹，此外还有 150 万农户完全没有土地，以租种土地或当雇工为生。

为了解决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纳赛尔根据广大小地主和小农的愿望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维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1952 年 9 月，第一个土改法（178 号法令）颁布，主要

内容是没收法鲁克王公和贵族的土地、庄园；限制每户占有土地量不得超过 200 费丹，因允许地主头两个子女各保留 50 费丹，实际限额为 300 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按原土地税的 70 倍作成地价，在五年分批征购；规定凡不足 5 费丹的农户都有权分得土地，但要分期偿付地价，30 年内还清，年息 3%，另付政府 15% 的手续费；还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原土地税的 7 倍，分成制的地租不得高于纯收入的 $\frac{1}{2}$ 。这样，1952—1960 年全国耕地的 99% 被政府征收，16.3 万户农民分到土地。1961 年 7 月，埃及政府颁布第二个土改法（127 号法令），将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由 200 费丹降到 100 费丹，每户从 300 费丹减少到 200 费丹；为鼓励地主分地，将征收土地的赔偿期限缩短为 15 年，年息提高到 4%；农民交付的地价减免了一半。1969 年，埃及政府又颁布第三个土改法令（50 号令），将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又减少到 50 费丹，每户为 100 费丹；宣布超过限额的土地从土改法生效之日起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取消了农民分土地所交的手续费和利息；并宣布两年内完成土改。

埃及整个土改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大地主们纷纷私自抛售、转让和分散土地。在三次土改中，政府共征收 103.7 万费丹土地，分给农民土地为 82.2 万费丹，约有 34.4 万户农民得到土地，仅占有权分到土地农户的 8.5%。“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村土地占有的矛盾。但是，封建地主势力受到削弱，占地 100 费丹以上的大地主基本上绝迹，小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到 1960 年代末，占地 20 费丹以下的中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99.7%，其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87.4%，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埃及土改的影响下，突尼斯独立后首先通过赎买和没收方式将部分王室、清真寺、外国农场主及曾同殖民主义政权合作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63年，根据萨拉赫的社会改革计划，突尼斯开展土地改革，土地占有限额为50公顷。在阿尔及利亚，1965年布迈丁执政后，土改规模越来越大。他出身农民家庭，其部下80%来自农村，实行土改比较坚决。他要求消灭农村封建制度，摧毁人剥削人的物质基础，建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1971年11月颁布的《土地革命宪章》和《土地改革法令》规定了农户的土地限额，旱地为5公顷，旱地果园45公顷，水浇地果园35公顷；超过限额的土地，政府用15年期限的公债券进行赎买；清真寺、村社公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农户有土地使用权，但不能出售，户主死后由一个儿子继承，同时取消分成租佃制。1972年，阿尔及利亚成立了全国和地方各级土改机构和农民协会。其第一阶段土改（1972年初—1973年7月）是分配公有土地。第二阶段（1973年9月—1975年初）分配私有土地。在土改中，国家共征收土地154.6万公顷，分给10万农户。尽管地主们通过分散、转移手法逃避土改，但它作为一种封建势力已遭到沉重打击。土改的第三阶段是牧区改革，实际未能进行。

非洲土改最激进的是埃塞俄比亚。那里封建土地制度根深蒂固，由皇室、贵族、教会占有的世袭土地、御赐土地、皇家土地、教会土地占全国耕地的绝大部分，80%的农户是无地少地的佃农。1974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被废黜后，临时军政府便发布了“土地的权利应归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的纲领，声明要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1975年3月公布的土改法令宣

布，废除原有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全国土地无偿地收归国有，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得将土地据为私有财产，取消过去一切租佃关系，取消农民的债务和种种劳役；规定凡愿自行耕种者（也包括地主在内）都可分得同等的土地，保持自有的农具和耕牛，不准出租、雇工、转让，子女可继承父亲的土地耕种。为了开展土改运动，政府动员 5 万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奔赴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全国建立各级农会，约有 29% 的农民成为会员。农会拥有武装和一定的司法权，并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政权。虽然遇到贵族地主的激烈反抗，但土改仍深入发展，埃塞俄比亚农村面貌发生了变化。不过，由于农民分领的土地数量和肥沃程度不等而形成的新矛盾也在发展。

在第二、第三种土地所有制类型的地区，土改进行得比较温和。政府通过土地计划来建立以非洲人私有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土地占有制。例如，肯尼亚的土地问题历来就十分尖锐，独立后政府加紧实行从独立前就已开始了的土地转让计划、安置计划和土地调整计划。所谓转让，就是由政府出钱从欧洲人手中赎回“白人高地”的土地，同时没收欧洲人废弃和空闲的土地，然后再转卖给非洲农民。到 1976 年，土地转让计划共安置了 50 多万农民。在非洲人居住的农村，则进行了土地裁定、丈量、登记和最后发土地证工作，确定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在执行转让计划中，由于酋长、有钱人购买土地过多，政府进行调整，将一些公有地出卖给无地农民。改革到 1979 年基本完成，形成了国家农场、非洲人私人大农场、非洲人合作农场、自耕农、外资农场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与肯尼亚一样严重。占人口总

数 97% 的非洲人住在土著保留地，平均每户占地 16 公顷；而 5700 个白人农场主却占地 1600 万公顷，每户平均占地 1754 公顷，多于非洲农户 100 倍。穆加贝早就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奋斗目标。由于白人农场提供着津巴布韦商业农产品和商品粮的绝大部分，雇佣了占全国工人总数 34% 的农业工人，因此，他又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在独立后头六个月内，他在联合国难民高级专署协助下，购买了 193 个白人闲置农场，安置了 100 万难民。1980 年 9 月，津巴布韦开始实行重新安置计划，在全国设立各级安置机构。截至 1986 年底，政府向白人农场收购土地 255.1 万公顷（占全国土地 6.5%），耗资 5500 万津元。按照兰开斯特大厦协定，英国应承担一半安置费用。津巴布韦政府用 214 万公顷安置了 3.9877 万户，约 32.7 万人，多数为非洲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失业工人和难民，他们只有土地租用权而无占有权。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在安置区修建道路、蓄水池、诊所、学校等基础设施。该计划取得了成绩，然而由于筹款困难和白人农场主拒售土地，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2. 合作化、绿色革命

土地改革扩大了小农经济，但是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非洲的民族主义者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纳赛尔曾说：“我认为未来需要我们依靠比现有的不稳定的小农经济或小私有经济更为稳固的经济。我们要用建立合作社来解决这个问题。”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土地改革都与合作化相结合，在土改法令中明文规定分到土地的农民必须加入合作社，国家的信贷、种籽、肥料、农药主要向合作社提供。1960 年，埃及开始大规模合作化运动，到 1970 年约有

310 万农户加入，占全国拥有土地农户总数的 90%。阿尔及利亚通过由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新村”形式引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到 1981 年成立 5963 个，约占分到土地农户的 2/3。突尼斯的合作化比较曲折，1962 年起用行政手段建立合作社，到 1968 年几乎将全部农民都组织起来，但因效果不佳而于 1969 年被迫解散，只保留大部分的农村供销合作社。

凡是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村合作化或集体化运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加纳，曾大办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在村社制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在 1960—1964 年间办了 1000 多个合作社、100 多个国营农场。这在黑非洲是很突出的行动。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在宣布土地国有化和废除酋长制之后，1960 年代中建立 500 多个合作社，1970 年代初改建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办的生产队，组成了由技术人员和下乡劳动的大学生为主体的机械化生产队，但效果不佳；1979 年又改建为县级农牧场，是一种由国家资助的具有合作化性质的集体生产单位。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提出进行“农村革命”，1964 年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将没收来的土地交村社经营管理，恢复和发展村社制。1972 年，塞内加尔通过《村社法》，鼓励农民建立新的合作社。国家还通过 1966 年成立的全国合作和援助发展局向合作社提供肥料、农药和技术，通过乡村发展互助资金和价格平衡与稳定资金调整生产。到 1979 年，全国 50 万农民有 30 万加入合作社，其中 76% 为花生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都被大家族和宗教领袖控制，他们从中渔利，合作社没有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坦桑尼亚的乌贾马村运动是非洲农业合作化的又一典型。尼雷尔总统试图利用非洲传统的村社精神，通过集体化来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他继《阿鲁沙宣言》之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一文，号召建立乌贾马村，要把以家族形式散居在热带草原上的农民集居于公路旁的新建居民点。这既是基层政权组织，也是生产组织单位。土地、生产工具归村庄所有，农民集体劳动，共同生活，按劳动日分配，发扬传统的平等、互助精神。1968年，坦桑尼亚设立乌贾马村局领导此运动，派出大批干部军官下乡，动员农民搬迁。每村有500—600户，政府投资建立学校、医疗站和水利工程，修桥铺路。起初进展缓慢，到1973年才建了5628个村，仅占农村人口15.5%左右。是年10月，坦桑尼亚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1975年1月草率建立了6944个村，占农村人口66.6%。这一冒进行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带来歉收、饥荒和动乱等一系列问题。同年，乌贾马村停建，改为“逐步实行村子化”的政策。

虽然乌贾马村运动发生挫折，但合作化在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凡实行土地转让计划和重新安置计划的国家，都在新安置的土地上组织农民建立合作社。莫桑比克从1975年9月起开展建立公社村运动，这种公社村是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农村基层单位；同时建立各种合作社和国营农场。马达加斯加的拉齐拉卡本着其“福科洛纳社会主义”的宗旨，在1976年的土改之后，便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颁布了合作化的宪章、章程，确定了三种合作化形式：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城镇供销、手工业合作社。刚果于1979年决定鼓励组织农业初级合作社和各种合作组织。政府派大批干部参加合作社

管理。与此同时，在埃塞俄比亚、贝宁等国都有类似的运动。

奉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改造前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也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但一般不采取集体化方式，而是加强专业化商品生产和流通，开展绿色革命，使小生产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的轨道。例如，科特迪瓦在独立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承认酋长和农民对土地使用的现状，形成了大批私人种植园和个体种植户。1940 年代中期本地人的种植园只有 2000 多家，种植户约有 5000 家，但到 1970 年代中期仅咖啡种植户就有 34.8287 万家，其中小农户 29.5627 万家，占总数的 85%。它们都以家庭为单位，占地 3—6 公顷，农忙时雇佣邻国来的季节工人。国家创办各种专业发展公司，如棕榈、水果与蔬菜、稻谷、糖业等发展公司，与小农签订合同，然后从种子、肥料、农药、技术、价格等方面帮助个体农户，改变其自给自足的状态，推动农业生产。1962 年，国家又成立稳定和维护农产品价格金库，保证农民收入，对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有一定作用。

喀麦隆的土地关系与科特迪瓦类似，独立后重视农业改造，1973 年最先在非洲开展“绿色革命”，大力发展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推广科学种植方法和可可、玉米、芭蕉等新品种。同年 9 月，政府设立城镇周围粮食、蔬菜和水果作物发展委员会、粮食中心，开展“绿带”运动，使城郊变成农副产品供应基地。政府还成立棉花、可可等发展公司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用来协调组织农民的生产，开垦荒区，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向新区移民。政府又为回农村参加生产的青年无偿提供住房和土地以

及安家费和贷款。

继喀麦隆“绿色革命”之后，1977年在多哥，1980年在尼日利亚，1986年在利比里亚，也掀起了“绿色革命”。它们健全农业管理机构，扩大农业投资，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加强技术培训，改进耕作方法，重视粮食储备。仅三、四年的努力，多哥就实现了粮食自给，并进而开始发展畜牧业。

3. 国有化、本地化

非洲国家为了尽快掌握本国的经济权益，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改革的启示，也受西方国家按凯恩斯主义进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影响，纷纷采取了国有化和发展国营经济的措施。它们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组织经济，或者通过人员和企业资本的非洲化、本地化，扩大民族资本，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掀起了第一次非洲国有化的浪潮。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规定国有化的目标是“将帝国主义组织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所持有的主要种植园、银行、运输和保险公司、工商企业（即实际属本国人民的，并超出他们实际需要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声明“这种国有化构成了每个民族不可分割的权利和对他们的自由、安全和福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各国都把设立国家银行、发行本国货币、脱离殖民国家控制的货币区，作为国有化的第一步骤。1957年，埃及将英法的银行企业收归国有。1960年初，又将本国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埃及银行和埃及国民银行收归国有。1961年6月和7月，纳赛尔发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

令，对于私人资本的国有化采用三种方式：(1)完全国有化，由政府接管全部企业；(2)半国有化，政府接管 50% 股票进行合营，政府支付年利为 40%，为期 15 年的国家债券作为补偿；(3)监管制，对一些对抗政府政策的资本家实行暂时性监管，实际上是由国家管理。1961 年 12 月，还颁布了改组经济和文化部门的法令，按工、农、商、金融、交通和文化事业分门别类建立了 39 个专业管理机构。1963—1964 年，进一步扩大国有化，除了小型工业、手工业和零售商及小部分中型的私人企业外，其余工商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从而形成国家垄断的经济体制。

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化是从群众性的工人自管运动开始的。独立初期，战争的创伤、法国移民的撤走，使得许多工厂、农场、商店因为无资金、无管理、技术人员而瘫痪，造成数百万工人失业。在工会引导下，工人自发地接管被法国企业主抛弃的无主产业。本·贝拉赞扬此类行动，1963 年颁布了《三月法令》，规定 3 月 22 日前确定为无主的产业将永远归劳动者管理，并确定了自管企业组织法，由国家委派经理参加领导。自管运动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但这种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些中小企业，不利于中央集权和民族经济发展。1965 年 6 月 9 日布迈丁政变上台后，便以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取代自管运动。布迈丁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最高形式。政府首先将其经济命脉——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全面国有化，将外国石油公司 51% 股份收归国有，废除石油租让制。1966 年 9 月，颁布投资法，规定私人资本只能在手工业、商业、服务性等次要部门投资。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国营企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80%左右。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几内亚、加纳、马里、塞内加尔等。几内亚独立后为了回击法国的经济扼杀政策，宣布退出法郎区，发行本国货币，将法国控制的工厂、矿山、铁路等实行国有化，并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援建立起了一批国营企业，使国家的独立得到维护，经济状况也随之好转。然而，大多数国家并不是独立后马上就实行国有化的，而是随着独立政权的巩固逐步开展。例如，塞拉利昂 1961 年独立时宣布不搞国有化，但到 1970 年史蒂文斯执政后开始以赎买方式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尼日利亚也是在独立 10 年后，即 1972 年由戈翁政府颁布了《本地化法令》（全称是《尼日利亚企业振兴法令》），逐步扩大了本国资本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比例。坦桑尼亚政府独立初期只实行非洲化政策，限制外国资本。到《阿鲁沙宣言》公布后，开始对欧洲人和亚洲人的企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有的是全部接管变为国营企业，有的是征收 50% 股份而组成公私合营企业，从而使重要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1973 年，阿拉伯国家用“石油武器”来维护民族权益的胜利，激励非洲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的浪潮。利比亚的卡扎菲公布其“世界第三理论”，按照其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将外国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控制的权利全部收归国有；1978 年出版《绿皮书》（《经济问题的解答——社会主义》），提出消灭私营经济，号召工人接管私人企业，开展群众性的纯洁运动，没收私房运动；1979 年初还用突然发行新币、收回旧币的办法来打击暴发户和资产阶级。继尼日利亚之后，贝宁政府于 1974 年提出要建设真正独立的国家经

济。1975年2月，埃塞俄比亚公布《经济政策宣言》。同年8月，拉齐拉卡领导的马达加斯加政府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宪章》，又颁布了《社会主义企业宪章》。许多非洲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

在这次浪潮中，那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也加紧开展本地化运动，扩大国营企业。1973年，科特迪瓦政府实行资本和干部的本地化，一方面限制外资企业的资金和雇佣人员；另一方面设立特别基金，扶持本地人企业的发展。同年，加蓬的邦戈总统提出“加蓬第一”和“现实主义”的口号，一方面吸收外资；另一方面积极建立国营的木材、石油、航空公司，大搞合营企业，推行企业加蓬化。1973年底，扎伊尔的蒙博托政府宣布实行经济扎伊尔化，将3000家外国种植园、牧场、农工企业、商业交付扎伊尔人经营；1974年底，又宣布实行彻底化，将扎伊尔化中的大型农工企业和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经营方面遇到困难，1976年，扎伊尔宣布将两化企业股份的60%退还原主，但国营企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控制着扎伊尔经济的70%。

非洲各国的国有化与本地化方式虽然与其发展道路有关，但不是绝对的。不论是搞“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发展自由经济的国家，国有化、本地化政策既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据联合国统计，1960—1976年间，有71个发展中国家共接管外资企业1447家，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管最多，共628家，占总数的43.4%。国营经济资产占固定资本总额的比例，除社会主义国家外，非洲国家是最高的。

4. 计划化与多类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制订了经济发展计划，有短期和中期的，也有长期的。计划体现了它们采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最初的计划着重于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工程以及农田水利的兴建。唯北非、西非少数国家的计划比较注意工业生产。1957年，埃及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了1957年—1962年的五年计划。这也是非洲大陆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它预计投资2.5亿埃镑，兴建冶金、化学、石油、纺织等工业，其60%资金靠外援，由外国贷款。计划实施三年后被弃置，改为更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其原则是争取自制的工业品自给，发展出口工业，用先进的基础工业装备国家；目标是10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该计划投资总额15.8亿埃镑，实际投资14.7亿埃镑；预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实际增长37.1%；整个计划完成了93%。埃及后来又四次颁发五年计划和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突尼斯也较早地实行经济计划，先后制定和执行了三个十年经济发展长期计划（1962—1971，1972—1981，1982—1991），其中又实施过若干短期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由计划与财政部长艾哈迈德·本·萨拉赫提出，称“萨拉赫计划”，其重点是发展国家垄断企业，修建公路、港口，控制对外贸易，实行农业合作化。但由于1968—1969年在合作化中采取了强制措施，导致农业生产停滞，影响了整个计划的完成。1970年，布尔吉巴改组政府，任命赫迪·努依拉接替萨拉赫出任总理，实行第二个十年计划，实行自由开放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实行国营农场、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三种形式并存的农业体制。此计划执行的结果比较顺利，工业获得迅速发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的是加纳。早在 1951 年半自治政府建立之后，加纳就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发展交通、电力和农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1964）规定，建立中小型工矿企业 600 个。1961 年底，恩克鲁玛放弃该计划，在东欧经济专家参与下，实行七年计划（1963—1970），强调高速度发展国营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大举外债，兴建大型发电站、钢铁厂等重工业。1966 年 2 月 24 日，恩克鲁玛被政变推翻，该计划随之中断。津巴布韦的经济计划实施较晚，它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步骤较稳，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1981 年 2 月发表了“公平增长”的声明，认为津巴布韦政府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改造的增长，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需实现社会的公平，即对现存经济结构进行改造。计划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渐进性。1982 年 11 月提出了三年过渡计划（1982—1985 年度），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合作化，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三条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84 年 8 月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1985—1990），继续进行上述三条途径的工作。

选择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实行经济计划。科特迪瓦先后提出了两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并相应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1960—1970）的总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具体要求是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鼓励农产品就地加工，建立进口替代工业。第二个十年计划（1970—1980）的总目标是经济增长向社会进步过渡，具体要求是促进经济继续增长，国民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它以优先发展农业来带动工业、外贸、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整个民族经济的高涨。

1960 年代的这些经济计划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战略，即进口替代。这就是要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加强自力更生，以减少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实行该战略所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本地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鼓励多生产可以替代进口的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减免一些新企业的税收。进入 1970 年代后，有的国家逐步改为出口促进发展战略，建立以出口为方向的工业企业，鼓励和扩大初级产品的加工和出口，多创外汇，促使贸易平衡发展。与此同时，有的国家开始注意到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强调社会总体发展，解决不平衡的增长，重视教育，改善卫生，控制人口，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等。

非洲各国经济发展计划一览

北非：	
埃 及	1957—1960，1961—1965，1966—1970，1971—1975，1973—1982，1982—1987。
苏 丹	1961/62—1970/71，1971/72—1975/76，1977/78—1982/83。
利 比 亚	1963—1966，1973—1975，1976—1980，1981—1985。

(续表)

突 尼 斯	1962—1971 , 1972—1981 , 1982—1991 ; 1962—1964 , 1965—1968 , 1969—1972 , 1973—1976 , 1977—1981 , 1982—1986 .
阿尔及利亚	1963—1964 , 1967—1969 , 1970—1973 , 1974—1977 , 1978—1979 , 过渡年 , 1980—1984 , 1985—1989 .
摩 洛 哥	1958—1959 , 1960—1964 , 1965—1967 , 1968—1972 , 1973—1977 , 1978—1980 , 1981—1985 .
西非 :	
毛里塔尼亚	1960—1962 , 1963—1967 , 1970—1973 , 1976—1980 , 1981—1984 , 1985—1988 .
塞 内 加 尔	1961—1964 , 1965—1968 , 1969—1972 , 1973—1976 , 1977—1980 , 1981—1984 .
冈 比 亚	1960—1963 , 1966/69—1969/70(放弃) 1964—1971 , 1973—1978 , 1981—1984 , 1985—1987 .
塞 拉 利 昂	1962/63—1971/72 , 1981/82—1983/84 .
利 比 里 亚	1951—1960 , 1972—1976 , 1976—1980 , 1981—1985 .
科特迪瓦	1960—1970 (1960—1965 , 1967—1970) , 1970—1980 (1971—1975 , 1976—1980) , 1981—1985 .
加 纳	1951—1956 , 1957—1959 , 1959—1964 , 1964—1970(放弃) , 1983—1986 .
多 哥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 1981—1985 .
贝 宁	1962—1965 , 1966—1970 , 1977—1980 , 1983—1987 .
尼日利亚	1962—1968 , 1970—1974 , 1975—1980 , 1981—1985 .
马 里	1961—1965 , 1969—1972 , 1974—1978 , 1978—1982 .
尼 日 尔	1961—1963 , 1965—1968 , 1979—1983 .

(续表)

布基納法索	1961—1970 , 1967—1971 , 1972—1976 , 1977—1981 , 1984—1985 , 1986—1990 。
中部非洲：	
乍 得	1964—1965 , 1966—1970 。
喀 麦 隆	1960—1980 (1960—1965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1981—1985 。
刚 果	1961—1964 , 1964—1968 , 1982—1986 。
扎 伊 尔	1965—1969 , 1977—1980 , 1981—1983 , 1986—1990 。
加 蓬	1963—1965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暂停) , 1979—1983 , 1984—1988 。
东非：	
埃塞俄比亚	1958—1962 , 1963—1967 , 1968—1972 , 1974—1978 , 1984/85—1993/94 。
索 马 里	1963—1967 , 1971—1973 , 1974—1978 , 1979—1981 , 1982—1986 。
肯 尼 亚	1964—1970 , 1970—1973 , 1974—1978 , 1979—1983 , 1984—1988 。
乌 干 达	1966—1971 。
坦 桑 尼 亚	1961/62—1963/64 (坦) , 1964—1969 , 1969—1974 , 1977—1981 , 1981—1986 。
卢 旺 达	1965—1968 , 1971—1975 , 1976—1981 , 1982—1986 。
布 隆 迪	1973—1977 , 1978—1982 , 1983—1987 。
马达加斯加	1965—1970 , 1970—1974 , 1974—1977 , 1978—1980 , 1982—1984 。

续表

南部非洲：	
赞 比 亚	1965—1970 , 1971—1976 , 1979—1983 。
马 拉 维	1962—1965 , 1965—1969 。
津 巴 布 韦	1962—1984 , 1985—1989 。
博茨瓦纳	1963—1969 。

三、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非洲经济建设的成就

共同的发展措施使非洲各国经济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历程。1960 年代以来,就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进展而论,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960—1975 年是经济明显增长时期;1975—1985 年是停滞和困难时期;1985 年之后是调整和复兴时期。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由于非洲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对殖民地的经济进行了初步改革,加之国际经济环境比较有利,非洲经济朝气蓬勃。据统计,1950 年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按 1970 年官方货币行市计价)为 280 亿美元,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35 美元;1960 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390 亿美元、150 美元;1970 年分别增加到 580 亿美元、175 美元;1975 年又增长为 730 亿美元和 195 美元。1960 年代,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4.7%,1970 年代的最初几年仍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

民族经济的形成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成就。1956 年后,随着埃及化、国有化的实施,埃及政府在接管英法资产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称为“经济组织”的机构。1958 年,该组织控制了所有专业银行、7 个商业银行、5 个保险公司。它在商业银行发放约贷款总额中占 50%,在保险业务总额中占 68%。1960 年后,政府进一步扩大国有化,将埃及银行等私人资本也实行国有。不久,埃及的金融、交通、公用事业、旅游、文化事业 100%国有化,工业、进口贸易国有化程度为 90%,国内贸易为 40%,形成国家垄断的经济体制,私人投资在国家总投资计划中只占 10%。整个经济命脉已被国家所控制。

突尼斯与埃及的经历相似,独立初期便收回货币发行权和海关、贸易、交通、水电等部门的控制权。虽然

萨拉赫经济计划有许多失误，但其目标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兴办了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新型企业，设立了专卖公司和经济管理部门。不到 10 年，作为民族经济的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2/3。1961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7.7 亿美元，1981 年达 71 亿美元，20 年翻了三番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81 年达到 1420 美元。

几内亚在法国经济扼杀政策的压力下，加紧发展民族经济。依靠本国资源和利用外援，建立了 100 多家国营企业，大部分是工业项目，从而使国家资本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对外国公司的国有化而奠定了民族经济的基础。扎伊尔在殖民统治时期，比利时总公司等五大垄断公司控制着其全部企业的 90%，扎伊尔采矿业主要控制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手中。1966 年起，蒙博托政府对比利时人控制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接着又实行扎伊尔化，国营扎伊尔矿业总公司便控制了全国的矿业，为国家提供 60% 以上的外汇收入；同时又建立了一批钢铁厂、汽车和拖拉机装配厂、化工厂等，民族经济迅速增长。扎伊尔独立前的 1959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3 亿美元，1974 年达到 33.33 亿美元。“铜矿之国”赞比亚也是这样独立后卡翁达进行了历时 10 年的经济革命，将铜矿、交通等企业收为国有，又建立国营的水泥、化肥、制糖等企业，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民生产总值由 1960 年的 13.8 亿美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22.15 亿美元，为赞比亚民族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

这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另一成就是现代工业的迅速

成长，旧的经济结构逐步被改造。殖民者出于掠夺的需要，在非洲建立了一些工矿业和民用工业，但数量、规模、设备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有的努力发展轻工业，有的大力扩建利用本国资源的农产品加工工业，结果在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而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例如，在埃及 195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占 15.6%，农业产值占 30% 多；1960 年则分别为 24% 和 30%；1981 年为 38% 和 21%。埃及工业还改变了以农产品加工和轻纺工业为主的状况，建立了冶金、化工、电器、电子等新兴工业。其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不再是以棉花等农产品为主，工业产品出口不断增加。1979 年，农产品只占出口总额的 29.1%，而工业品则上升到 37.5%。

阿尔及利亚重工业的发展是十分突出的。1967 年，布迈丁大力推行工业化计划，在对石油资源和金融、贸易等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国营工业公司。仅十几年时间，阿尔及利亚就建成了以哈西梅萨乌德油田和哈西勒气田为中心的油气基地；在阿尔泽、阿尔及尔等地兴建了世界第一流的炼油厂、天然气加工厂和港口，形成了一个从勘探、生产、提炼、化工直到运输和销售的油气工业体系。巨额的碳化氢工业收入被用来发展其他重工业。安纳巴附近的哈贾钢铁联合企业、君士坦丁的拖拉机、机床、发动机等机器制造业，阿尔及尔汽车制造厂等一大批工业基地相继出现，从而形成以基础工业为骨干，包括电子、纺织、造纸、食品等各种轻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速度平

均每年为 7.2%，全国电气化程度从 1970 年的 38% 增到 1977 年的 70%，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独立初的 35%，增到 1978 年的 56%，农业产值由 1967 年的 13% 下降至 1978 年的 8%。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独立前的工业非常落后，独立后短短 10 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独立时的坦桑尼亚大陆只有 220 家小工厂，产值为 20 万先令，到 1970 年已有大小工厂 1230 家；过去的铁路交通破旧不堪，1967 年起在中国帮助下修建了全长 1860 公里的坦赞铁路；过去没有航空事业，1977 年成立了坦桑航空公司；独立时全国只有 185 个电话局，现在增加到 719 个，并建立了自己的卫星通讯站。邻国肯尼亚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它注重利用本地的和进口的原料发展制造业，独立后头 15 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 11.75%，其产值由 1964 年的 3370 万肯尼亚镑增到 1982 年的 3.84 亿肯尼亚镑，成为东非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到 1970 年代末绝大部分工业消费品都能由本国生产。

各国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扩大粮食生产，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为此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高坝就是一项大型综合工程，坝长 4200 米，高 111 米，水库可容水 1300 亿立方米。该工程 1958 年底动工，1964 和 1970 年分两阶段建成。它扩大了尼罗河谷地与三角洲的灌溉面积，仅 1960—1980 年共开垦了 47 万公顷土地。苏丹为扩大利用青尼罗河的水利资源，1957 年在杰济腊灌区以南开辟新的迈纳吉勒灌区，1961 年兴建罗塞雷斯水坝，扩大浇灌面积上百万亩；1973 年又修建腊哈德工程，在青尼罗河右岸建造了一个巨大抽水站，可浇灌 12.5 万公顷农田。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兴建沃

尔特河上的大型水电站，1962 年动工，1965 年建成，发电量为 52.76 亿度，提供全国电力消费的 99%，既可用于开采附近的铝土矿炼铝，还可灌溉阿克拉平原的部分土地。西非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流域诸国都普遍制订了各种水利建设蓝图。尼日利亚的贝卡洛里水利工程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在改变非洲贫穷面貌方面，非洲石油生产国的巨变是令人赞叹的。尼日利亚从 1958 年开始进行石油的商业性开采，1965 年只产原油 1330 万吨，1974 年达到 1.12 亿吨，成为“非洲石油巨人”、世界产油大国之一。石油已成为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60 年石油出口只占出口总值的 2.6%，1974 年达到 92.6%。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由 1960 年的 31.5 亿美元增加到 1980 年的 911.3 亿美元，平均每年以 12—20% 的速度发展。独立时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仅有 1.73 亿奈拉，1973 年增至 16 亿奈拉，1982 年达 116.3 亿奈拉，增加了 67 倍。政府用石油财富在 10 年内兴建了炼油、钢铁、汽车装配、纺织等现代化企业和具有当代高水平的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项目 200 多个。

利比亚独立前极端贫穷，1951 年人均收入只有 35 美元。1959 年在荒漠的泽勒坦打成第一口高产油井之后，接着又发现了六大油田，40 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在这里开采，产量成倍增长。1969 年卡扎菲执政后，通过国有化将石油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1969 年石油收入为 11 亿美元，1974 年为 62 亿美元，1980 年高达 232 亿美元，人均收入 1.0309 万美元（1977 年 290 万人），比独立时增长了将近 300 倍，超过了美国（9770 美元）。政府用石油收入兴建 300 多家工矿企业，开垦荒地 92628 公顷，

大办福利事业，实现了“户户有其屋”的计划，改变了过去牧民无住所的状况。

加蓬的致富仅次于利比亚，石油、锰、铀、木材是其四大经济支柱。1956年，加蓬开始在沿海采油，产量由1960年的80万吨猛增至1976年的1132万吨。1960年代初又开始开采油、锰矿，10年内产量均增长10多倍。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316亿非洲法郎增长到1976年7191亿非洲法郎，约21倍。人均国民收入由1966年的480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2770美元（按全国126万人口计算），居黑非洲第一位，全非第二位。

1960—1970年代，科特迪瓦、喀麦隆、肯尼亚等国通过发展农业及有关的加工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特迪瓦在博瓦尼领导下，根据本国矿产资源不十分丰富的实际，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它在扩大传统作物咖啡、可可的同时，注重因地制宜和多种经营，鼓励种植油棕、椰子、香蕉、橡胶、蔗糖、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发展粮食生产。1961—1977年，可可产量增加3.3倍，居世界第一位；咖啡产量增加1.6倍，居世界第三位。1965—1977年，棉花产量增加13倍，仅次于埃及、苏丹，居非洲第三位。稻米产量由1965年的6.2万吨增加到46万吨，做到了粮食自给。科特迪瓦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实行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的方针，建立咖啡、可可、木材加工业和纺织、橡胶、食品等轻工业，改变了独立前基本上没有工业的状况，以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其工农业产品主要面向出口，整个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960年代的7.5%增长到1976年的12.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53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1169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誉为“非洲的

经济奇迹”、“西非经济的橱窗”。

四、一九七〇年代后期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非洲经济的严重困难

从 1970 年代中期起，非洲经济出现了停滞、衰退和日益恶化的局面。造成这种状况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国际经济条件的恶化，给非洲经济带来严重影响。1974—1975 年和 1979—1982 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肆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政策，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例如，1972 年非洲用 38 吨剑麻或 7 吨棉花可换回 1 辆卡车，到 1980 年则需要 138 吨剑麻或 28 吨棉花才能换回 1 辆卡车。非洲国家那种依靠一两种农、矿产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还未得到改造，因而不能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所造成的苦果。

自然灾害也加剧了经济困难。1973—1974 年、1977—1978 年、1982—1984 年，非洲接连发生了三次大旱灾，从非洲之角到西非萨赫勒地区的 44% 的非洲土地持续干旱，波及 30 多个国家，受灾人口近 2 亿，牲口死亡 100 万头。加之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每年 6—7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被侵蚀，直接威胁到 6000 万人的生活。此外，有的国家还发生了蝗灾和水灾。

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造成非洲国家困境的主观原因。由于各国普遍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抓农业不够，有的国家只注重能创外汇收入的一两种经济作物或矿产品，忽视了粮食生产，因此农业投资普遍不足。而且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偏低，经济作物的出口税征得较高，这些都

严重地阻碍农业的发展。例如，尼日利亚 1960 年代粮食能够自给，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80%；1970 年代因侧重发展石油业，农产品出口值的比重下降为 30%，1980 年代仅占 5% 左右。粮食生产的下降导致 20% 的粮食需要进口，1980 年进口粮食花了 27 亿美元，使外汇大量外流。由于经济发展过份依赖石油，也必然受到国际市场供求情况的制约，造成经济的不稳定。

非洲国家独立后所普遍采取的国有化、非洲化、集体化等措施，固然对于振兴民族经济有积极作用，但是有的国家搞得过快过激，有的国家使国营经济所占比重过大，不恰当地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另外，政府对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管理机构过分膨胀，管理水平不高，也抑制了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者积极性的提高。例如，1973—1974 年蒙博托搞的大规模扎伊尔化和彻底化运动，脱离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干部、技术力量的条件，当大量的外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工矿、建筑、运输和商业收归国有或转卖给扎伊尔人所有后，各种问题都发生了。这些企业、商店实际上落入了党、政、军干部和接管代表的手里，他们滥用职权，趁机贪污挥霍，大发横财，致使这些企业、商店停工减产，亏损倒闭；加之外国资本家转移资金，断绝货源，制造种种困难，使扎伊尔经济在 1975 年几乎完全破产。蒙博托被迫改行非扎伊尔化，将外国企业的大部分股份退还原主，这又使国家遭受了一次损失。乌干达的阿明（1971—1979 年执政）打着乌干达化的旗号，于 1972 年发动经济战，一举驱逐了五六万英国人和英籍亚洲人，全部接管其经营的 500 多家企业和 4753 家商店、21 座茶园（占全国茶园面积的 48.3%）。由于军政府无能

力管理，加上外在因素，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77—1978 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约为 8.3 亿美元，而是年累计财政赤字就有 8.28 亿美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几内亚一度实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对殖民地经济结构的改革和国营经济的确立都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国有化规模过大，管理不善，农业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变换频繁，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1975 年 2 月颁布《经济宪章》之后，几内亚开展经济圣战，取缔私人商业，征收矿产品出口特别税，结果造成了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国营工厂开工率不足 20%，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77 年 8 月 27 日，科纳克里市民主要是妇女小商贩反对《经济宪章》，要求取消经济警察，允许自由贸易。他们前往总统府请愿，遭到军警开枪镇压，造成流血事件。这是群众对塞古·杜尔过激的经济政策的挑战。

在坦桑尼亚，1974—1976 年按照关于三年内实现全国农村乌贾马化的决议，掀起了大规模的村庄化运动，三年内新村由不足 5000 个猛增到 8000 多个，居民由 250 万增到 300 万，占农业人口的 80%。村政府掌握土地分配权，农民主要在村庄附近的集体田中劳动，收获归村政府，另外还领到一些远离村庄的私田和少量家宅田。农民不愿在集体田中劳动，也不愿向产权易变的私田里投资。由于土地休耕指数减少，加之缺乏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及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农村生产秩序的混乱，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由基本自给转为大量进口。1977—1978 年，坦桑尼亚进口谷物 10—12 万吨，1981—1982 年增至 39 万吨。尼雷尔在 1975 年承认建立高度集体化的乌贾马村是不实际的，开始纠正偏差，拨

款 6000 万先令，赔偿在强制搬迁中农民的财产损失。

非洲各国对增长过快的人口普遍缺乏控制，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非洲有一夫多妻制的传统，独立后又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出生率逐年提高而死亡率不断下降。其人口自然增长率 1960 年为 2.5%，1983 年为 3%，个别国家高达 5% 左右。据联合国 1961 年统计，非洲有 2.56 亿人；1980 年增到 4.72 亿人；1985 年又升到 5.31 亿人，25 年翻了一倍多。人口的过份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得不用于新增人口的需要，从而减少了用于发展的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这一时期非洲经济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严重的经济衰退。1970 年代，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2.7%；1980—1984 年，下降为 1.1%。按人均计算，1960 年代为 1.3%；1970 年代中等收入国家减少到 0.5%，低收入国家减到 0.3%；1980—1984 年出现负增长，为 -1.7%。工业制造业 1975—1979 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7.5%；1980 年代急剧下降，1980—1982 年出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4.1%。农业也呈现下降趋势，1960—1970 年非洲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 2.7%；1970—1980 年下降为 1.3%；1983 年还不到 1%。

第二，粮食危机。1960 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粮食可以自给，有的还有余粮出口。但从 1970 年代中期起，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非洲成为“饥饿的大陆”。人均粮食的年增长率 1960—1970 年曾为 0.1%；1970—1980 年则为 -1.1%。据联合国粮食组织 1981 年报告，在 55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中，缺粮国 45 个，占国家和地区总数的 81.8%；其中自给率在 60% 以下的严重缺粮国有 20 个，

1984—1985 年又增加到 24 个；食不果腹的人口达 1.5 亿，占非洲人口总数的 1/3，每年有 500 万以上儿童被饿死。此外，由于边界冲突、内战以及灾荒，非洲难民逐年增加，1982 年达到 630 万，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一半，这更加重了粮食危机。

第三，对外贸易停滞。由于非洲外贸条件不断恶化，农、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出口困难，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则迅速上涨。粮食与农产品加工品的进口与日俱增，1970 年非洲各国进口谷物 730 万吨，1981 年增加到 2140 万吨，这就加大了外贸逆差。据统计，非石油输出的外贸逆差 1975 年为 68 亿美元，1981 年增至 162 亿美元。这类国家的进口贸易指数如以 1980 年为 100，1984 年则降为 79。1986 年，非洲在世界外贸出口总额中仅占 3%，在进口总额中也仅占 3.5%。

第四，外债沉重。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 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为 132 亿美元，1980 年增至 1269 亿美元，1986 年底达 2000 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 20%。1970—1986 年的 17 年间，外债增加了 15 倍，而且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很大。2000 亿美元的债务占非洲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50%，占其对外贸易和劳务出口收入的 400% 以上。在西方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的条件下，非洲国家的还债能力是很弱的。1980—1987 年，非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 25%。在联合国确定的 1980 年代世界 39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有 27 个，占 2/3。非洲 70% 的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因而相当多的非洲国家部分或全部地丧失了还债能力。

非洲经济的发展历来是不平衡的。即使在此困难时

期，有的国家也仍能保持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增长。例如，在普遍发生粮食危机的形势下，马拉维、津巴布韦、喀麦隆、多哥、尼日尔等都能实现粮食自给和少量出口。马拉维是一个农业小国，独立后坚持走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它推行土地发展计划，建立农业增产计划，以区作为基层组织，扶助小农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推广先进技术，鼓励多样化种植，并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其谷物平均单产由独立初期的每公顷 1115.4 公斤增长到 1982 年的 1399 公斤，其中玉米、水稻分别增长 39% 和 13%，每年出口 3—4 万吨玉米。1985 年，马拉维的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90%，其中桐油出口居非洲首位，茶叶和烟草居第二位。

尼日尔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内陆国，1966 年发现铀矿，其储藏量居世界第六位，1971 年正式开采。1974 年孔切军政府上台后，逐步收回铀矿主权，改变完全受法国控制的地位，大量引进各国外资，扩大开采，年产量由 1971 年的 400 余吨猛增至 1980 年的 4300 吨。由于铀矿收入的增加，国家预算总额不断增大，1974 年为 142 亿非洲法郎，1979 年为 567 亿非洲法郎，1986 年达到 879.3 亿非洲法郎。孔切政府制定了全面发展计划，用较多的资金发展农牧业生产，到 1979—1980 年度实现了粮食自给，同时还发展了各种加工工业。

博茨瓦纳与尼日尔情况类似，过去也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内陆国，全境 2/3 地区为沙漠覆盖，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养牛业。独立后的第二年（1967 年），在卡拉哈里沙漠东部边缘地区的奥拉帕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巨大管状钻石矿，1971 年开始大规模开采，年产量 91.4 万克拉，1980 年增至 510.1 万克拉，一跃而为世界第四

大钻石生产国（仅次于扎伊尔、苏联、南非）。钻石的出口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民生产总值也随之从 1966—1967 年度的 3700 万普拉增至 1978—1979 年度的 5.034 亿普拉。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独立时的 35 美元猛增到 1000 美元，1985 年国际收支盈余 2.5 亿美元，被誉为“黑非洲成功的范例”。

毛里求斯也是这一时期少数经济发展较好的非洲国家之一。这个仅有 105 万人口的岛国，过去是依靠甘蔗种植和蔗糖出口的单一经济国家。1968 年独立后，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1971 年在非洲首创出口加工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工区的企业由 1971 年的 10 家增到 1976 年的 85 家，1986 年又增至 377 家。就业人数由 1976 年的 1.74 万人增加到 1985 年的 4.67 万人，主要从事服装加工、纺织、玩具生产、首饰加工等生产，成为世界第三大毛织品出口国。加工区的出口收入占 1985 年国家出口收入的 47%，1986 年又增至 53%。与此同时，毛里求斯大力发展旅游业，1970 年只有旅馆 16 家，游客 2.7 万人，1986 年则分别增长了三倍和五倍。对于传统的蔗糖业，国家采取技术改造调整措施，从而与出口加工业、旅游业共同成为该国的三大经济支柱。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5 年的 700 美元增长至 1985 年的 1240 美元，在非洲国家中居第十位。它的发展与非洲大陆多数国家的经济停滞形成明显的反差，因而被称为“印度洋上的一只经济猛虎”。

埃及进行经济调整比较早，它在 1975 年后的非洲经济困难时期中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纳赛尔逝世前后，埃及曾出现过经济上的“七个瘦年”（1967—1973）。

萨达特上台后，调整政策，赢得“七个肥年”。他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1974年4月18日提出《十月工作文件》。确定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强与西方联系、鼓励私营经济等原则。同年6月27日，实施关于外资（包括阿拉伯资本）和自由区的第43号法令，宣布对外资不没收、不监督、不国有化，在5—8年内免征一切关税，允许合资公司中外资可拥有49%股份，并开辟塞得港、苏伊士、亚历山大、开罗为自由区。1973—1983年间，埃及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8%，国民生产总值1972年为78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27亿美元，1984年人均国民收入584美元。石油工业、劳务输出、运河、旅游发展成为埃及四大经济支柱。1976—1980年，完成了运河第一阶段扩展与加深工程，使70%的世界大油轮可以通过。但是开放政策也给埃及带来了各种问题，如外债增加、外汇外流、通货膨胀、物价体系紊乱等，穆巴拉克上台后不得不进一步调整经济。

五、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

‘非洲的经济困难形势在1985年出现了转机，粮食获得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严重缺粮国由1984年的21个减少到6个，粮荒问题有所缓解。非统组织于1985年7月举行第二十一届首脑会议，讨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通过了《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划》。1986年5月底，第十三届特别联大也专门审议非洲经济问题，6月1日通过《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非洲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全面调整和逐步复兴的阶段。

关于非洲经济的调整问题，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就已进行过酝酿。1980年4月，非统组织召开经

济特别会议，根据 1979 年第十六届首脑会议通过的《蒙罗维亚战略》所提出的基本思想，通过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该文件强调以集体自力更生和自强自立的精神来发展非洲社会经济；改变只依靠一两种初级产品出口的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减少和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计划还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强调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到 2000 年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非洲各国资金不足，技术力量缺乏，管理水平低下，又受到西方经济衰退和非洲大陆旱灾的冲击。《拉各斯行动计划》基本上无法执行。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在其非洲董事们的要求下，1981 年 10 月以“非洲战略评论小组”名义发表了《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行动备忘录》。评论小组的协调人是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美国教授艾略特·伯格，因此该文件又称《伯格报告》。报告强调造成非洲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主观因素，提出的解决措施是：(1)改革体制，以市场调节替代行政控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和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2)调整价格和税收政策，实行更加合适的贸易和汇率政策，要求货币贬值；(3)优先发展农业，采取以农业为基础和出口为方向的发展战略，并认为这是非洲向工业化过渡的长期过程的开始。报告还强调外援作用，将赠与援助战略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考虑非洲国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为此，该报告引起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有关人士的批评，没有被非洲国家接受。于是世界银行又发表了两个补充性报告，即 1983 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关于发展前景和计划的进度报告》和 1984 年的《走向持续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项共同行动纲领》。这两个报告重申

第一个报告的主题，只是对国际经济环境和援助形式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非洲各国政府在严峻经济形势面前不得不承认以往政策上的失误，也感到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和调整，于是对《伯格报告》中的某些建议表示可以接受。

1985 年非统的计划和 1986 年联大的纲领，既包括了《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基本战略思想，也适当地吸收了《伯格报告》的一些改革措施。计划和纲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非洲各国下定决心作出承诺，根据非统的计划，制订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响应并承诺支持、辅助非洲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努力。

按照上述计划，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进行经济调整。首先是改变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及农业内部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例，增加农业投资，重视粮食生产。例如，沙德利继任阿尔及利亚总统后，于 1980 年 6 月主持召开了民族解放阵线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得失，在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同时，调整政策，制定了十年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强调优先发展农业、水利、住房、轻工和服务行业。1982 年 3 月，新建农业银行，加强对农业特别是私人农业部门的投资和信贷。国家还放宽对农产品的统购包销政策，允许自管农场、合作社和个体农户自由出售粮食以外的农产品，提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的口号。坦桑尼亚 1984 年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安排了一个三年结构调整计划，强调发展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并提出注重小农经济。1987 年 2 月 5 日，尼雷尔在庆祝阿鲁沙宣言发表 20 周年的群众集会上指出：“目前，我们整个经济仍继续

依赖农业。……而小农经济则是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我们的一切工作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应着眼于加强个体农业。”

其他一些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也进行了农业政策的调整。如尼日利亚在 1980 年后注意开展绿色革命，提出五年内达到粮食自给和七年内恢复传统经济作物的优势，农业投资逐年增加。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在 1987 年 6 月号召全国进一步重视农业，开展第二次绿色革命，安置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在种植方面，政府既重视咖啡、可可生产，又强调全面发展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加速产品出口多样化，不仅要实现大米自给，而且要将科特迪瓦变为“西非粮仓”。

非洲国家的另一重要调整措施是整顿国营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或其他非国有化措施，鼓励私营经济，以解决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管理不善、冗员充斥、产品质次价高、政府补贴负担过重等问题。这是关系到所有制结构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多哥最先开始私有化，从 1982 年起先后将 8 家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关闭，5 家全部私有化，2 家部分私有化，4 家实行租赁。政府不仅不再给这些企业财政补贴，而且每年可从租赁企业中获得约 389 万美元租金。其中国家钢铁公司自 1979 年建成投产后一直亏损，开工率不到 20%；1984 年租赁后，第一年就转亏为盈。不过多哥政府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对碳化氢公司、磷酸盐公司、自来水、电力公司等 50 多家国营、准国营企业没有实行私有化，它们占全国企业的 70% 左右。这一改革使多哥政府的财政赤字由 1982 年的 170 亿非洲法郎降至 1985 年的 50 亿非洲法郎。

塞内加尔拥有 57 家国营企业，从 1984 年起，除了磷酸盐、化工、能源、运输等企业外，有 26 家实行了私有化或半私有化。尼日利亚在 1980 年代初停止了本地化运动，1988 年中宣布将尼日利亚饭店集团、乳品公司、木材公司等 49 家全部私有化；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商业银行、报业、钢铁厂等 47 家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给私人；对国家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电力、铁路公司只实行经营商业化或半商业化。为防止私人垄断取代国家垄断，政府规定任何个人不得购买有关国计民生企业的 5% 以上的股票。据统计，1988 年已有 20 多个非洲国家，如科特迪瓦、喀麦隆、加纳、刚果、扎伊尔、安哥拉等，先后颁布了私有化的法律和法令。

非洲各国的经济调整还表现在财政金融和物价方面。它们紧缩公共开支，实行货币贬值，减少货币供应量，调整汇率，放松对价格控制，减少或取消物价补贴，实行贸易自由化、多元化，加强非洲区域性经济合作等，其主要用意是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以便搞活经济。

这些调整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报告的材料，非洲生产总值 1986 年增长 1%，1987 年增长 0.8%，1988 年增长 2.3%；农业生产增长率 1986 年为 3.8%，1987 年为 1.1%，1988 年为 4.54%。

少数非洲国家取得了明显的可喜成果。加纳自 1983 年制定了系统的经济改革计划后，着重改革国营企业，鼓励以市场方式经营，推行经济自由化。1983—1986 年第一阶段计划顺利完成，可可产量从 1983—1984 年度的最低点 16 万吨开始回升，到 1986—1987 年度产量达 22.5 万吨；1983—1987 年间出口总额从 4.93 亿美元增至 7.7 亿美元，进口总额从 5 亿美元增至 8.79 亿美元。

1985 年末又实行第二阶段调整计划（1986—1988），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其他渠道的优惠资金为其改革提供了援助。几内亚自 1984 年孔戴军政府建立后，也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5 年 12 月 22 日，几内亚与上述两组织达成协议，开始其全面的经济改革，杜尔时代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方向被完全扭转，军政府取消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撤消了全国 360 个县农牧场，重建金融货币体系，实行国营工商业私营化，精减机构，裁减冗员，制定了各种经济法律和法规。改革的第一年就收到明显效果，国内生产总值 1987 年比 1986 年增长了 6%，通货膨胀率从 1986 年的 71% 下降到 1987 年的 33.7%。

非洲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步履是艰难的，成绩也非常有限。截至 1990 年，非洲的经济颓势，仍未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国际贸易条件对非洲的改革十分不利。非洲政局动荡，政变频繁，连续不断的干旱和虫灾也造成不利的因素。特别是非洲国家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小，而阻力却很大。一些国家领导人担心改革会否定自己的过去，动摇自己的地位，因而只将改革作为对付当前困难的应急手段，不愿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各级官员视国营企事业为私物，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也不愿有大的变革。有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开支、裁减人员、贴值货币、取消补贴后，引起了物价上涨，群众不满（如赞比亚的“玉米”骚乱，马达加斯加的抢劫商店事件），这也使一些改革措施随之夭折。此外，非洲大陆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居世界各大洲之首，激增的人口很容易地把调整改革的一点成果吞没，而且还会带来新的问题。显然，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 and 改革

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非洲独立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

一、非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经过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殖民地变成了新兴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已从殖民主义者之手转移到非洲人手中；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被看作资本主义文明的“肥料”，而今他们一变而为历史的主体。非洲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双手画出了非洲第一张崭新的政治地图。

独立以来，非洲政治体制纷繁多样，但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们自身的发展变化中，特别是1960年以来的政变、反政变以及内战中，非洲的政治地图被再次重绘。最古老而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帝国或王朝（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布隆迪、卢旺达及桑给巴尔等）相继垮台。独立初期殖民主义扶植的傀儡和代理人政权都先后被人民的革命风暴席卷而去，少数最残暴的统治者遭到可耻的下场。民族主义国家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其中大多数为民主共和体制。

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和军政权都积极努力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并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政权为杠杆，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民族经济获得了发展，初步建立一种新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层次的混合经济体制，从而为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传统部落或部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传统信仰再次受到严重的挑战。国家独立、自主能力都

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和增强。在非洲北部，虽然社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有些国家甚至卷入地区冲突，但它们一般具有相当强的应变能力，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保持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在增多。

以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四国为例，它们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但都长期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由于坦桑尼亚革命党组织比较严密，具有一定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领导或指导作用，成了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渠道。该党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业已开始，从而避免由于经济一度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能产生的社会动乱。在当今非洲民主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坦桑尼亚政体改革尚能按执政党设计的框架比较稳妥而有秩序地进行。其他三个国家的执政党都是群众性的党，组织比较松散，几乎处于行政机构的从属地位，但是由于这三个国家在 1980 年代以前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提高而得到了补偿。当然，这四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也是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都是民族解放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博瓦尼从独立迄今一直是科特迪瓦的国家元首。尼雷尔、桑戈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主要流派的倡议者，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尼雷尔在独立后不久就赢得了“思想家”的称号，并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而在第三世界享有盛名。桑戈尔则以国务活动家、诗人而闻名于世。阿希乔用“铁血”手腕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虽然尼雷尔和桑戈尔主动让贤，离开了领导岗

位，但却为他们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奠定了初步基础。与这些国家相同的还有博茨瓦纳、肯尼亚、加蓬、赞比亚等国。博、肯两国在领导人去世后未出现动荡而实现了权力的转移或接班。

军人统治（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国家政绩各异。不少军政权基本结束了在他们上台前政局长期动乱的混乱局面，人民初步得到了暂时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贝宁堪称是非洲政见分歧、部族分裂最深的国家之一，从1963—1972年间发生过36次政变。克雷库1972年举事成功后，保持了长达18年的和平环境。刚果、多哥、尼日尔、卢旺达等国也经历了类似情况。有的则进行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埃塞俄比亚、纳赛尔统治时期的埃及、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有的虽没有重大的改革，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如多哥、尼日尔、毛里求斯等国。

然而，非洲独立国家都是年轻的新兴国家，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迄今尚未改变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仅仅是独立前社会的延伸而已。其发展、社会分工及生产者的分工仍处于极低的水平，阶级分化迟缓而不足，阶级界线模糊，阶级队伍尚不固定，变化不大，凝聚点低。任何阶级、阶层和势力集团都参与政治，对其进程施加影响，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单独地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非洲政治国家因而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国家出现时所达到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在政权建设方面，一些国家因袭或模仿西方民主制，结果均告失败；即使其形式相似，实质也有极大的差别。博瓦尼曾指出，在西方，国家最终“打乱了社会结构，从此能按照国家意愿来确立社会制度。在非洲，这一进程只能艰难地、

时断时续地反复进行，在多数情况下会造成国家动荡和不安”。同样，另一些国家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也同样遭到失败或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非洲国家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也无论当权派是多么的虔诚，其结果既非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多数正在为从殖民地社会过渡到某种类型的社会创造前提。目前，非洲仍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政权的模式必需与现阶段的情况相适应，并要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非洲政治发展、政权建设受到历史、文化和低发展综合症等等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到独立前的政治体制的影响。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体制使非洲人民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权利，非洲是被迫接受外来统治形式的。独立初期，它们都沿袭这种非独立状态的政治结构和设置。只是后来通过非殖民化，特别是非洲化和激烈的社会冲突，这种外来的政治体制才被打乱，打破，但仍旧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二，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道路、方式和时间各异。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埃及、埃塞俄比亚系君主国，以后经过人民的斗争，才采用了其他政治统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有的经历了长期武装斗争的阵痛，有的则通过宪政改革道路分阶段取得独立，有的则一举成功。独立后所面临的使命不同，所依靠的支柱各异。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削弱帝国主义和封建、半封建势力，有的则仍然要依靠它们。殖民主义势力、封建或半封建势力对这些国家仍然是一个牵制很大的因素。

第三，非洲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在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者以掠夺为主，除沿海地区或城市及战略地区有较发达的经济外，在非洲社会内部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或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化的大生产。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经济仍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目前多数国家都处在生存和发展双重的严重危机中，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型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落酋长制度都大致不变地被保留下来，并极大地影响政局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建设。

第四，由于非洲各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宗教和民族的构成不同，独立时几乎没有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能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感情虽曾指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独立后不少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也试图缔造一种主导文化，以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迄今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五花八门。非洲既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民族主义思想，又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有 10 多种不同派别，在资本主义思潮里也有不同的流派。在宗教方面，除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外，各部落、地区还信奉原始宗教。可以说，在非洲没有无神论者。神对非洲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在非洲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洲国家无论以何种思想为指导，采取何种统治形式或管理方法，都必须处理好社会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塞内加尔前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拉亚姆所指出的，“在非洲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各方面结成的：有部族关系、宗教关系、职业关系、意识形态关

系,也有阶级关系”,所以国家必须“学会尊重”和“处理好”这些不同的关系,否则就要受到限制、约束,甚至于遭到破坏。这就决定了非洲国家政权不仅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政局的发展只能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向前。

非洲政局的动荡、政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在几个大洲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也是令人烦恼而沮丧的,因为它已形成了动荡与贫困的恶性循环。非洲面临安全、生存和发展的综合危机,这种危机阻止或延缓了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有可能孕育着非洲新的政治体制。1980年代末期以来,非洲掀起了猛烈的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浪潮,冲击着绝大多数国家现政权的合法性,政权建设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非洲,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和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多数国家再次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激烈动荡期中。也许它可能成为完善政权的起点,但要真正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情况的政权模式及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革命阵痛。目前认真的探索仅仅开始,道路将是漫长的。

二、非洲民族主义政权建设进程的坎坷不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出现。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时,非洲独立国家由战前的4个(含南非)发展到51个。1990年2月,纳米比亚的独立,使这个数字又增加到52个。

独立仅仅是非洲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赢得解放的第一步。非洲国家必须以独立为契机,以政权为杠杆,积极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以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而 1960 年代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建立民族主义政权，以维护刚取得的独立成果。

非洲国家独立既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与宗主国谈判达成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是双方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宗主国的抉择，即选择同自己思想、战略观点一致的“可靠伙伴”，以继续保持其传统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独立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的选择，即选择同宗主国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才能有利于维护自己已取得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独立伊始，非洲就形成了三类不同类型的年轻国家。

一类继续保持与宗主国的密切联系，处于半独立状态。这类国家独立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受宗主国支配，甚至与宗主国签订军事条约，允许宗主国驻军，保留军事基地。如留在法兰西共同体的多数国家，以及英国联邦内的自治领地等。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多数。

一类基本保持老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势力，又与新殖民主义达成妥协。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扎伊尔。一方面比利时不愿放弃在扎伊尔的既得权益；另一方面美国大举渗透，妄图鲸吞扎伊尔。在尼日利亚、东非、北非都发生过类似现象。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少数。

另一类决心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国家中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态度严肃、坚决、认真，他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独立。恩克鲁玛说过：“只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没有从我们大陆根除，我们就谈不上力量对比（均势），甚至共处。”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在这些国家的失败，竭尽全力打击、挫败他们。如扎伊尔第一届卢蒙巴政府的被推翻，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受到严重的压力。这

类国家在非洲也是少数。

上述情况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从而形成两个对垒的集团。一些取得较多独立的国家已开始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家的行列，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如 1961 年，加纳、几内亚、马里、阿联（埃及和叙利亚结成联邦后国名）、摩洛哥六国元首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通过《卡萨布兰卡宪章》，规定签字国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在对外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缔约国进行经常磋商，还建立了有关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共同机构。

在帝国主义特别是前宗主国的策动和扶植下，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非洲—马尔加什联盟成员国随后成立了蒙罗维亚会议集团，与卡萨布兰卡集团相对抗。

在民族主义政权建设方面，西方的制宪理论具有比较强大的吸引力。原英属殖民地多采用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内阁制，原法属殖民地则采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制。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成了当时非洲政治舞台上的普遍现象。

非洲政党的组织形式一般都仿效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党员仅限于领取党证，党的组织松散。在上层，由选出来的头面人物组成领导委员会；在基层，党员仅参加游行示威、集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参加竞选活动。这些政党由于多以部族为基础，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号召力。独立后上台的政党仅能使一两个部族得到好处，如尼日尔的哲马尔人、乍得的萨拉人、安哥拉的姆崩杜人等等，其他部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几乎没有得到独立的好处，或好处甚微，在有些国家里，

甚至遭到排挤、打击和迫害。这就加剧了全国分裂的局面。有些执政党政权因部族的分裂和斗争而被推翻。如加纳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上台后，北方的阿肯、布朗—阿哈福等部族感到自己的传统地位和特权受到威胁，便聚集在古老的阿散蒂联盟地区，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成了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不少国家还出现部族相互残杀的局面，甚至发展到长期的内战。如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独立后一直陷入长期内战的漩涡中。1960—1970 年的尼日利亚最具有典型性。

尼日利亚境内有大小部族 200 多个。由于英国长期采取间接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形成三大部族控制该国的鼎足而立的格局：北方是豪萨—富拉尼族聚集区，信奉伊斯兰教，其人口占全国人口 30% 以上；西南部居住着占全国人口 20% 左右的约鲁巴族，信奉伊斯兰和基督教者各占人口一半；东南部为伊博族人居住，人口占 18%，信奉基督教。后者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经济文化均较发达，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知识分子较多，是中下级文武官员、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教员、工会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地。英国为维持其传统利益，独立时扶植北方人民大会党上台执政，成立联邦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组成了以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为总理的内阁，以伊博族为基础的公民全国会议的主席恩纳姆迪、阿齐克韦则担任无实权的总统。由于巴勒瓦政权推行极端的大部族主义政策，引起其他部族和政党不满，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导致 1965 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并建立起以阿吉伊·依龙西为首的军政府。该政权受到伊博族上层及资产者和东区州长奥朱古（其父为百万富

翁)的支持。豪萨—富拉尼族不甘失败,以巴勒瓦被杀害为借口,竭力煽动部族对立和仇恨,杀害在北区居住和工作的伊博族人,并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军政府游行示威。同年7月,他们在北方人民大会党司库依努阿·瓦达策划下,实行反政变获得成功。依龙西政权被推翻,依龙西等被杀害,伊博族人再次惨遭横祸,仅9—10月间就有2万多人被杀,数十万人四处流浪。在豪萨—富拉尼族上层支持下,雅各布、戈翁(出身中部的安加小部族)出任军政权的首脑。但部族矛盾仍未解决,而戈翁政权损害伊博族人利益的重新划分行政区一事又成了内战的导火线。伊博族人不愿把其石油产地划出去,初则采取对政府不合作的政策,继则东区州长奥朱古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建立了比夫拉共和国。政府派军队镇压,内战爆发。内战历时两年半(1968年5月—1970年1月),以比夫拉失败而告结束。自此以后,伊博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和势力的元气大伤,不仅无力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和反政变虽然仍带有部族色彩,但更多的是部族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带有进步与反动、甚至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成分。

此外,由于多数国家国小民弱,疆界不固定,也无力防守,因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都极易冲破边界,形成强烈的冲击波或连锁反应。1960年代初期,桑给巴尔人民革命推翻了阿贾布达苏丹王朝。这一事件很快波及到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导致了兵变。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被迫请求英国派兵维持法律与社会秩序时,肯、乌两国马上效仿;而当英国妄图借机赖着不走,重新控制坦桑尼亚时,尼雷尔在人民支持下诉诸

非洲国家会议，要求英国限期撤军后，肯、乌当权派亦紧接着向英国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使三国进一步维护了国家主权。

上述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多数非洲领导人取得共识。西方议会民主制对非洲社会而言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只能导致非洲分裂、国家分裂，因为任何反对派都有可能被外国利用，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的潜在危险。尼雷尔承认，他的民主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在我们面临坦噶尼喀问题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对两党制发生过怀疑”，“指望一个国家主动以两种面貌出现，既要它符合民主的特别模式，又要人民团结一致……是十分荒谬的”。纳赛尔说，他过去信奉民主和党派制度已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认为必须退出军委会，“现在我懂得了，今天阿拉伯民族同外国斗争的时期，各个政党都有可能被收买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必是一个多党制的社会”。凯塔也说：“为了团结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侈谈不起作用或相互残杀的对立。”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当权派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理由是在非洲社会中没有产生阶级。桑戈尔说：“无产阶级专政，那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宣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国就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但是，在我们柏柏尔黑人的社会里，不存在对立的阶级，有的只是竞相寻求影响力的社会集团。”他们都自认为找到了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富有生气的、民主的政治，即一党制。于是，一党制逐渐取代多党制而成为非洲政权建设的主要倾向。

一党制的倡导者为执政党的领导人，始于西非的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等国，以后逐渐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

所谓一党制，就是在一国之内只有执政党才是唯一

的合法政党，其他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他们所持的理由是：(1)领导人民取得独立的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恩克鲁玛说：“只要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并得到多数人支持，就可以采用一党制。”杜尔指出，几内亚民主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使它在独立后建立起“一党专政制度是非常现成的”和“客观存在的”。卡翁达说：“当我们民族分化成为若干社会阶级、新的上层分子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时，我们的人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可能出现两种前途：某个政党得到广泛支持，而成为事实上的单一党，还会出现若干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政党。但是第一种前途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反对党派的观点与非洲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2)一党制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必需的，也是建设本民族经济和文化所必需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说，他的国家有 200 多个部族，“如果部族对自己实行封锁，议员从部族立场考虑问题，公职人员为部族从事日常工作，那末，国家在实现统一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尼雷尔认为，独立后要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所需的全国最高的团结一致的努力，并不亚于争取独立运动时期，因此“绝不能给分裂活动以任何余地”。(3)一党制是防止阶级产生和实施民主的最好形式。杜尔说：“作为慎重选择了协调发展道路的单一党来说，其领导和统治就能阻止形成敌对的社会阶级。”尼雷尔指出：“如果为了有反对派而制造反对派，那是十分错误的”，“只要政府考虑到大家的福利和个人自由，那末谁也不能改变国家民主发展的本质”，“一党和整个国家合为一体，民主基础就更为坚实。”

非洲的多数执政党经历了由“运动”、“组织”到

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并提出了若干建党原则。

一是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党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人，甚至于全体公民。桑戈尔说：“单一党就是群众性的党，参加党是每个成年男女的职责。”喀麦隆民族联盟章程规定，联盟必须完成把所有公民“毫无例外地联合在其队伍中的使命”。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则把政党与民族等量齐观。因此，绝大多数执政党成分庞杂，组织松散，党员人数较多。阿联 1965 年人口 3000 万，其中党员 500 万；在加纳 470 万人口中，党员达 200 多万。

一是强调权威和纪律。恩克鲁玛指出，即使有了民主的宪法，“也急需集权主义式的紧急措施来维持，没有纪律，自由就不存在。”肯盟总书记姆博亚则强调无条件服从纪律和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重要性，他说：“人民应当像军队那样组织起来，有将军、纪律和象征，而领袖就是象征。”杜尔突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为全民的利益而专政”。

一党政权建设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立法确定执政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其他政党为非法。有的对反对派加以融合或合并等；有的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或清洗运动，使反对派处于地下或流亡国外而无所作为。非洲政党由 1960 年代初期的 147 个减至 1965 年的 127 个，其中 30 多个政党不复存在，18 个与执政党合并，新建政党 32 个。在 36 个独立国家中，执政党和参政党仅 46 个，有 25 个国家实行了一党制，占独立国家总数的 70% 左右。一党制政权成了主要倾向。

这个时期的政权模式虽然不成熟、不完善，而且也比较虚弱，但无疑是非洲新兴国家领导人民为维持和巩固政权、加强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各部族团结作出的初步尝

试，对非洲政权模式作了初步探索。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独立伊始就辞去总理职务，专心致力于建党，把党的纪律与人民自由选择领导人密切的结合起来，并提出差额选举制。这在非洲是创举，意义深远。

从执政党的纲领和宣言看，绝大多数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都主张和平、中立和不结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帝反殖，主张非洲团结与合作，促进非洲一体化。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具有现实的意义。

另一方面，一党制是执政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才获得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的。但党组织的松散性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些党吸收党员是以集体或个人入党方式进行的。各种思想和学说都带入了党内，党员成分十分复杂，是一个妥协的、折衷性的组织，包括真正的革命者，也包括把独立作为自己发财、取代原殖民主义商人和企业家的人”（恩克鲁玛语）；“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要摘取胜利果实，把独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尼雷尔语）。各个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与执政党之间夺权与分权的斗争由社会转入到党内，从而形成党内有党有派的格局。为维护一党制的统治，执政党当权派只能依靠领导人的人格和权威，依靠他在各派之间执行一条危险的平衡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总统手中，决策日益变为幕后交易。而当权派与其他派别所达成的某种协议或当权派对其他派别的种种承诺，又限制了当权者提出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行动上的自由，从而使执政党严重脱离人民，表面上维持了秩序，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现代政权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后者在地方上势力很大。政府因忙于派系斗争而无法顾及人民，也无法兑现向人民作出

的种种承诺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各种矛盾的交织和不断发展，导致政局动荡不已。一党制象征的权力、领导人被神化的权威在衰退中。非洲政权建设又进入另一个阶段。

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军官集团对政治的干预和要求日趋普遍化，军事政变成了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如果说过去军事政变的矛头指向封建或半封建王朝以及帝国主义扶植的代理人或傀儡政权，那末在 1960 年代末期以后则扩及进步政权了。如加纳的恩克鲁玛、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马里的凯塔、乌干达的奥博特及刚果的马桑巴·代巴等人的政权，都先后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从而在非洲形成了以党治国和以军政权为主体的两类政权结构。

这两类政权为维持其统治，都采取了加强和改善政权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它们的共同点是掌握和控制枪杆子，以使政变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与此同时，它们又根据所处的情况而改变其政权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方法。

在军政权中，多数都不愿让权，坚持军人统治，甚至实行暴虐统治，如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及赤道几内亚的恩奎马等。有的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一党制政权，有的则还政于民，军队回到兵营。

在实行一党治国、特别是一党制的国家，党的建设被作为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力求使群众性的党向组织较严密的政党方向转变。按照尼雷尔的话，就是把党建成活跃于广大公民中的强大的政治组织，使党像一条全天候的公路一样，一方面把政府的目标、计划和各种问题传达给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能把人民的思想、要求、

争论传达给政府。这些执政党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军队严格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有的则仍坚持群众性的党，并依靠外国军队和驻军负责它们的防务及维持社会法律与秩序。少数党则推行多党制。

在非洲，任何一个反对派，无论其势力有多么强大，都难于通过正常选举的手段取得统治地位。非洲军队干预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权力的转移只能靠军队力量来实现。无论是以党治国的政权还是军政权，它们的建立、发展与巩固都经过艰难、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而都具有过渡性、易变性的特点，尤以军政权为最。这两类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是以国家或全民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前者需要军队的支持，至少获得军界克制性的默许，才能维持其统治；后者也需文官，特别是专家治国论者，才能对国家进行治理。因此，这两类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1988年9—10月间阿尔及利亚开始进行行政体改革以来，非洲政权建设似乎又兜回到它的出发点，即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或主要潮流。由于目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股潮流究竟流向何方，多党制是否就是西方强加的模式，一时还难于作出判断。

三、非洲国家政权的多样化

非洲大陆政治体制的变化层出不穷。一般地说，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及帝制（中非博卡萨）共存，以共和体制为主；文官与军人统治并存，且不断地进行交替，以文官统治为主。在文官以党治国中，分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以一党制

居多数。在共和体制中，又分议会一院制、两院制，以一院制更普遍。在军人政权中，有军人直接统治和军人时断时续地直接或间接统治。一般学者都根据如下三条线对非洲国家进行归类：(1)一党制和多党制；(2)文官统治和军人统治；(3)信奉马列主义或倾向马列主义，包括非洲社会主义若干流派，信奉自由资本主义或倾向自由资本主义，也包括若干非洲社会主义流派。当然，这些分类都是相对的、相互交错、相互取代的，而且往往突发于瞬间。绝大多数非洲政权都带有过渡性、易变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其中有的国家从独立之日起就陷入内战、边界纠纷和地区性的战争，因而迄今尚未在全国建立有效的统治。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同，独立后面临的任務基本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共同点。以党治国是主要统治形式，一党制为主要倾向。

截至 1990 年，在非洲的 52 个独立国家（含南非）中，30 个国家实行一党制，13 个国家实行多党制，8 个国家禁止政党活动。此外，尚有难于归类的利比亚（该国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摒弃当代世界的一切政治制度，自称民众国）。即使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由于主要执政党在保持自身处于全国唯一大党和政治舞台中心、或保持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允许其他政党进行有限活动；有的在法律上规定实行多党制，实则实行一党制，其中少数甚至公开宣称，它的目标仍然是一党制。因此，它们都具有一党制的特点。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在独立后上升为执政党。由于战争，殖民主义

的一套统治机构、特别是地方机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传统酋长制度日渐削弱，有的酋长还为民族独立运动作过贡献。广大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议政和参政意识；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也获得了在解放区或根据地建设政权的初步经验。这些国家的政权建设就比较容易，而且起步很快，在客观上它不再受或较少受到原宗主国政权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较为独立地把政党建设与政权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党处于权力的顶峰。以莫桑比克为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莫桑解放阵线在独立后上台执政，就狠抓建党工作，把莫桑解放阵线易名为解放阵线党（以下简称解阵党）。该党以马列主义与莫桑比克革命经验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并加强了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而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领导作用。尽管这个政权先后受到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白人政权和南非的颠覆、以及得到它们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内战和天灾人祸（政策过左过激），莫桑比克解阵党仍然经受住了严峻形势的考验，调整了自己的政策。

二是通过宪政改革分阶段独立的国家在建立一党制政权方面有难有易。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坦桑尼亚等国的执政党在争取独立运动中就几乎独占了领导权，领导人的威望很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批建立一党制的国家。但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则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这主要是由于上台的政党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既要对付部族主义势力，又要对付比自己更为强大的、比较进步的政党的挑战。以塞拉利昂为例，该国 1960 年独立后，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代表南方门迪部族上层利益的人民党，由密尔顿·马尔盖两兄弟领导；代表北方泰姆部族利益的全国人民大会党，由工会

领袖西亚卡·史蒂文森领导；以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集团。1960—1967年间，塞人民党与酋长势力结盟而成为主要执政党，1967年推行一党制，但在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时，原支持人民党的多数酋长转而支持大会党，从而使后者一跃而为主要执政党。这是当时在非洲首次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先例。正当该党组阁时，贾克森·史密斯的军官集团发动政变（1967年3月），中止了通过选举和平移交权力的进程。1968年4月，史蒂文森另立新人民大会党，取代军政权，1971年初宣布建立共和国，史蒂文森先后出任总理、总统。在1973年的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中，新人民大会党获胜，建立起事实上的一党制，1978年新宪法予以确认，历时18年。

喀麦隆是另一种典型。它独立时分东西两部，东部原为法属殖民地，西部原为英属殖民地，有大小部族200多个。喀麦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争取统一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独立后，在众多的政党和组织中，有的比较激进，反帝反殖态度坚决，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在独立运动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喀麦隆人民联盟。以阿赫马杜·阿希乔为首的喀麦隆民族联盟（以下简称喀盟）在法国支持下上台执政，而成为主要执政党。1961年通过谈判，与英属喀麦隆南部合并（北部并入尼日利亚），成立了联邦共和国。为实行喀盟一党统治，阿希乔首先借助法军。围剿人盟所领导的武装，逮捕、杀害其领导人，使喀人盟土崩瓦解，幸存者均逃往国外；然后对其他小党软硬兼施，加以吞并或融合。通过1972年新宪法喀麦隆实行一党制，历时12年。

肯尼亚一党制则主要通过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而建立起来。根据伦敦制宪会议，确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

（以下简称肯盟）和肯民主联盟联合执政。1963年5月选举中，肯盟获胜，民盟宣布解散，建立起事实上的一党统治。肯雅塔总统对党内各部族各派系之间采取了较稳妥的平衡政策，从而保持政局相对稳定。到1965年以肯雅塔为首的温和派（代表吉库尤族）和以副总统奥廷加为首的激进派（代表卢奥部族）之间斗争白热化，奥派宣布与肯派分道扬镳，另立肯人民联盟。肯派视之为“破坏分子”而进行了镇压。1974年奥廷加等获释后又重新加入肯盟，肯雅塔宣布肯盟是唯一合法政党，建立起了一党制，历时11年。1982年、1985年莫伊总统两次修改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只有肯盟党员才能参加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和参与政府。赞比亚的一党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三是军政权转变为一党制。军政权转变为一党制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是刚果恩古瓦比军政权，仅花了1年零3个月；埃及的纳塞尔、贝宁的克雷库为首的军政权等花了3—5年，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政权历时10年，尼日尔则历时14年。

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党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能在政局中起作用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多党制国家也有不同情况。有的从独立至今一贯推行多党制，如冈比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有的独立时宪法规定推行多党制，但实际上则实行一党制，一般地都经历了一党制—有限多党制—无限多党制的过程，如塞内加尔、一定程度上的突尼斯。有的国家则经历了军政权—一党制—多党制的历程，如埃及。1952年纳塞尔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后建立了军政权，1957年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埃及民族联盟（1962年易名为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推行一党制。1970 年纳塞尔逝世后，萨达特于 1976 年宣布实行开放民主制，允许建立代表左、中、有三种思潮的三个论坛，后发展为三个政党，1980 年修改宪法确认埃及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之上的”。

利比里亚则是另一类型，经历了一党制—军政权—多党制的历程。它于 1847 年独立，实际上仍是处于美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这个国家由代表从美国和西印度洋迁移来的黑人后裔的真主党控制。占人口不到 3% 的黑人后裔拥有 60% 以上的社会财富，而当地黑人既无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生活也十分困难。1980 年 4 月，以塞缪尔·多伊（军士长）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结束了真主党的统治，实行军人统治。1984 年，军政府宣布解除党禁，经公民投票批准了多党制宪法。在 1985 年，有六个政党参加的立法议会选举中，以多伊为首的全国民主党获胜，成为主要执政党。1989 年，流亡在外的前政府官员查尔斯·泰勒领导的爱国阵线发动推翻多伊政权的武装斗争，全国陷入内战。1990 年 9 月，多伊在战斗中受伤致死。爱国阵线内部两派打得难解难分。

非洲的政党按意识形态可分为三类：(1) 宣布信奉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各种类型的先锋党，如刚果劳动党、安哥拉人运—劳动党、埃塞俄比亚工人党以及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的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津巴布韦执政党也归属此类。(2) 以非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非洲社会主义不是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包括十多个不同流派。它们的共同点是否认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不适合非洲，并试图在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出具有非洲传统和特性的独立的

思想体系，突出传统社会的价值和宗教教义。如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纳赛尔主义、杜尔的公社社会主义等等。杜尔曾说：“我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资本论》。”⁽³⁾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包括科特迪瓦、喀麦隆的集体或计划的自由主义、加蓬的协调一致和进步主义、扎伊尔的真实化运动等等。

但是，单纯按意识形态分类，很难说明非洲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因为，第一，它们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于非洲独立国家都很穷，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它们面临的共同任务。第二，众多事实证明，意识形态的选择具有易变的特点。第三，不少国家虽然宣市信奉非洲社会主义，但是有的政策措施仍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雷同或近似，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和杜尔为首的几内亚民主党。有的国家则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统治和管理，如塞内加尔社会党、突尼斯的宪政党以及肯盟等等。因此，非洲国家政党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激进的和比较温和的两大类。

比较激进的执政党包括几个先锋党和一部分民族主义政党，被称为“民主革命党”，如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杜尔时期的几内亚、佛得角等国的执政党，上述国家的执政党组织比较严密，有自成体系的权力结构，其中央领导机构包括党主席、党代表大会、执委会，地方机构有党委和支部以及受其领导或控制的其他群众组织。入党条件比较严格，如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对发展对象必须举办3个月的入党学习班，由3名正式党员介绍；新党员的预备期根据成分而有所不同，最短3个月，最

长 18 个月。贝宁、刚果的党章规定，入党申请人在基层组织讨论通过后，还必须经中央或政治局批准。埃塞俄比亚党员有 6 万人，仅占人口总数 0.2%；刚果党有 6000 人，占人口 1% 左右。这些国家都建立起党政合一的政权，党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党就是政权。尼雷尔说过：“坦盟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坦盟。”1988 年几内亚宪法序言称，“党创建国家，所以国家必须同党保持一致。”1977 年，杜尔甚至把几内亚民主党易名为国家党。穆加贝称，津巴布韦民族联盟已成为人民的救星，它的地位应“高于议会和政府，领导国家。永远执政”。

这些政党在政治上高于一切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委会则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党主席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如刚果劳动党主席有权任命部长，安哥拉人运劳动党主席还兼任监察院主席、议会议长，莫桑比克解阵党主席有权主持和召开议会；党在领导班子的配置、使用和培养等方面有最大的发言权和最后的决定权，负责提出、审批议员候选人名单，还可以通过所控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任命合格的人选。

在经济方面，这类国家都强调“以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用于人民福利”（恩克鲁玛语），致力于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并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和中国当时某些极左的做法。

在文教卫生方面，它们强调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主张普及教育，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和全民。莫解阵第一任主席蒙德拉纳指出：“应当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儿童、成年人，使

全体人民都能接受最标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基本政治、经济知识将是计划的主要内容，力求消灭部族主义、迷信、知识水平普遍低下”。它们都进行了教育和卫生制度的改革，实现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创办大学及专业性的学院，包括党校和军事院校，并进行扫盲运动。

比较温和国家的执政党和主要执政党，多为群众性或全民性的党。虽然这些党的党章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党组织松散，基层组织不健全或基本没有基层组织，党被视为是上层或领导者的党，或者是竞选党。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限，往往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有少数党甚至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具。如肯雅塔上台执政后，明确宣布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帮助政府、向人民解释政策及提供各种咨询等。这类国家虽然仿效西方、特别是原宗主国建设政党和政权，但又不完全一致。在这些国家里，党主席自然出任国家元首、总统，集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源泉。以科特迪瓦为例，根据宪法，总统有权召集议会、提出法案、发布代行法律的总统令、编制预算，有权要求国会重新审理已通过的法案，甚至否决国会意见、诉诸公民投票、任命和罢免部长等等。在君主立宪制的摩洛哥，国王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享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宗教的统治权。肯尼亚总统则有权任命内阁阁员（内阁职责是协助总统和向总统提供咨询），任命若干议员，甚至连财政监督、总检查长、审计长、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法官也由总统任命而失去独立性。一位肯盟执委称，肯盟过着“颇为可悲”的日子，“各支部和分支部不起作用，党在国家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今天肯尼亚的情况是行政官员接过了党员的权力，削弱了

党。”

在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这些政党实际上实行的是**一条稍加修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强调提高生产的方针**。乌弗埃·博瓦尼说：“我们过去实行的经济政策，是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依赖一切种类的私人和国家主动精神。”由于执行这一路线和政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科特迪瓦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飞速发展，肯尼亚私人资本已由农业转向服务行业、商业领域，尼日利亚则在商业和建筑承包行业有发展。

至于那些由军政权转变为一党或多党制的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的领袖多为军人，他们公开讲话时都强调军人统治的必要性，因而这些党都打上了军人的深刻印记。原军政权的首脑一变而为党的主席、国家元首，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政府和议会均服务于他们。军人在各级政府中也处于主导和领导的地位。例如，1956年6月23日，埃及通过普选产生总统（纳赛尔）、国会议员，以纳赛尔为首的民族联盟有权批准议员候选人名单。在政权机构中，担任行政部门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者、24省的省长、90%以上的驻外代表，均为军官、民族联盟成员。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上台执政后，军队就成了布迈丁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组织者。除中央政府一级外，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均有军官参加或担任领导职务。军队在社会和经济改革中也起重要作用。军队献金成立土地革命基金，参与统计和分配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工程建设等等。与此同时，这些党或政府也日益注意和发挥文职官员和专家的作用。

非洲各类政权在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上

虽然各异，但在政权建设方面仍有一些共同而又相互矛盾的特点。

其一，以人为中心，主权属于人民的思想比较流行。不少执政党都强调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高于党”，是“创造民族的力量”。它们都用宪法把这一思想固定下来。1973年的马里宪法规定：“主权属人民，一切统治权都来自人民。”1975年安哥拉宪法规定，安哥拉是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一切权力属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参政权及言论、集会和通讯自由等等。而这些权利和自由主要是通过普选制和执政党来实现的。1975年马达加斯加宪法称：“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普选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刚果宪法也规定人民权力通过党来实现。

从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所承认的人民普遍平等的原则来看，非洲政权较殖民地统治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无疑是一个大进步。在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方面，各国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坦桑尼亚所推行的差额选举制，使执政党批准的候选人在每次选举中均有落选者。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也先后采取了差额选举。在肯尼亚1979年大选中，有近一半元老、7名部长和执政党总书记均落选。在1980年科特迪瓦的650名候选人中，仅174人当选。在多党制国家，反对党派能参加竞选。在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国，共产党也可以参加竞选，苏丹共产党一度曾为议会中第四大党。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选择。

另一方面，主权原则、权利平等和自由等原则又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在多数国家里，投票是一种义务或者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阿希乔说：“投

票是至高无尚的义务”，是“整个民主主义的标志”，“放弃就是对民族团结表示怀疑的一种表现”、“一种破坏活动。”居民参加选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屈从于压力的结果，选民仅仅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绝大多数选民均是文盲，而且投票在不少情况下是以集体（部族集团、宗教集团或各种协会及专业性团体）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已成为上层人士的投票。第二，选举名单由上而下地层层议论，而在不少国家里则强调候选人必需是执政党党员。第三，在选举过程中，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可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优厚的财力和舆论工具，为其候选人选举服务，有的甚至利用物质诱惑或动用武力操纵选举。因此，人民对各国政治运动难于施加经常性的影响和压力，难以监督政府。只有当人民大众的活动、感情和态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可能作用于政治进程，如 1963 年桑给巴尔、刚果所进行的人民革命或称第二次革命，1974 年埃塞俄比亚人民推翻塞拉西王朝的革命等。

其二，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并存，且相互制约。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时普遍存在着二元化或二重性的政治结构，即现代政治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不久，多数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种结构可能导致独立的丧失和民族的分裂。卡翁达指出，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杜尔指出：“必须消灭部族主义，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产生矛盾的根源。”莫伊则视它为社会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多数非洲领导人、政治家都把反对或消灭部族主义、地方主义作为建设政党和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有不少国家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

个领袖”的口号，建立了政党合一的政权。有的则通过立法手段废除酋长制度，如几内亚、塞内加尔等。在这些国家里，酋长被撤职或拘禁，取代酋长地位的是执政党党员。坦桑尼亚则对有权威的酋长给予荣誉职务，如穆克瓦瓦大酋长被选为议长，对其他酋长则易地使用，但是酋长逝世后就不再选举和任命酋长了。有的国家则对传统酋长势力采取团结、利用、限制的方针，即利用酋长对部落居民的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体任务，并负责村民若干民事案件及宗教礼仪等事务，把一些有声望的酋长吸收到酋长院中，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进行某些立法，如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国。在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多的国家，酋长已一变而为商农领域的资本家。总之，部落酋长势力在分化和瓦解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由于部族意识根深蒂固，多数非洲人包括城市居民都具有浓郁的部族观念，对部族的忠诚超过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一些最高领导人虽然高喊要反对部族主义、地方主义，但有的本人就是大酋长，或大酋长兼农、商资本家。一般地说，在不少国家里，部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部族酋长的支持与否往往在选举中决定一个党的胜败，也是执政党能否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尼日利亚，无论文官统治或军人统治，如果得不到最大部族豪萨—富拉尼族的有力支持，就难以维持统治。甚至连桑戈尔这样有名望的政治家也多次承认，由于得到传统宗教领袖的大力支持，他才“成功地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暗礁”。在不少国家里，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通过立法手段保留了酋长制度，把酋长的管辖区作为政府的基层单位，酋长在各级政权中均有自己的代表。这类情况在非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喀

麦隆为例，根据 1977 年公布的法令，全国划分为一级酋长领地、二级酋长和三级酋长领地。三级酋长就是农村的村长或城市的保长。中央政府通过酋长来统治人民，酋长负责传达政策、命令、征税并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在不少国家里，迄今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并存，相互冲突。部族主义竭力阻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掩盖阶级矛盾，阻碍阶级意识的滋长，从而阻碍了现代民族的形成。这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现代政权结构与传统统治结构并存，产生了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的尖锐矛盾。这也是非洲政治动荡不已的原因之一。

其三，权力高度集中。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也无论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还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都建起高度集权的统治。高度集权是非洲国家最本质的共同点，也是建设国家所必需的。高度集权对年轻的非洲国家来说，无疑促进了从殖民统治向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过渡的进程，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而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

但另一方面，由于非洲国家国小民弱，且政权都无牢固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非洲国家的集权逐渐转变成以个人权力为中心，导致国家人格化或个人化。个人成了权力、荣誉和财富的象征。一体化在较多的情况下几乎是作为个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借口。人治流行，工作效率低、贪污受贿成了社会中的恶性肿瘤。统治者和受惠者形成一种庇护和被庇护的从属关系。所有这些日益吞食着人民与当权派之间在独立初期所存着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有时甚至发展到对抗的程度。

其四，国家对经济普遍进行干预和控制。长期的殖

民统治使非洲贫穷落后，民族资本弱小而分散，无法实行资本原始积累，也无法发展和扩大再生产。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承担起经济建设和发展任务，并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实行干预和控制。国家不仅要保证经济活动所需的外部条件和从宏观上干预经济，还要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定者，以及通过工业化、国有化、本地化等政策和措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甚至成为生产者。作为外部条件或环境的保障者，政府通过立法，确定国家的根本制度。作为目标的制订者，政府规定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以及发展速度。作为经济的干预者，政府通过税收、财政、信贷、汇率等影响市场机制。作为生产者，政府又通过国营和公私合营等公司和企业直接或间接参加经济活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进程，导致非洲大多数政权金字塔式的结构，即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和进行统治，而同时又使整个国家陷入分裂或割据状态。人民群众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议会权力日益萎缩，形同虚设。国家的权力基础极不牢固，政局动荡不已的格局难以避免。